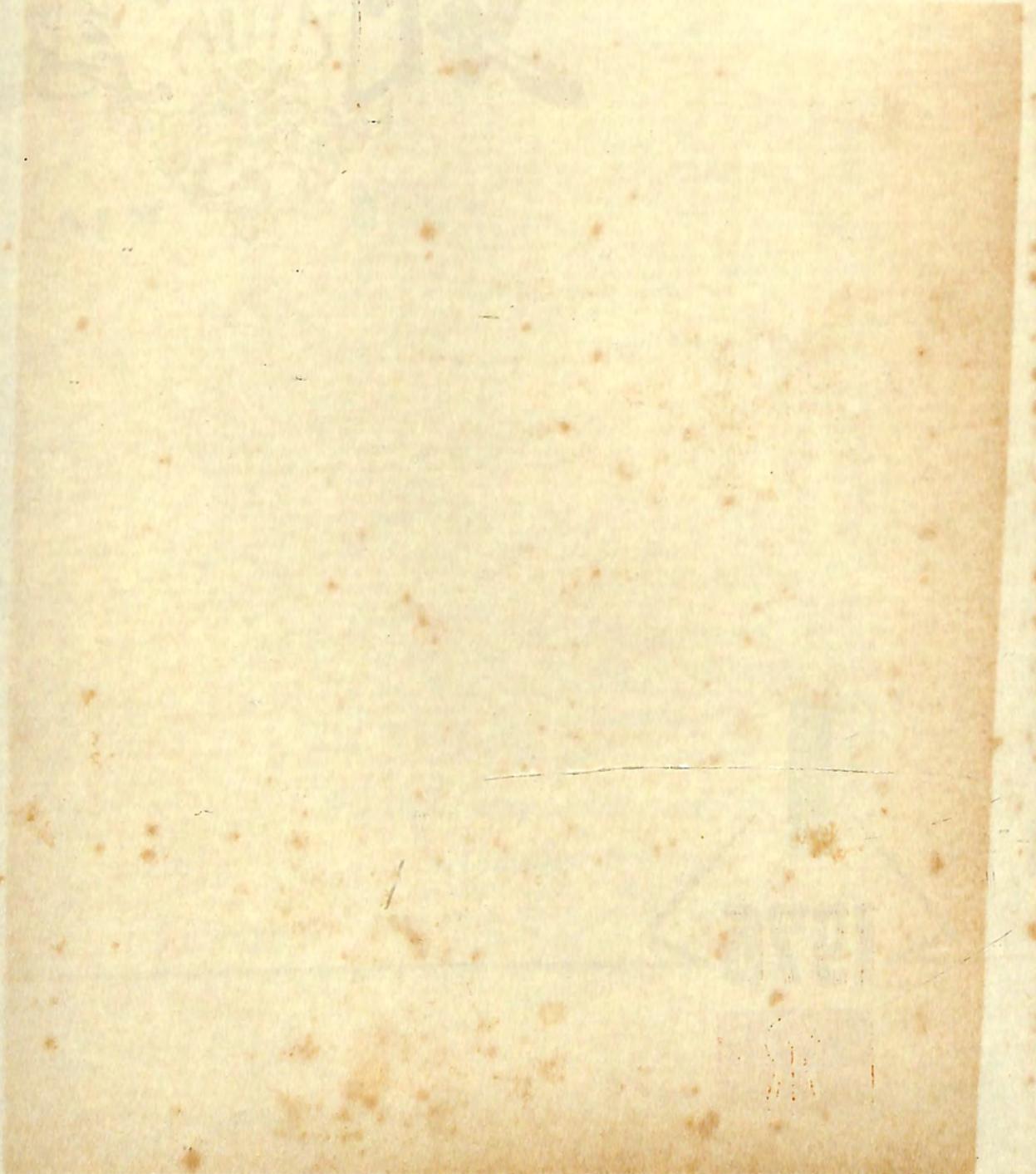


朝霞

ZHAO XIA

1
1976





朝霞



目录

词二首.....毛泽东 (3)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念奴娇·鸟儿问答》

指路的明灯 继续革命的动力.....谢其规 成莫愁 (5)
严祥炫 钱钢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的一点体会

· 朝霞随笔 ·

向前看.....江曾培 (8)

“四不象”析.....费明迪 (9)

谈“算账”.....陈大康 (10)

秧苗与《春苗》.....周天 (10)

· 小 说 ·

峥嵘岁月(征文选刊).....姚真 (12)

为革命委员会站岗的人(征文选刊).....段瑞夏 (24)

高瞻远瞩.....董德兴 胡廷楣 (31)

毕业归来.....张步真 (39)

未受邀请的“代表”.....陈先法 (48)

一九七六年
第一期

小说专辑



- 标灯闪闪.....士敏 (58)
- 新的课题.....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陈光李 (66)
- 小菁和小健.....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生 王晓元 (74)
- 第五十一个学员.....任志高 (84)
- 一道考题.....邱伟坚 (86)
- 社员.....鲁风 (89)

· 评 论 ·

迎着朝阳 阔步前进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龚挺 (91)

——喜读短篇小说集《迎着朝阳》

努力反映风雷激荡的战斗年代

.....上袜三厂“七·二一”工大文科班
上海师大中文系二年级三班 (94)

——略谈《朝霞》一九七五年的小小说

词 二 首

鄧东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风雷动，

念 奴 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原载《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

指路的明灯 继续革命的动力

——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的一点体会

谢其规 成莫愁 严祥炫 钱 钢

在全国人民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近发表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毛主席光辉诗篇的发表，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是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反修防修的尖锐思想武器，它象一盏熠熠闪亮的明灯，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鼓舞我们坚定不移地向修正主义作英勇的斗争，鼓舞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并将永远鼓舞我们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高歌猛进！

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写于一九六五年。当时，在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正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局面。苏修叛徒集团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对内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更加疯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国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配合国外帝修反反华，在党内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搞修正主义，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面临着得而复失的危险。“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严峻的斗争已经势不可免。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气魄，斗风暴、击浊流、挽狂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和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不到一年时间，毛主席就亲自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全国人民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猛烈进攻。因此，我们这样理解：毛主席的两首词是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檄文，是号召全国人民继续革命的动员令，也是反修防修的进军号！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光辉的革命实践产生光辉的诗篇。回顾一九六五年国内外形势，使我们对毛主席的两首词读起来更觉得亲切感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在反映现实斗争的时候，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揭示出斗争现实的本质，并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同时，毛主席以高度的艺术概括，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诗篇气势磅礴，激越高昂而又明朗生动，含意深远，其间又夹以对修正主义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批判，更增强了诗篇的战斗性，为我们的诗歌创作树立了典范。

《重上井冈山》是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写下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伟大诗篇。井冈山——红色的革命摇篮。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

说得有理

的道路。在腥风血雨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年代里，雄伟的井冈山呵，曾经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为了保存红色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千百万工农群众，跟着毛委员，拿起枪杆子，众志成城，浴血奋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毛主席在一九二八年秋写就的《西江月·井冈山》，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当年鏖战的壮景。然而“三十八年过去”了，在流逝的历史长河中，却犹如“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井冈山，非昔日可比，“旧貌变新颜”，已经发生了巨变，抚今追昔，“换了人间”！你看，“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充满着诗情画意。然而这个“变”，来之不易，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换来的。井冈山之变，也就是社会主义祖国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缩影！读着诗句，我们仿佛身历其境：山巅飘红旗，歌声满大地，蜿蜒的公路经过崇山峻岭伸入云间……我国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发扬鼓足干劲，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与自然界斗，与阶级敌人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人世间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这首词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作为结句，使词的意境更开阔，思想更深刻，主旨更鲜明。的确，在我们继续革命的遥远征途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险处”等待着我们去努力登攀哩！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指引着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又挥手号召我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末了两句是寓意深刻的警句，是现实斗争规律的总结，鼓舞我们继续革命，永不停步！

继《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之后不到几个月，毛主席又挥笔写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是通过鲲鹏与雀儿问答的

形式来批修反修、揭示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前途的。自古以来，不少诗人曾用大鹏搏击万里风云的形象来抒发雄心大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上李邕》）诗虽豪放迭宕，终究只是个人怀才不遇、轻蔑权贵、不甘沉没于碌碌之辈中的叛逆性格的抒发。毛主席在这首词中虽也借用鲲鹏的典故，则完全赋予崭新的思想内容，成为有时代特征、有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的崇高形象。词中以雄健刚强、斗志旺盛、目光远大的“鲲鹏”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赫鲁晓夫苏修叛徒集团比为体小骨弱、鼠目寸光、畏缩怕死的“蓬间雀”。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庄子·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毛主席借用鲲鹏翱翔九重，挟着旋风翻动巨翼的雄伟形象，热情歌颂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帝修反英勇搏斗的光辉形象和高贵品质，而对苏修这只“蓬间雀”则投以极大的憎恨和蔑视，有力地批判和嘲笑了叛徒们在帝国主义武力威胁面前吓破了胆的丑恶嘴脸。不是吗？当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民主拿起武器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者展开英勇的战斗时，苏修这只“雀儿”，面对“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情景，不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生怕“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会把他们毁灭，因而惊恐万状，发出了“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悲鸣。“鲲鹏”与“蓬间雀”的对答，正是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原则问题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而苏修叛徒集团却害怕革命，反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拚命鼓吹“活命哲学”，这就深刻地暴露了苏修投降主义的真面目。那么，苏修这只雀儿要飞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去寻找那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即他们大肆鼓吹的“三无世界”之类的“仙境”。然而，那“仙山琼阁”不过是海市蜃楼，在现实世界——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侵略的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完全是苏修叛徒的欺人之谈。他们妄想以此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阻挠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为了扑灭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苏修叛徒竟和帝国主义者握手言欢，眉来眼去，“订了三家条约。”妄图束缚无核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手脚，好让他们永久地戴上“核霸王”的桂冠，对各国人民进行无耻的核讹诈，为所欲为。同时他们还扯起“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的旗号，招摇过市。在“鸟儿问答”中，毛主席只用寥寥数语，以轻蔑的口气，击中苏修的要害。正如《九评》所指出的那样：“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

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苏修的假共产主义谬论，遭到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和驳斥，却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拍手欢迎，他们叫嚷说，“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说明苏修叛徒集团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完全同流合污了。

然而，“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必将引起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历史是无情的见证人，如今十年过去了，全世界遍地燃烧的革命烈火，早已把那“仙山琼阁”烧得全无踪影。当时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不是早已被赶下台了吗！现在苏修、美帝的脖子套在全世界革命人民拉着的绞索上，日子不是很难过吗！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却奔腾向前，势不可挡，全世界人民彻底埋葬帝修反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光辉诗篇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奋勇前进！当前，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给我们指明的方向，团结战斗，胜利向前！





向前看

江曾培

人们的两只眼睛生在面部，是为了向前看。而《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把脑袋装反了，眼睛长在背面，他就总是向后看。

在工农群众中，有一句豪迈的口号，叫做：“想着共产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就是身在社会主义社会，眼看共产主义前方。它形象地体现了亿万劳动人民脚踏实地而又高瞻远瞩的革命风貌。人们正是有了这一方向，判断是非才有了一个正确的标准，掂量事物才有了一个正确的准星。比方说，拿现在大学和旧大学的学生来比，是“一身泥土上大学，满手老茧回家乡”好呢，还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好呢？看方向，问题就犹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因为前者显然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向着共产主义前进。一句话，它是向前看的。后者相反，则是向后看。

只有向前看，我们才能看到新生事物的无限生命力。马克思颂扬当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列宁称赞十月革命后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发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

义的实际开端”；毛主席赞扬五十年代初期河北省三户贫农坚持办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革命导师从来就是高瞻远瞩，引导我们看到革命的远大目标。我们这样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尽管它们还是幼芽嫩叶，尽管它们的成长还会遇到各种艰难曲折，但是，它们必然要成为嘉卉茂林，则是毫无疑义的。青山遮不断，毕竟东流去。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为了迎接共产主义的明天，为了实现共产党人最壮丽的理想，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催促这些伸向明天的幼芽嫩叶，快地生，快地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原因无它，就因为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总是向后看的。他们犹如申公豹一样，眼睛长到后脑壳上去了。他们“信而好古”，容不得任何一点改革。稍有革新，他们就会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发出“觚哉，觚哉”一类的感叹：教育革命嘛，学校不象学校的样子了；文艺革命嘛，作品不象作品的样子了；卫生革命嘛，医生不象医生的样子了……他们所谓的“样子”是什么？都是些老掉牙齿、白了胡子的过时货。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又怎能为他们所中意呢？他们攻击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开门办学、赤脚医生、三结合创作等等新事物“不象样”，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正是我们的光荣：幸而不象，如果象了，岂不糟了！

应该说，也有些同志不是由于眼睛生在后脑壳上，而是由于为妖风毒雾所惑，迷了眼，分不清前后。这需要赶快擦亮眼睛，认清方向。因为革命者“现在的努力是朝



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了目标，失掉了方向，也就失掉了判断事物的标准，就会弄到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境地，就会受骗上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两种方向的斗争。我们一定要认清路线，端正方向，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四不象”析

费明迪

电影《决裂》中，对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无不衷心赞之曰好，但赵副专员却暴跳如雷，怒气冲天：你们那个学校好什么？简直是“四不象”！

“四不象”吗？说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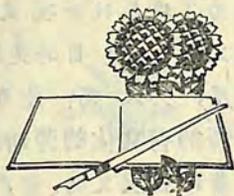
“共大”和封建教育确实不一样。他们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们“共大”的学生能文能武，会做工，会种地；“共大”和资产阶级教育也不一样。资产阶级也让工人受一点教育，但那是为了让他们做机器的奴隶，“共大”是为了让学生将来更好地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共大”和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就更不一样了，那个教育是为了替帝国主义培养忠顺的奴才，

“共大”则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修正主义教育呢？目的是培养精神贵族，特权阶层，“共大”呢？是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手里拿着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甚至是早已僵化了的封建教育的框框来套我们的“共大”，当然套不上，于是骂娘了：“四不象”！

然而，“四不象”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要我们的“共大”象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才好么？要是我们的“共大”真“象”了那样的教育，那岂不是同它们同流合污了吗？不，“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象赵副专员那类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骂我们“共大”是“四不象”，那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共大”式的学校恰恰是同那些剥削阶级的教育划清了界线，它才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型学校。我们的教育无须拿去和那些剥削阶级的教育作比较，因为它属于无产阶级的。

鲁迅说：“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赵副专员就是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可惜，象赵副专员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他们现在不是又在骂我们的教育革命了吗？这些人，每当一件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总要起劲地反对一气，过后就认输，做点检讨；但另一件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他们又跳出来反对了。革命大潮势如长江大河，奔腾澎湃，决不是那些人所能遏止的。奉劝这些人还是认真把自己的顽症彻底地治一治，迅速跟上时代的革命步伐！



谈“算账”

陈大康

“五四”后，一些想把青年拉进研究室的学者特意称赞起清代的学术来，眉飞色舞的，如数家珍；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尤其考据学，使人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鲁迅在《算账》一文中反驳说：“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两种算法截然不同，所得自然也大相径庭。

近来，有人特意称赞起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来了，也是眉飞色舞的：知识是如何丰富，基础是如何扎实，借此算出旧教育制度的好，而现在的教育革命却是不行了。

知识丰富，基础扎实么？东西好象是装了不少：黑板上种水稻，练习本上装机器，还有一连串的公式、定理、定律，挨挨挤挤地在脑里扭成一团。但是，一接触实际，麦苗儿当韭菜，螺钉螺母分不清的笑话便层出不穷了。这还在其次。尤有甚者，读书做官，忘记了生他养他的劳动人民，倒过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让他们重新当奴隶。

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不少成绩，但这些成绩恰恰是批判

了读书做官论，“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后的结果，功劳应归于文化大革命，但有人却算在旧教育制度的账上。也是两种算法。

学校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的人只算给学生脱离实际地硬灌了多少公式，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着旧学校对于工农子弟来说“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这笔账，我们偏要把这笔账翻出来，好好地算一算，正因为算了这笔账，我们才“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打破旧学校的决心”。在看待教育革命时，我们首先算的是它使学校“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这笔账。正由于有这笔账，我们才称赞、歌颂教育革命。我们和有的人算法不同，所得结论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此。

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快十年了，但还有人固执着老的“算法”来否定教育革命，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他们否定了教育革命，进而又要算什么账，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就更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了。



秧苗与《春苗》

周天

上海郊区的社员，为了让城市工人阶

两个阶级两个对立面斗争



级吃到早上市的时鲜蔬菜，大量用了秧棚育秧的技术。数九寒天，外面雨雪霏霏，矮矮的玻璃房子里面却是碧绿生青、春意盎然。社员们照顾这批秧苗，真个道地，其中有一项做法，就是到开春秧苗向大田移栽期近时，每天都要有意识地把秧棚上的玻璃格子揭开几个钟头，日日如此。这做法用意何在呢？用贫下中农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小苗见见世面，经点风霜，锻炼锻炼，不然的话，移进大田后碰到霜冻吃不消！”

生活里面，有许多事情常常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我以为，这就是一桩。

爱护秧苗，这是个原则。但是，怎么个爱护法，却大有讲究。让小苗经受一点风霜，就是一种积极的爱护。因为归根到底，蔬菜秧苗不是种着玩的，而是为了让它早些在大田里生根、开花、结果。然而，由于自然规律，霜冻总是会来的，让小苗早点锻炼锻炼，比关在温室里不是更积极吗？

由此，我回想起看完电影《春苗》后思考过的一个问题。走资派杜文杰这个人，今后会不会搞翻案呢？如果杜文杰承认错误并结合以后，老一套又来了，田春苗那时将怎么办呢？我想，田春苗会很好地顶住的。因为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田春苗已经产生了抵抗力。这一想，却想开去了。电影《春苗》的前半部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候，医疗卫生领域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所以，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会经过那末激烈的斗争；那末，如果是描写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生事物成长的题材，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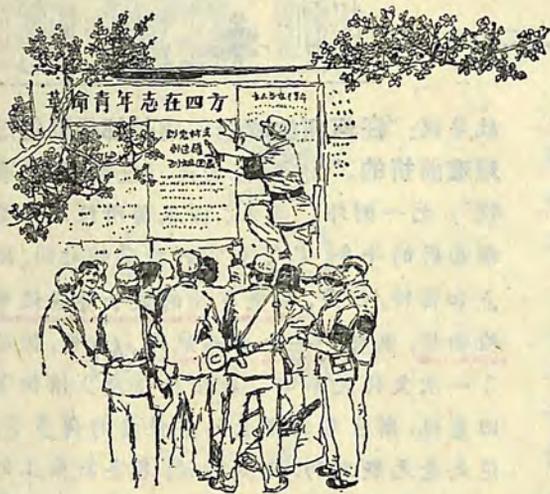
我翻开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以后，思路打开了。毛主席

教导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这里说的是“任何新生事物”，无一例外。看来，田春苗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尽管有它的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但是，新生事物的成长要经过艰难曲折，这却是一个普遍规律。自然，经过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旧基地，新生事物成长的条件要好得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的话，各条战线上的新生事物怎么会象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呢？电影《春苗》本身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和开始以后，田春苗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正雄辩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但是，如果认为经过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从此就能象滑冰一样地前进，不再有艰难曲折，那恐怕也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幻想。社会上依然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依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的基本路线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出现的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已经在向我们上课了吗？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有一句唱词：“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这“胸有朝阳”的英雄性格，正是在多次抗严寒化冰雪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冰雪、严寒、风霜，都是坏事，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在与其作斗争的条件下，坏事总是能向好事转化的。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生活会教导我们，把反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长的作品，写得更深刻一些。

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



峥嵘岁月

姚 真

每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旭日，明灯，红旗，烈焰，火苗似耀动的袖章；还有那风华正茂的红卫兵们。是的，他们不能使我忘怀，特别是两个我最熟悉的战友。一个叫宋舫娣；一个叫虞鑫龙……

一九六〇年的西区工人新村。

深绿色的冬青，镶嵌在纵横交错的水泥小径两旁，把那些很有气派的楼房互相联接起来。

每天凌晨，附近马路上就响起一连串牛奶瓶互相撞击的声音，“哐啷……哐啷……”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推着装满牛奶瓶的小车，身后紧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脑后拖着两根又细又黄的辫子，手臂和腿显得细长，臂弯窝里挽着个大竹篮，手指头勾了一大串钥匙，用铁丝串起来，少说也有百来把。小女孩叫宋舫娣，小名“小舫板”，解放前夕，在浦东做临时

工的妈妈乘小舫板回家途中生下的。爸爸是船厂工人，五七年发洪水，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党组织无微不至地关怀宋舫娣一家，介绍送牛奶的妈妈进了新村附近的国营童装厂，过年过节总要登门慰问，送来补助，还让两个孩子免费上学。妈妈从小给资本家当佣人，深知旧社会苦，新社会甜，决不愿坐等组织的照顾，于是白天去童装厂上班，清早做义务送奶员。小舫板从小很懂事，一觉醒来，摸摸身旁暖烘烘的空被窝，也跟着一骨碌起来，把弟妹的被子压压好，就追赶妈妈去了。

这一年，小舫板对几件事印象特别深。她妈妈原来在童装厂做工时，熨烫镶着金丝银边、绣着小花朵的童装，总是轻轻地哼着什么，熨得又快又好，仿佛春节前给自己心爱的女儿做衣服一样。可是，这一年，妈妈的脾气突然变了，总沉着脸，牙齿里仿佛咬着什么仇恨。小舫板悄悄地问厂里的工人阿姨，妈妈这是为什么？工人阿姨气愤地说：“孩子，记住吧，这些衣服要给外国人抵债！”小舫板妈妈大字不识，却担任

新村读报小组组长，她家里是读报组活动的场所。有一天，读报小组的叔叔阿姨们纷纷把自家的钱、粮票拿出来交给她妈妈。小舢板问妈妈，这又是为什么？妈妈说：“这是工人叔叔阿姨支援灾区人民的一份心意。”小舢板想了又想，记住了妈妈的话。过了一星期，她突然问妈妈：“叔叔阿姨的心意寄走了吗？”妈妈感到很奇怪：“干什么呀？”“把我的心意也寄走吧！”小舢板拿出一斤半粮票和一把角子交给妈妈。原来她悄悄地省下了妈妈给她吃心点的粮票，又把她心爱的泥娃娃储蓄罐砸了。妈妈喜欢地搂着孩子的脑袋说：“好孩子。你的心意，灾区的叔叔阿姨一定知道。可是现在，你首先要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长大后接好革命的班。”妈妈的嘱咐全装在小舢板的心里了。从此，她每天义务送牛奶，起得更早；对党中央办的报刊感情更深了。天天守在新村进口，等邮递员叔叔的自行车铃一响，她就蹦跳过去，帮着邮递员叔叔挨家挨户送报纸。

这新鲜事儿也吸引着另一个孩子。他叫虞鑫龙。比小舢板小两岁，长一张白净的小脸。他家住小舢板隔壁，爸爸是个邮电工人。鑫龙人挺聪明，学习成绩经常得五分，可就是不爱劳动。爸爸总是这样批评他：“解放前，我象你这么大，早在街上卖报纸了！可你，什么也不懂！”鑫龙扁扁小嘴，不很听得进这些话。小舢板天天为大伙送牛奶送报纸的事却在无形中触动了鑫龙。他羡慕地扒着窗口看呀看的。爸爸发现了，找来小舢板说：“鑫龙也愿意给大伙做好事，你就当弟弟那样带带他。”妈妈见儿子想去送报纸，特意缝了个小帆布袋，上面用红笔描了“人民邮电”几个字。两个孩子都乐了。从此，两个小伙伴天天背着小邮袋，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送上叔叔阿姨的家门。

有一天，小舢板给邻居王伯伯买药去，让鑫龙一个人先去送。鑫龙背着小邮袋象小鸟似地一路飞去，高兴的样子就别提了。就在他送最后两份报纸的时候，突然感到小邮袋“叭哒”一声往下落去，低头一看，见小邮袋的一条带子被人割断。一回头，一个肉鼓鼓的穿着白衬衫、咖啡色风凉皮鞋的男孩子嘻笑着，装扮着怪脸：“小邮差，小信差……”

“你，你，赔！”鑫龙激怒了，白皙的脸涨得绯红。

“上我们小楼来吧，让我爸爸赔你。”那白衬衫男孩无所谓地嬉笑着。

鑫龙想赶上去拦住他，一看对方强壮的身体，胆怯地收住了脚步。

“舒晓晋！为什么欺侮小同学？”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扳住了白衬衫男孩的肩头。

男孩有点慌，回过头刚要声辩，马上又恢复了满脸傲气：“哼，多管闲事！送牛奶的。哼，‘二十四个补丁’！”

舒晓晋是小舢板的同学，“二十四个补丁”是班上一个资本家的儿子从小舢板衣服上数出来，又在班里宣传开的。

小舢板细长的手臂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别看不起人！没人养牛，没人挤牛奶，没人送牛奶，你吃的牛奶从天上落下来？！”

舒晓晋虽说胖乎乎，却没有小舢板有气力，心里直害怕，嘴上却还硬着，把他做副区长的爸爸抬出来：“放开，哼哼，我要告诉爸爸去！”

“你爸爸更得讲理！”小舢板声音更响了，“说！你认不认错？”

“呜呜，我错……我错。”白衬衫男孩抵不过小舢板有力的手，带着哭腔求饶了。

小舢板把挂着泪痕的鑫龙领到家。鑫龙妈妈问明原因，安慰儿子说：“哭什么呢？邮袋带子断了，我给缝上就是了嘛。”儿子却把邮袋往妈妈怀里一扔，眼泪成串地挂

下来：“呜呜，缝好我也不背了。人家说我……呜呜……说我小邮差，多丢脸……”

“他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偏背给他看！”小舢板倔强地说。

第二天中午，新村深处一幢单独的小楼里，一个神态严肃，略显肥胖的中年男子，躺在转椅里悠闲地看报。突然，一张小纸条从报纸里飘了出来，他拾起来看，上面是孩子的字体，写着：“舒展同志，你好！……”看完纸条，他立即皱紧了眉头把儿子唤来，训了一顿：“晓晋，看看吧，人家告上门来了。十多岁了，也不想自己是什人人家的孩子，去跟那些人打闹。没有见识！”说完，“哗”地一声，拉上垂到打蜡地板上的白花绸窗幔，闭目养起神来。

“没有见识”四个字，副区长兼文教局长舒展说得很含糊。以致受训的舒晓晋闹不清，这到底指自己呢，还是指那个告状的送牛奶女孩？

二

从新村往右拐几个弯，大约走上一刻钟，就可以看到西区中学的校牌。这是全市有名的一所五年制重点学校。每天早上七点半以后，西区中学大门前的停车房里，就出现一长排崭新铮亮的自行车。小花园一般的校园里，传出了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悠扬的钢琴声，学生们打球的嬉戏声。有时，离上课还有两三分钟光景，大门前还会“嘟嘟”驶来辆小轿车，从车上跳下个学生，慌里慌张地往大门里闯。

五年后，宋舢梯和虞鑫龙都是西区中学的学生了。舢梯读中五，鑫龙低一级。

每天清晨，舢梯仍然跟着妈妈推着小车，挎着竹篮，走上三五百户人家送牛奶。所不同的是，手里常捏着本书，送完一家，就低头翻几页。妈妈说：“等一会看吧，小

心眼睛。”她回答：“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开展活动，大家都要谈体会，怎么能等一会呢？”

虞鑫龙进了西区中学后再也不送报纸了。他学习很刻苦，夏天期终考试前，他总是躲在小阁楼里温课，无论天气怎么闷热，背上熏出多少痱子，无论父母亲怎么训斥，他都不肯轻易下楼。在学校里，学生们经常看得到他颀长的身影。他被选上学生会文娱委员，学会了指挥和拉手风琴，还常常给学校黑板报投投稿。他基本上是能干的，活跃的，但也有某些时候，碰到某些人，显得不那么自如。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在公开场合露露面。

一天下午，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呢，湖绿色的梯形教室里便坐满了人。虞鑫龙挟了一迭书本，从教室后门进来，悄悄地在宋舢梯后面坐下了。为了平静一下砰砰乱跳的心，虞鑫龙的眼睛重新打量着梯形教室内外的景致。西区中学据说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透过明亮的落地钢窗，首先入眼的，是一座峨特式的楼房。暗黄的砖墙上爬满了杂乱的古藤，水管附近是褐色的雨迹。人们称这座楼叫“黄楼”，它虽说古老、陈旧、死气沉沉，却是校长室、图书馆所在地。黄楼一侧，堆砌着一些玲珑的假山石和几条石凳；草坪不大，草儿却长得异常细密、柔软；草坪中间的小花坛里，种了一些美人蕉、月季。虞鑫龙的眼光回到了宽敞的梯形教室。四周是咖啡色刻有花纹的隔音板，顶上是一排排新日光灯，前面是乌黑的活动玻璃黑板，还有那装有两架录音机的讲台。……虞鑫龙出神了，隔一会儿，他将荣耀地被老师叫到讲台上，向在座所有人高声朗读他的作文了……

他轻轻拉动宋舢梯的衣角：“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宋舢梯有些摸不着头脑。

“作文呗！”虞鑫龙心里暗想，怎么这么掉以轻心，要知道今天是全校高年级作文比赛讲评课，也是全区性的公开教学课。

“没有。”虞鑫龙终于听到了宋舫娣毫不介意的回答。他这才想起，舫娣妈妈这几天生病，舫娣天天替妈妈送牛奶，作文只写了个草稿。他有点为宋舫娣遗憾了。

“听说这还是舒局长亲自抓的呢。市教育局也来人。你看，校长陪着他们来了。”虞鑫龙敬畏地望着门口进来的人说。

宋舫娣看看神色紧张的虞鑫龙，抿着嘴淡淡地笑了。

现在，主讲的林老师从容不迫地进来了，各种声音顿时刹住。

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志愿》。林老师指定着一个个学生站到讲台前，大声朗读自己的作文，然后由教师、同学加以评论。大概事先演习过多遍吧，学生们无论读或发言，全都滚瓜烂熟。副区长兼文教局长舒展威严地坐在听课席上，一动不动，简直象尊石佛，脸部是僵硬的。偶尔听到得意之处，嘴角旁才露出一丝矜持的笑容。

虞鑫龙迫切地期待林老师点他的名，终于，他带着兴奋的红晕走上讲台，大声朗诵起来：

“……我不想戴上什么桂冠，也没有对金钱的奢望，我只愿当一个名记者，因为他是人们所尊敬的‘无冕之王’……”

林老师才四十多岁，就当上了一级教师，油亮的头发，笔挺的衣裤，一副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样子。他一边听虞鑫龙的作文，严肃地点着头，一边沙沙地在黑板上写了“欢庆国庆”四个字。末了，稍稍称赞几句，便提问道：“虞鑫龙同学的志愿高尚，很好。可惜有句病句，谁听出来了？”

几个同学举手回答，都没答对。

林老师看看差不多了，才亮出了谜底：“同学们请看，这‘欢庆国庆’四个字，严格

来说，是个病句。‘国庆’已经有了‘国家欢庆’的意思，前面加了‘欢庆’两字，不就成‘欢庆国家欢庆’了吗？”他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病句：“我恢复了疲劳”，接着便不厌其烦，大大发挥起他的“动宾结构”来了。据说，这句“名例”，他已经给学生讲了二十来年了；他当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曾经这样反复讲过。

老师归老师故弄玄虚，宋舫娣归宋舫娣自己写。开始她伏着桌子上抄她的作文，后来就在笔记本上写着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心得体会。坐在舫娣右边的男同学龚扣宝，在班里年纪最小，又调皮，同学们叫他“小扣宝”。小扣宝这时把屁股扭来扭去，坐不住了。他从作文本上撕下一张白纸，专心致志画着，然后又把纸塞给宋舫娣，舫娣一看把纸揉成一团，笑得露出了牙齿。原来小扣宝画了一尊佛，嘴里吐着白沫；下面听的人都昏然睡去。空白的边上题道：“哈呵……”

这时，林老师出乎意料地走到教室后面，用教鞭点道：“宋舫娣同学，请把你的作文朗读一下。”

宋舫娣起初一楞，随即镇定下来，毫不犹豫地拿起作文本，从从容容走上讲台。

林老师用信任、期待的眼光盯着这个女学生。虽然，他平时极不喜欢宋舫娣的脾性，事先也没审阅过宋舫娣的作文，可是他心里暗暗欣赏宋舫娣作文的文理通畅、色彩丰富、笔调细腻，根据平日观察，他对宋舫娣今天的作文水平也有绝对的把握。

然而，宋舫娣的作文象在空气凝聚的梯形教室里点燃了一根导火索，搅乱了文教局长舒展的教学计划。她写得很朴素，很简短，象一份决心书，结尾是这样的：

“……听从党的召唤，走那燕子的道路，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这就是我的志愿，我终生的理想。”

顿时，学生们交头接耳，听课席也议论纷纷。“嗡嗡”声越来越大，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激烈反对，有个女教师失望地合上笔记本，低声叹息：“如果西区中学培养目标不是高精尖人材，那还要办它干什么？”

舒展看着乱成一团的公开教学课，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克制住自己，威严地咳嗽了几声，暗示主讲人不受干扰继续讲课……

一下课，满面羞红的林老师急忙追上怒气冲冲的舒展和陪同的校长。

“林老师，你很使我失望哪！”舒展冷冷抢白了林老师一句。

“没想到，没想到！”林老师又悔又恨，竭力为自己开脱。

校长板着脸在旁边插了一句：“听说你们年级有的人居然准备推荐她出国留学。”

“啊，问题就更严重啦！让这样的学生出国，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舒展发了一通脾气后终于冷静下来，他详细了解了宋舫的情况，吩咐校长和林老师，“在毕业班里发生这种事，影响极大。我要亲自找她谈话。”

宋舫被叫进黄楼校长室。

“宋舫同学，说起来我们还算邻居吧。嘿嘿，听说你很有才华呀。”舒展拍拍女学生的肩头，让她坐下。

宋舫淡淡一笑，算是回答。

“我想让你重写一篇《我的志愿》，好不好？唔，写得好，还可以贴到作文廊里去。”

“为什么？”

“我想你很聪明，应当领会我的意思。”

“我不懂。”宋舫摇摇头。

“当务之急，得纠正一些模糊认识。西区中学的培养目标，是为高等学府输送人材，而不是其它。”

“学校的培养目标，毛主席不是早在五八年就明确规定了吗？”

“各个学校都有它具体的奋斗目标。今年西区中学的升学率要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你是团支部书记，领导希望你带头。”

“如果党号召我们青年学生到边疆农村去，我一定积极带头。”

“你的愿望很可嘉，”舒展变得很不耐烦了，“可是，西区中学决不是为培养送奶工、邮递员和普通农民而开办的。”

“你，你也看不起普通的工人农民？！呸！”宋舫浑身直抖索，说完这句话，头也不回地冲出校长室。

三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急涌而来，革命的学生成了勇敢的闯将。当年，那两个差点走上不同道路的小伙伴，现在成了一条革命路上的战友了。而且一般说来，在人们的印象里，虞鑫龙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似乎要比宋舫更坚决更出名些。记得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一传来，虞鑫龙立即从家里拎来一网袋《高等数学》、《大学教程》，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划了一根火柴，把书烧成一团灰烬；还指着一个暗暗哭泣的“尖子学生”温可芬训道：“怎么，你伤心了吗？绝望了吗？呸，当年为了两分之差，你爬在我们工人子弟头上的日子忘掉了吗？”这温可芬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林老师最宠爱的学生。那次作文比赛，虞鑫龙的作文尽管也受到老师的几句好评，得了个难得的九十分，可是温可芬更以九十二分的优越成绩，参加了市中学生作文比赛，取得了名次。虞鑫龙对此很不服气。宋舫劝阻他说：“这些同学都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得慢慢做思想工作。”他就严肃地批评道：“你呀，小姑娘长了个老婆婆心，这怎么造得成反？”《十六条》公布后几天，宋舫和同学们从农村参加双抢回

校,发现学校里大字报琳琅满目,却没有一张贴学校党支部和旧区委的,感到方向不对头,就带头起草了一张揭发副区长兼文教局长舒展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正要找地方张贴,虞鑫龙来了。他看完大字报,欣然挥笔添上了自己的大名,“虞鑫龙”三个字写得又粗又浓又大,还自告奋勇地贴到了黄楼校长室门口。这样,虞鑫龙带头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象阵风似地在西区中学校园内外传开了。

可是,慢慢的,人们对他们的印象起了变化。那是从复课闹革命前后开始的。

六七年十月,一个金风送爽的清晨,西区中学校园里,“嘀嘀哒哒”的军号声,“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声,“嚓——嚓——嚓——”的走步声,“杀!杀!杀!”的对刺声,都快把学校搅个兜底翻。这是西区中学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天复课闹革命。

校革会负责人宋舢娣笑盈盈地站在校门口,亲切地迎着一群群来复课闹革命的同学。她认识不少同学,喊得出他们的名字,反倒有些逍遥在家的同学不一定认识她。炊事员胖阿祥背着一袋面粉夹在人群里走来了。一见宋舢娣就唠叨个没完:“我说舢娣哪,这跟老早的学校大不同啦,大不同啦。舢娣哪,你们保证上好课,我们炊事房保证全体师生吃得又饱又好。”宋舢娣帮助胖阿祥卸下面粉袋,轻轻放在地上,拍打着他身上的面粉说:“阿祥师傅,往后,除了给大伙多做点花式包子,更要提醒提醒我们闹教育革命哪!”胖阿祥咧开大嘴笑了:“这还用说,还用说?”说着,兴冲冲地扛着面粉袋走向厨房。

宋舢娣笑着目送胖阿祥走去,又转向涌进校门的人流,看样子是在等什么。

“你们好哇!”虞鑫龙骑着部崭新锃亮的自行车老远招呼。

“你好哇!”红卫兵连长小扣宝打趣道,

“鑫龙,你今天是以区革筹小组成员身份来视察工作,还是来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呢?”

“去你的,就你这嘴巴子能说会道。”虞鑫龙愉快地揉了揉小扣宝一拳。他最近很忙,区革筹小组委托他联系文教系统,他很卖力,整天身不离自行车,在全区六七十所学校来回奔跑。

“小扣宝,让鑫龙说正经的,今天批判会上的发言准备好了吗?”宋舢娣把虞鑫龙拉到门房间,认真地问。

“那还用说。头头带头嘛。”虞鑫龙回答。

“批个啥题目。”

“谈谈修正主义路线下工农子弟的地位。”

“又是那个‘两分之差’吗?”红卫兵们碰到一起,就爱开玩笑打趣,这次轮到宋舢娣“进攻”了,“别忘了,我们两个都曾经是旧学校的‘学习尖子’,都受过毒啊。”

“别忘了,作文公开课上你那精彩的朗诵!”小扣宝笑着补了一句。

虞鑫龙白皙的脸红了一下,抵挡道:“几天不见,都长刺啦。告诉你,多批批这个,能使我们掌权的工人子弟不忘本!”说着,推了车就要进门。

宋舢娣说:“你先到梯形教室去。我等侯师傅。”

“他还没来?”虞鑫龙记起什么似地,轻声说,“舢娣,你说请侯师傅来上课,我随了你;可是你提出组织同学教师到工厂农村调查教材改革和教学改革,我不能赞成。”

“为什么?”宋舢娣问。

虞鑫龙说道:“现在的关键是‘复课’这两个字,好不容易把同学一个一个请到学校,不能再把他们放出去了。有些学校搞得还不错,除了上些批判课,还让一些教师自己编刻课本,上上文化课,‘复课复课’,你总要拿出些吸引人的东西吧;过去工农

子弟受歧视排挤，现在总要多给他们一些资本吧。”说到这里，愉快的虞鑫龙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没那么可怕吧。”宋舫娣乐观地说，“我倒听说，有所学校的个别教师把老课本，甚至外国课本都翻出来了，学生不愿读，说这和旧学校有什么两样呢？”

“那怎么说呢？大家都在摸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呀。总之，我们这些掌权的人要争气，复课闹革命总得比过去更正常，象个样吧。”虞鑫龙拍拍红卫兵袖章说道。

“‘正常化’，‘象个样’，这话是舒展讲的吧？”宋舫娣尖锐地问。

“舒展讲了又怎样呢，不要拿老眼光看人。”虞鑫龙说。

舒展现在属于虞鑫龙领导。因为他政治历史没发现什么重大问题，检讨时又颇为诚恳、深刻，便很快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区革筹小组讨论决定，让他跟着虞鑫龙到各个学校跑一跑，在斗争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帮助做些工作。舒展比过去谨慎得多，然而绝不象某些老干部那样谨小慎微。譬如说，要复课闹革命了，他就慷慨激昂地说：“小虞哪，前几天就有人诬蔑说，造反派红卫兵掌权连书都读不成了。这次复课闹革命可是个关键，一定要搞出个样子来。”

这些话自然也传到宋舫娣耳朵里，她一直在琢磨这些问题，这时，她对虞鑫龙说：“复什么课，象什么样，怎样走上正常，这都有路线斗争。”

“好了，现在我们不辩论这些。走吧，快上课了。”

“你先去，我再等等侯师傅。”宋舫娣焦急地朝门外张望起来。

“舫娣，不要等啦。”这时，从操场上走来一个五十来岁的邮递员，黝黑的脸膛，中等身材。原来，他早来了。刚才穿着邮电

工人的绿制服，排在红卫兵们的队伍里，“一二一”地走步，不注意是认不出来的。

“侯师傅！”宋舫娣亲热地奔过去，拉住了侯师傅的胳膊。

虞鑫龙锁上自行车，迎上去很有礼貌地和侯师傅握了握手。

宽敞明亮的梯形教室，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变得焕然一新。前面，刻有花纹的墙上，高高地贴着一幅毛主席语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乌黑的黑板上，是一行“热烈欢迎工人师傅来校上课”的美术字。红卫兵们济济一堂；听课的人也不少，连炊事员胖阿祥也挤在同学们中间。侯师傅他们一进教室，红卫兵和同学们一窝蜂地拥上去，又说又笑。高高大大的舒晓晋很尊重地把他们请到第一排。

宋舫娣稳重地在讲台前点着同学的名：“一号鲁军，二号肖辰星……”

同学们一个个大声喊“到”，当宋舫娣点到“三十五号温可芬”时，从最后排传来一声细微的“到”，宋舫娣停下来，急步走到教室后排，紧紧拉着一个女同学纤细的手说：“小温，你今天不是要发言吗？勇敢些，坐到第一排来。”温可芬感动地涨红了脸，胆怯地走到前面，在侯师傅身边坐下了。

“等一等，林老师也要发言批判；让他也上去。”红卫兵连长小扣宝挽着林老师的胳膊也走上了台。

梯形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宋舫娣点完名，合上花名册说：“同学们，老师们，今天中四、中五年级能百分之一百地回到学校，这是什么原因啊？”

原来，几天前，校革委会刚研究完复课闹革命的工作，虞鑫龙从区里派人送来了几大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还附了张纸条，说希望把这些通知发到每个同学

家里，做好宣传工作，使复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为全区作出榜样。小扣宝用力朝小纸条吹了口气，笑道：“嘘……变！我要是孙悟空，会使分身法就好了。”

宋舫娣说：“小扣宝，我有个比分身法更灵的法宝。”

扣宝说：“真的吗？那太美啦。快说！”

宋舫娣说：“向邮电工人求援！小扣宝，你忘了过去的工学运动？”

小扣宝乐得跳起来：“哎呀呀，我这脑袋瓜怎么就没想到。”

于是，几大捆通知被装上黄鱼车，宋舫娣在前面蹬，小扣宝坐在车上，正要往西区邮局送，迎面来了邮递员侯志春。侯志春给西区中学送了十来年报纸，对西区中学的现状和历史了如指掌。运动初期，他坚决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现在是西区邮局革委会的负责人。侯师傅把着黄鱼车龙头笑道：“知道你们这时准要来！是不是号召复课闹革命了？”“你怎么知道？”“邮递员走千家，穿万户，耳朵是最灵的嘛。”“哎呀，谢谢师傅们！”“谢什么，学校的事是大家的事。如果你们复课闹革命第一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邮电工人还想来发几句言呢。”

“真的吗？侯师傅，那你快说说。”宋舫娣迫不及待地从小扣宝车上蹦下来，不管侯师傅同意不同意，强按着侯师傅在街沿石上坐下来了。……她突然感到一阵羞愧，自己对工人阶级的了解，是那么肤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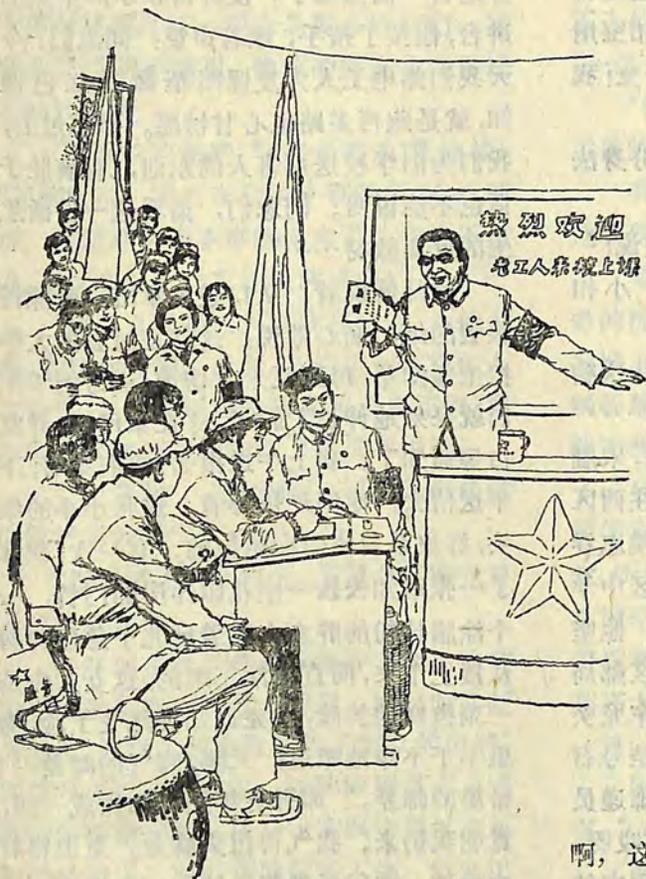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西区邮局一千多邮电工人发动起来了。短短几天里，西区不少工厂、机关、商店、居民住宅区都收到了《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听到了一番番热情洋溢的宣传……

宋舫娣把邮电工人的事迹介绍完，梯形教室又响起一阵掌声，红卫兵们站起来，纷纷向侯师傅致意。连虞鑫龙也为这“百

分之百”而感动了。侯师傅在掌声中走上讲台，他按了按手，颤着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邮电工人为复课闹革命送红色通知，就是跑再多路也心甘情愿。回想过去，我们为旧学校送那害人的东西，有满肚子话也不能说呀。同志们，请看这一份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侯师傅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揉得很皱的纸，痛心地说：“这就是过去的大学招生通知单。每到夏天发榜前，应考的学生们就呆呆地伸长了脖子，守在家门口、弄堂口等通知了。我上午送报去，他们等着；下午送信去，他们还是等着。这张小小的纸头，好象系着他们命运似的。有一次，我拿了一张通知去按一座花园洋房的门铃，一个涂脂抹粉的胖女人领着她儿子急急匆匆从楼上下来，简直是滚下来的，这女人先是一副肉麻的笑脸，看完通知突然变了脸，嘴里不干不净地嚎道：‘天哪，晦气的邮差，扫帚星的邮差。’那男青年把通知揉成一团，竟朝我扔来。我气得扭头就走。更记得有个女孩，她父母亲都是纺织厂老工人。她读小学的时候，还对我说：‘叔叔，我长大要当个女火车司机，为国家拉煤拉布匹，那多自豪啊。’后来她考取了西区中学，读了五年，一个活泼的小姑娘竟变得象老太婆了。发榜前几天，她天天守在新村门口，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那天，通知单终于来了，她捧在手里左看右看，又贴在脸上，泪水‘哗哗’地落下来，嘴里说着：‘啊，工程师的摇篮，我终于跳进你的怀抱。’一边，大口大口地咯血。那情景惨极了。我实在想不通，在我们这个工农当家作主的时代，为什么工农的子弟不愿当工农？！是谁坑害了他们？！”侯师傅愤怒地说不下去了。

在侯师傅的发言过程中，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宋舫娣一直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听，迅速记。当侯师傅激动地说



不下去时，她站起来插话道：“同志们，侯师傅举的这些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西区中学，就发生在我们周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座的人都会变成旧教育的牺牲品。让我们高呼，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会场响起雄壮的口号声。

“同志们，”侯师傅缓了缓说，“旧学校里最害人的，是那个资产阶级智育第一，是那条鼓励学生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大家说对不对？”侯师傅这时以简短的反问结束了他的批判。

“对！”“对！”

“狠批资产阶级智育第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宋舫娣带头呼起了口号。

这阵阵口号声震动着小扣宝、林老师、温可芬，还有虞鑫龙的心。

下课后，宋舫娣和虞鑫龙在革委会办公室谈心。宋舫娣总忘不了虞鑫龙那拍袖章的动作，便说：“小虞，还记得我这只袖章的来历吗？它为什么会戴在我的臂上？”

那还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猖狂的时候。宋舫娣和虞鑫龙那张揭发舒展的大字报引来了无数造谣谩骂。舒展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围攻他们，成天成夜不让他们吃饭睡觉。可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却有个披着雨衣的人，悄悄来到了他们的战斗组。他脱下雨衣，露出一身绿制服。学生们都认得他是邮递员老侯师傅。侯师傅小心翼翼地邮袋里取出一件珍品，激动地说：“孩子们，不要怕。毛主席支持着你们哪！”

啊，这是一尊用红绸裹着的毛主席石膏像。学生们顿时热泪纵横，围着毛主席像轻轻哼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那深情的歌。也就在那天晚上，宋舫娣用墨汁在那块红绸上写下了“红卫兵”三个字，虞鑫龙代表大家向全校宣布，西区中学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在战火中成立了。

“小虞，”宋舫娣深思着说，“我总在想，学生运动离不开工人运动。现在，学校红卫兵团和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可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在继续。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能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吗？我们手里的权能保持吗？”

虞鑫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思考过，便说：“还是谈谈眼前的复课闹革命吧。小宋，这一课对我启发很大……”

四

文化大革命这两年，黄楼的沉沉死气被一扫而光。那高大的砖墙上，总是贴着一批又一批大字报。特别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的前夕，黄楼上换上了大大小小的红纸，“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成了决心书的中心口号。怪不得宋舫娣喜气洋洋地说：“再贴下去，黄楼要改名红楼了。”

俗话说：“一花引来百花开。”这满墙的大红纸是被一张特大的决心书引出来的。一天深夜，有几个人开完会后，在黄楼前竖起了一块长黑板，又把五张大红纸粘成一长条钉在上面，写满了誓到农村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最后围着墨汁盆，嘻嘻哈哈地抢着往大红纸上签名。第二天一早，人们围着大红纸看，见字儿签得最大最前面的是校革会负责人、毕业分配组长宋舫娣。后面紧跟着龚扣宝、舒晓晋等一大群人。宋舫娣带头树起了赴内蒙战斗队的旗帜。年轻人青春的火焰呵，在熊熊燃烧！观看的同学干脆排队签起名来。瘦小文静的温可芬踮着脚焦急地张望，直到签上她秀气的字迹后，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也有人在这张大红纸前犹豫，他恰恰是区革会文教组副组长虞鑫龙。不错，两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么个季节，他曾勇敢地在校长室门口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把他的名字写得又粗又浓又大；可是今天，他满手的力量竟举不动一支小小的毛笔了。

“咣咣咣……”深夜十一点了。西区工人新村里，有一盏灯特别亮。一个慈爱的妈妈正在给女儿赶缝戎装。妈妈缝着，小小的针儿常戳到手指头上。女儿要远离妈妈，妈妈总感到依依不舍。为这，大儿子批评她说：“你不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亏你还是个‘工人阶级’哩。”小女儿依偎在她身边说：“妈妈，你是愁没人替你送牛奶吗？我也十二岁了，明天就顶姐姐的班。”其实，妈妈怎么会拖女儿的后腿呢？孩子们都是党一手拉扯大的。如今孩子能为党做点事了，妈妈心里高兴哪！

“妈妈，”女儿推门进来，紧紧攀住妈妈的肩头。

“舫娣，妈妈要向你提意见啦。”妈妈佯装生气。

“什么意见？”女儿顶真起来。

“不相信群众。”

“是为这个呀，”聪明的舫娣一下子猜到了妈妈的意思，“那我向妈妈检讨。”

妈妈“噗嗤”笑出声来：“你以为妈妈没文化就一定落后？一星期改了四个地方，一次比一次远，最后说定要到内蒙古去。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妈妈，好妈妈，”舫娣亲热地搂住妈妈，“一定是舒晓晋那炮筒子告诉你的。”

妈妈笑了：“妈妈都给你准备好啦，去吧，孩子，干革命妈妈总是支持的。”

“妈妈，你还要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女儿缠住妈妈撒娇。

“说吧，妈妈答应你。”

“一年后，让大弟也到农村去。”

妈妈深情地抚摸着两个熟睡了的的孩子，随即爽朗地笑起来：“你们姐弟三个要走，我一个也不留。”

性格刚强的宋舫娣从小不爱哭，可是现在，在这样的妈妈面前，她感到眼里一股热辣辣、咸涩涩的东西冒上来。一个被旧社会剥夺了学文化权利的劳动妇女，为什么能这样听党的话；而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人为什么同党的召唤背道而驰？她想着，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细心的妈妈询问道：“孩子，心里有什么事？”

“妈妈，”舡娣沉重地说，“我没有帮助好一个从小相处的战友。”

“孩子，不要灰心丧气，再去找他谈谈。”母亲鼓励着孩子。

虞鑫龙在家里独占了一个小房间。他平日里晚上回家，拧开小台灯，躺在床上翻翻书籍，实在感到惬意。可是今天，他心乱如麻，信手翻了几页书，就烦恼地合上了。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他徬徨着，犹豫着，区革会常委侯师傅语重心长的谈话，文教组长舒展劝他留在区里的种种理由，总是交叉地在他脑子里盘旋萦绕。

“鑫龙在吗？”一个很稳重的女中音在门外轻轻发问。

虞鑫龙迅速地撸了撸松乱的头发，恢复了平素那种潇洒自如的风度，他打开门，压低嗓门说：“啊，深夜来访，请坐请坐。”

“鑫龙，你有一个星期没回学校了。”宋舡娣在床沿上坐下，关心地问，“学校上山下乡形势发展真快。”

“是吗？你真不知道，区里有多忙哪。白天什么事都要找上门。晚上回家还要学点历史。”虞鑫龙解释道，翻动着几本书，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适宜的话题，“你看，历史上一个朝代怎样替代另一个朝代，这对我们现在掌好权很有启发性。”

“哦，”宋舡娣翻了翻书，直截了当地说，“最近同学们也在学历史，主要是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那两节，联系今天的实际，都很有启发。小虞，对于我们，更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还记得吗，有一次区里开批判会，我们俩跳上台，狠狠责问过舒展：‘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过去是革命的，今天成了走资派？’他想，我们也想。听说三九年他在城里读中学，受了党的影响，领头闹起了学潮，后来又背叛了资产阶级家庭，到延安去寻找革命的真理。冲过封锁线时，行李衣服全丢了，只剩下怀里

揣着的一本油印的毛主席著作。那时，他是革命的。可是慢慢的，他变得不革命了，甚至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那是因为他逐步脱离了工农，最后成了凌驾于工农头上的老爷。鑫龙，我觉得这是文化大革命峥嵘岁月给予我们青年最宝贵的经验教训。”

“人是会变化的。舒展变过去了，还可以变回来嘛。”虞鑫龙很有气魄地说。从内心深处来说，他许多思想跟舒展是合拍的。舒展欣赏他的精干敏捷，他也比较佩服舒展的足智多谋和果断有力。

“那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磨炼。小虞，对我们青年学生，更需警惕变过去。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我们有满腔热情，可是为什么在斗争最尖锐的关头，却左右摇摆、顶不住了呢？后来，形势有了好转，我们一些同志手里有了权，为什么又忘乎所以而犯错误了呢？这说明我们还拖着条小资产阶级尾巴，那是旧学校留给我们的。只有坚决走上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条尾巴才可能逐步斩掉。”宋舡娣从口袋里掏出张红纸说，“小虞，象六六年造反时那样，在这张‘上山下乡宣言’上签上你的名字吧！”

虞鑫龙苦笑地把红纸推回来说：“舡娣，现在我们身份不同了，考虑问题应该更冷静更全面些。如果我是个普通红卫兵，明天就可以打起背包奔赴农村。可现在，唉，叫我怎么说呢？老舒讲得也有道理，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造了反，掌了权，建立了功勋，我们走了，谁来掌这个权呢？”

宋舡娣听完这番话，浑身火辣辣的，淡淡的眉毛激动地扬起来，她痛心地说道：“小虞啊小虞，你是这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峥嵘岁月的吗？你变了。你要走上舒展的道路了。”

几星期后，正是“八一八”这个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火车站上，彩旗招展，锣鼓喧

天。一群群戴着毛主席像章、穿着军装的红卫兵们，携手并肩地照着像，互相赠送纪念品；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穿着工装的爸爸妈妈，拉着孩子的手一次又一次地嘱咐；市区领导同志也赶来了，向家长和即将奔赴农村的红卫兵们致以亲切的慰问。那欢腾的场面，那拥挤的人流，那一片好象火苗似耀动的红袖章，令人一次次地联想到两年前，登上北去的列车，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幸福情景。这种联想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侯师傅，敬礼！”一个穿着军便服，颈上挂着哨子的女红卫兵站在侯师傅面前，“向您告别了。”

“舣娣，祝贺你踏上新的征途。我也向你告别。”区革会常委侯师傅背着邮袋，看样子，他是送完邮件后直接赶来的。这几年，他跟红卫兵滚在一起，似乎更年轻了些。“只许你们‘北上’，就不许我老头子‘南下’吗？”

“真的吗？”

“告诉你，区革会已经批准我到云南西双版纳去参加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了。什么时候走还没有定。”侯师傅含笑说。

“太好了，欢迎您继续带领我们红卫兵战斗。”

这时，预备铃发出了脆而长的响声。宋舣娣“嚯嚯”吹起哨子，指挥战士们登上火车，然后悄声对侯师傅说：“师傅，小虞还没有来。希望组织上多帮助他。”

“舣娣，放心去吧。鑫龙的事，常委会已经讨论过几次。不过，我们对这场争夺人的斗争要估计得更复杂些。”侯师傅意味深长地说。

火车开动了，红卫兵向亲人们挥手告别。合着车轮隆隆的节奏，车上车下响起了一片雄壮的歌声。宋舣娣扶着列车的门杆，身后站着她的战友们。小扣宝的嘴角

总挂着调皮的微笑；身壮如牛的舒晓晋挺着胸脯，他是从家里冲出来的，他父亲舒展不同意他跟宋舣娣到内蒙插队；温可芬现在也戴上了军帽，穿上了军装，尽管显得不那么自然，然而她由衷地感到自豪。这时，虞鑫龙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宋舣娣看见了他，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可是看样子，小虞什么也没听清。她突然想起左臂上那只用红绸做的红卫兵袖章，便迅速撸下来，捏成火红的一团，朝茫然的虞鑫龙扔去。火车终于象匹骏马，喷吐着白烟，直奔远方……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宋舣娣和虞鑫龙。因为舣娣走后不久，我也到了黑龙江军垦农场。可是有关他俩的消息却不少。战友们告诉我，舣娣在内蒙古大草原放了七年牧，没回过城里一回，是个“铁杆扎根派”。现在她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不脱产的盟党委副书记。虞鑫龙在我们走后，又曾经走了段弯路。那是工宣队进驻文教单位时，有些人跳出来攻击反对，在这场斗争中，他没能站稳立场。可是党没有让他在弯路上走下去。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他终于对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当侯师傅带了一批青年到云南去的时候，他也跟着去了。每逢春节，若有机会回城探亲，我们这些红卫兵老战友少不了碰在一起，畅谈农村、工厂、部队的火热生活，尽情描绘明天灿烂的理想，也免不了从那两位老战友身上，谈谈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往往会激情涌起，情不自禁地合声吟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诗篇：

……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题图、插图：昭亚）



为革命委员会站岗的人

段瑞夏

我总记着一个人，他叫丁大宝。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并不熟。他是工厂修理部的一个工人。有人叫他“喇叭师傅”，因为他的修理部门口挂着一只高音喇叭，修理扩音机时用作试音，整天唱个没完，他本人，倒是很少开腔，厚厚的嘴唇上象挂了把大锁。也有人叫他“部长”，那是种揶揄，因为十个平方米的修理部，就他一个人。不论是厂长，或是刚进厂的艺徒，也不论你叫他“丁大宝”、“喇叭师傅”、“部长”，他都慢慢地抬起头，认真地回答：“哎，做啥啦？”因此，大家都觉得：丁大宝是个老实疙瘩。

修理部的那间小屋，工人们称做“耳朵房”。文化大革命前，总支书记兼厂长陈超觉得上门修理机器的人员繁杂，在工厂里进进出出诸多不便，就决定在厂西的围墙外，造了间小屋。原来一圈四方的围墙上，从此凸出了一块，真象个小耳朵。“耳朵房”有两扇门，一扇通厂内，平时关着；另一扇通厂外，门上钉了块一尺见方的小木牌，上面写着：红旗厂修理部。

丁大宝也象这间偏僻的“耳朵房”一样，引不起周围人的注意，可丁大宝对周围

发生的一切，却十分有心。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工厂的面貌大变。修理部也起了变化。第一是门口那只试音的喇叭，变成了个小小广播台，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播送党中央报刊的重要社论、新闻，过路的工人、红卫兵、送菜的农民，都会停下来听。第二是修理部的“修理须知”上，原来写着的“三天取货”，“三”字上改贴了个“隔”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一台扩音机就是一门大炮啊！丁大宝很懂这一点。另外，看大字报成了他每天的功课，我们在厂门口热烈的讲演、辩论，他也是老听众。但是，人们并不留意他。只有门房间的同志知道，丁大宝每天是第一个进厂，很晚才回家。

我第一次对丁大宝刮目相看，是在走资派陈超搞的一次所谓“保卫党总支”的大会上。这次会，陈超安排了几个老工人回忆对比，然后准备宣布我们几个革命造反派头头停职反省。当时，我们准备针锋相对，上台抢话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宣布成立工人革命造反队。

大会开始，陈超刚宣布：“下面由老工人发言。”丁大宝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地，一下子出现在台上，这使全会场都惊讶了——丁大宝在厂里十几年了，从没上过台呀。陈超疑惑地看着丁大宝，有点显得惊慌失措，因为他并没有安排丁大宝发言。

丁大宝看都不看陈超一眼，粗大的手很有气派地、重重地朝讲桌上一按。灯光照着他淳朴的脸膛，他睁大眼睛，象找人似地，眼光从台下每个人的脸上掠过。会场肃静了。

丁大宝说得很慢，很动感情，象烧开了的水壶在“扑哧扑哧”吐气，虽然断断续续，话却是滚烫的。

他说，他从小死了娘，八岁在香烟厂做童工，十一岁生了场肺炎，被踢出厂，差点死掉；十三岁，爹摔死在码头的“过山跳”下，爹的穷兄弟们送他进厂学生意，十六岁解放了，从此，他知道了什么叫温暖……

他说，他没有家，他把工厂当家。毛主席叫我们当家做主人，可是他当不好。他原是车间里的装配工，有一回，仓库里缺一种绿线，车间里流水线停下来了。他很急，去找技术员，问用蓝线代可以吗？技术员说可以，但要工程师签字；他去找工程师，工程师出差了；他又去找厂长，陈超说：“工程师决定的事，就得等工程师。”他想不通，回到车间和几个工人一商量，就用蓝线装上去了。陈超知道了，大发雷霆，硬逼着把蓝线拆下来。后来，工程师回来了，绿线也有了。这样的怪事很多。陈超看他不顺眼，是颗眼中钉。路上碰到他，眼睛不是看天，就是看地。最后，干脆把他调离车间，支到修理部那间“耳朵房”去。他照样高高兴兴地去了，可是，去了也不给陈超安宁。厂里一只产品A100扩大机，到农村、山区使用常出故障，有一次，贫下中农吵上门来，他带了贫下中农去见厂长，陈超很生

气，说：“机器都不坏，要你这个修理工干什么？技术问题有技术员操心，不用你管！”

丁大宝越说越气，一双手把桌子掀得“咯吱吱”响。他猛然向全场摊开手掌，放开嗓子喊道：“为什么我们工人不能管？我们就要管！毛主席号召我们当家做主人，工厂却把我们工人当机器，连拿螺丝刀、尖头钳的姿势都用图纸规定死了，就是不让我们做主人！……这些天来，我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我懂啦！束缚我们工人手脚的不是一个陈厂长，这里有一条路线，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从资本家手里把工厂夺回来了，修正主义路线要把工厂再送回到资本家手里去。就是这么回事！不搞文化大革命还得了吗？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拥护！对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要造反，一反到底！……”

丁大宝的声音浑厚有力，象从低音喇叭箱里发出来的，震得每个人的耳朵“嗡嗡”地响。陈超慌了手脚，他几次想打断，都被群众愤怒地喊住了。丁大宝的发言，使原来准备发言的几个老工人，都放下发言稿，沉思起来。丁大宝，多好的丁大宝师傅啊！我激动地跳上台，抱住他宽宽的肩膀，使劲摇晃着，不知说什么好。我接过他的话筒，趁热打铁，发起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次大会，打乱了陈超的阵脚，工人革命造反派在会上宣布成立了。

会后，我们许多革命造反派战士都涌到了丁大宝的“耳朵房”里。

“丁大宝，有道理！”

“喇叭师傅真成了向修正主义路线进攻的大喇叭啦！”

“‘部长’今天发言，比真的部长还有气派哩！”

大家热烈地议论着。感激、信任、尊敬的气氛交织在一起，挤满了小小的“耳朵

房”。丁大宝高兴地看着大家，坚决地说：“我参加你们！”一会儿，又说：“我们人太少。陈超今天组织发言的那些老工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啊。”我说：“对，一定要把全厂工人群众都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就这样，丁大宝成了我厂最早的工人革命造反派队员。他那间“耳朵房”也从此热闹了。开会、印传单、半夜值班，都是好场所。特别是有一个阶段，陈超不让厂外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来厂串连，“耳朵房”更成了最好的“联络站”。

一年过去了。一九六七年年底，厂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被选为革委会主任。丁大宝仍然在他的修理部。只是他把修理部门上的牌子油漆一新，写成：红旗厂革命委员会修理部。

丁大宝，永远是那么平凡。可他的有些事，却又那样令人难忘。

一九六八年年底的一天，深夜十点钟，家里人都睡了。我披着棉袄，在灯下修改厂革会的一年工作总结。窗外，风刮过电线，发出尖厉的惨叫；雪，“沙沙”地下着。玻璃窗框上，镶上了一条长长的“棉絮”，隔窗看出去，工房的屋顶都白了。

“小罗，小罗，”有人敲了两下门，接着，门口又传来沉重的跺脚声。出什么事了？我放下笔，赶紧开门：一个大个子站在我面前。棉帽子、棉大衣和手里拎的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上，都是雪。他浓密的眉毛上，凝结着水珠，宽大的白口罩上露出两只很精神的眼睛。我认出来了：“丁大宝！”没容他抖掉棉大衣上的积雪，我一把拖他进屋，关上门，连忙给他倒了杯热茶。

丁大宝脱去手套、口罩，接过茶杯，焐着手，并不吃，朝我“嗨嗨”地笑。

“回来了？”我说。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质量调查组去安徽农村，调查厂里的

产品 A100 的质量情况。

“刚下火车。小罗，这一回，A100 有救了。”他放下茶杯，使劲搓了搓手，“我们在农村做了各种试验，搞成了一种保护电路，蛮好。”他欢喜得脸笑成一朵花，拉开旅行袋，拿出一本工作记录本，送到我面前，好象一个小孩给人看心爱的玩具。

对 A100 的质量，丁大宝用了好多年心思了。这关系到如何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问题。这次革委会决定让他到农村去调查，他多高兴啊！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丁大宝就是个革命的有心人，你看，他终于找到了解决 A100 质量问题的办法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从他那本普通的工作记录本上，我看到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在风雨交加的恶劣条件下检测线路，进行各种试验；看到贫下中农通过改装后的 A100，可靠地指挥了一次抗洪战斗，机器连续工作十八小时……

“好极了。”我说，“大宝，我明天就告诉技术组。”

“要快啊，贫下中农盼着我们哩。他们说，新生的革委会，路线对头，就是好！”丁大宝站起身拎起旅行袋，一仰脖子，把一杯茶“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揩了一下嘴巴，笑着说：“这下，心里踏实了！”

踏着雪，我送丁大宝到公共汽车站。我说：“这次出去辛苦了，明天好好休息。”

“休息？明天是什么日子！唔？”丁大宝两眼含蓄地看着我，“嗨嗨”地笑了。他笑得很自信，象一个老师向学生提问。

哦，对了。明天，明天是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记得在去年的成立大会上，有人提出，今后，每年都把这一天当节日来庆祝。丁大宝却说：“光热闹没意思，不如开个座谈会，查查路线。”说得真好，大家鼓掌同意了。亏他的好记性，出去一个月了，还记着。也许，他就是特地赶回来

开会的吧？

“那……那你就快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见。”车来了，我送他上车，看着汽车在风雪的迷雾中远去。

回到家，我重新打开革委会工作总结，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革委会成立时的难忘的场面。记得当时刚写好的“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都来不及干，是丁大宝在他那“耳朵房”里，用两只红外线灯泡烘了一夜。挂牌子那天，厂门口披红结彩，锣鼓喧天，人们欢呼着，丁大宝“嗨嗨”笑着，任别人挤到他前面去。直到人散尽了，他还站在那里，盯着牌子看，神情很严肃。我走过去问他：“大宝师傅，你在想什么？”他看看我，指指那块牌子说：“从现在起，我们说话、办事情，都要对得起它。”他又告诉我，刚才没人时，陈超也悄悄来看看，陈超鼻子里轻轻哼了哼，摇摇头又走了。丁大宝说：“我们欢欢喜喜，不称心的人也有哩。”我听着，心头一热，似乎碰到了这位老工人滚烫的心。看着那块白底红字有些耀眼的牌子，再看看丁大宝那庄严的神色，我不禁深深感到，这位淳朴的工人已经把这神圣的牌子挂到心里啦！——每个人却应把新七二革命委员会记在心里

如今，革委会成立一年了，大批判搞得生气勃勃，清队工作正在进行，生产，已提前完成了任务，这个月的五百台 A100 型机器今天全包装好了。一年，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丁大宝这样忠实积极的群众支持下走过来的，当然，也是在少数人的反对声中走过来的。陈超，最近边跟卡车劳动，边检查自己的问题。运输班反映他在散布“革委会是临时的，新干部不长久”的论调。回顾一年的工作，形势是大好的，斗争还在继续呀。

第二天，政宣组的同志把会议室布置得很庄严，正面和左右两侧墙上，分别挂着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画像，后面墙上，六个醒

目的大字：革命委员会好。

下午三点钟，革委会委员、群众代表陆续来了，大家热情地交谈着。丁大宝来得很早，坐在后排的角落里，闷头吸烟。

我代表厂革会，报告了一年的工作，最后，我特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已提前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散会以后，就要向局革会报喜去啦！”报告完了，大家议论起来，群众对干部提了意见和希望，干部也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丁大宝一直在抽烟。他抽烟，吸得重，吐得轻。我见他脸色紧绷着，显得心事重重，不由有点纳闷：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叫他：“大宝师傅，你谈谈。”

“我谈谈！”他“噎”地站了起来，把香烟往地上一摔，直视着我，“我问你，今天早上五百台 A100 出厂你知道吗？”

“那是运到交电公司仓库去的。”我说。

“昨天跟你说了。为什么不加保护电路就出厂？你说，为什么？”说完，他胸脯一挺，脸转向大家，那神情是：“大家评评嘛！”

好个丁大宝！机器都装配好出厂了，你昨天刚带回来的保护电路怎么来得及装？关于保护电路的事我已跟技术组、生产组说了，明年安排生产时一定装。可丁大宝，竟这么性急！

“五百台机器，一返工，怎么来得及？”我见有些同志不解地看着我，就对丁大宝说：“你把情况向大家说说，讨论讨论吧。”

丁大宝有点生气了：“怎么能再把这种机器，交给贫下中农？只要产值，不顾质量，革命委员会，能这样做吗？”

“喇叭师傅说得有道理。”有人支持他。

“那也要有个过程嘛，文化大革命前出去几千台了，现在一共才五百台，而且质量也作了些改进。大宝啊，你看是什么日子了？要支持厂革会呀。一返工，任务就可能完不成，那，谁高兴？”厂革会副主任张裕

对地地不地地
或地地地地地地

慢条斯理地说。

“这……这啥话呢！”丁大宝愣了愣，厚厚的嘴唇微微抖了两下，“要是过去，我就不说了，说了没用。现在，成立革委会了，我不说不行。我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我们，要对得起革委会，对得起贫下中农。同志们，要对得起啊！”他一激动，声音就象喊出来似地，震人耳膜。

参加会议的人都陷入了沉思。门口，有个小青年手里拿着只镗锣，不时伸长头颈来窥探，丁大宝象赶小鸡似地朝他一挥手：“去！去去去！”小青年拔腿跑了，镗锣发出“咣啷”的声音，震得我心跳。这是政宣组组织的报喜队，等待会议一结束，就去局革会报喜，而现在……

丁大宝的眼睛盯着我，全会议室的人

都盯住我瞧，我的心有点乱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啊！

有人提议：“表决吧。”马上遭到大家的反对，那太草率了。已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饭后再开。人们散了，张裕对我说：“我有个两全之计。先报喜，过了元旦，再把机器车回来返工。你看怎样？”

张裕是个有经验的老干部，我知道，他是满心希望新生的革委会能一帆风顺地成长，这个两全之计虽是既报了喜，又对产品负责，可是，这样做总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我说：“再商量一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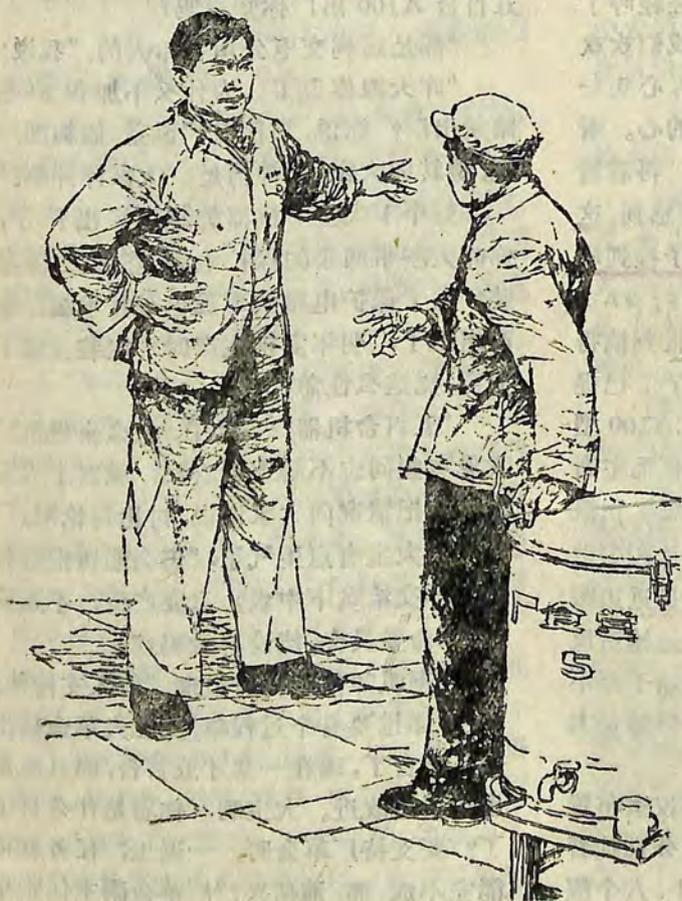
我们一起到食堂去，远远听到了丁大宝和谁吵起来了。我一看，原来是和还在靠边劳动的陈超。

“大宝师傅，你一个修理工人专门跟领导撬七撬八，有啥好处呢？机器早进了仓库了，还能追回来？”陈超说。

“不错，我是个修理工人，可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了，机器就是能追回来！”丁大宝说。

“嘿嘿。”陈超淡淡地笑了笑，“革委会好是好，可我们厂这个革委会，连你大宝师傅这样的老实疙瘩都意见一大堆，怎么说呢？”陈超不冷不热地说着，突然，他瞪起眼睛，说不下去了。只见丁大宝两手捏成拳头，额上暴出了青筋，嘴唇闭得铁紧，朝他一步步走近。陈超见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革命委员会好嘛，这谁不知道呢？”说着，拉拉衣服，转身走了。

“不要跑！”丁大宝猛地大喝一声。“怎么？”陈超站住了，脸上竭力想笑，但总有点尴尬。



丁大宝回过身，看了看围上来的群众，然后走到陈超面前，点住他的鼻梁大声吼道：“对的，全厂都晓得，我丁大宝对革委会有意见，一点不假。我是提醒革委会，新班子、新人马，也要防止走老路。你陈厂长对革委会不称心，这也是全厂都晓得的，你是想扳倒革委会牌子走老路，这一点也赖不掉。想钻我丁大宝的空子，办不到！想看革委会垮台，你昏了头啦！你要好好交代问题，改造思想。”

“这，这，我也是随便说说嘛。”陈超见群众越围越多，连忙点着头走了。

丁大宝喘着粗气，指着陈超的背影对我说：“这家伙，今天早上，A100出厂，他躺在卡车上对我说：‘丁大宝，看清楚，A100又出厂啦。’他高兴哪！”

“他！”我咬住了嘴唇，对陈超的义愤和对丁大宝的感激，在我胸中翻腾。革命委员会，从它在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风雨中孕育的时候起，不同阶级的人，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咒骂它，有的祝福它；有的在它脸上抹黑，有的为它锦上添花……而它，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毕竟以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了。它的生命力，来源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源于千千万万个觉悟的无产者，千千万万个丁大宝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眼里，他们算不得英雄，但是，唯有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我们这些主持革委会工作的人，该怎样千倍万倍地警惕，要一步不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紧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啊！

“就是完不成任务，也要把机器追回来！”我下了决心。

“任务哪能不完成！”丁大宝不解地看看我，“你不相信吗？拿点干劲出来，笃定完成。笃定！”

“对，我相信。马上开会动员。”看着丁

大宝自豪的笑容，我感到踏实，充满了信心。

“行，就这么办吧。”张裕摘下老光眼镜，在一旁使劲擦着。

晚饭后的会，把陈超也“请”来了。真是路线斗争，一抓就灵。革委会成立一周年的座谈会，开成了个路线斗争教育会；开成了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会。会后，我们立即把早上出厂的五百台机器拉了回来，离元旦只有五天，战斗当晚就打响了。

五天奋战，全厂捏成了一个拳头；五天奋战，丁大宝没离开过厂；五天奋战，抢来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报喜队打起锣鼓，上了彩车，新写的喜报格外引人。要开车了，却不见了丁大宝。我寻到他那间“耳朵房”，推门进去，只见他盖着值班用的粗布棉大衣，仰卧在两张并起来的长靠椅上，大手大脚无拘束地伸展着，鼾声打得雷响。我呆住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象电流一样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感到周身发热。我脱下自己的棉大衣，盖住他挂在外面的双腿，尊敬地看了看他那淳朴的脸膛，然后出来，轻轻带上门。

我小跑步到厂门口，示意大家停了锣鼓。等车开出厂一站多路，锣鼓声才欢天喜地地喧腾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汹涌奔腾，不断冲刷着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垢，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无产者，不断在斗争中挣脱身上的锁链，显示出历史创造者豪迈的本色，灿烂的光彩。丁大宝，人们还是叫他“喇叭师傅”，那是因为在讨论革命和生产的大事的时候，总会听到他那熟悉的，好象从低音喇叭里发出的浑厚的声音。也还有人叫他“部长”，那当然不再是什么揶揄，而是一种尊称：普普通通的工人，胸中却装着整个工厂，整个国家的宏图。

前年，丁大宝入了党；去年，他到局

七·二一电子工业大学读书去了。我由于最近调到公司革委会工作，和丁大宝见面的机会少了。可是，当我每天走进挂着鲜红的“革命委员会”牌子的办公大楼时，我总怀着深深的敬意，想起他——丁大宝。

正是千千万万这样觉悟的无产者，在日日夜夜地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站岗啊！

(题图、插图：施大畏)



编者按

今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本刊将继续一九七四年以来的《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这一期发表的《峥嵘岁月》和《为革命委员会站岗的人》都是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专业作者积极投身到当前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拿起笔来，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奋斗！

高瞻远瞩



董德兴 胡廷楣

一年前，桥北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志青，这个曾经当过互助组长、合作社主任的赤脚人，当上了县委书记。上任时间不长，满县人交口称赞新来的书记目光远大。

不过，初与这位赤脚书记接触，往往会失望。他的眼睛毫无出众之处，岁月的风霜雨雪在眼梢旁刻下叶脉筋筋一样深深浅浅的皱纹；两只眼睛既不会闪出侦察员一样机灵的光彩，更不如演员那样富于表情；倒是因为起早落夜，眼球上常常张着一层红色的网。上了几岁年纪，看材料眼睛常常要眯起来，戴上花镜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有人猜想，这双眼睛还抵不上平常人吧？

可是，接触多了，就会感到老杨的眼光不一般，用办公室主任老魏的话来说，就是

“高瞻远瞩”。县里关于老杨的传说颇多，这里辑录的，只是几小段。

--

上任第一天，在机关欢迎会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种田人。身材不高，背有点驼，戴顶发白的蓝布帽。蓝格子土布上装的肩背上有一个斜斜的大补丁。他向大家招招手，动作多少还有点不自然。等到他把铺盖搬进办公室后，机关里的人就不大见到他了。他出门进门两头见星星，办公室里只过后半夜。每天一早跑点之前，他还总要在县城东门菜市场停停看看。

办公室主任老魏要找书记的心最切。他最近二访桥北大队，一次调查，一次核

实，蹲了十几天，总结了一份培养接班人的经验。报社催着要发，他想找杨书记签个字，等了三天没有等到。

第四天，老魏早早起来，去推办公室的门，却见门上用大头针钉着一张纸条。那纽扣般大小的钢笔字是老杨写的：

有事请先找办公室主任老魏。

笑话！让老魏自己去找老魏？他慢吞吞走下楼梯，正遇上一个戴蓝布帽的人往上走。老魏一见新书记，就说：“我正在找你。这是桥北的材料，你看看。”

杨志青接过稿子，读了又想，想了又读，末了，他把稿子平平整整迭好，放到上衣口袋里。

老魏问：“怎么样？”杨志青没有回答。老魏伸手向他要回稿子：“就算通过啦？”

“不，稿子还得改。”杨志青眯缝起那双眼睛，意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培养接班人就讲培养青年干部？这还不够。老魏，再到桥北去一次吧，叫小车到东门等我们。”

又是东门！老魏想，那个菜市场还看不够！两个人走上了一条石板路，跨过一顶石桥，便来到东门菜市场了。

三四辆手扶拖拉机停在一旁“吭吭”喘着气，地下长长一排箩筐，青菜绿，萝卜白，辣椒红，实在招人喜爱。杨书记的大脚迈过整个市场，眼皮连抬都没抬，却在市场尽头停了下来。他拉拉办公室主任的袖子：“老魏，你看！”

那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蹲在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只菱形的鱼篓，孩子怕还没有睡醒，胖胖的手不时揉着眼睛。觉察到面前来了人，孩子便抬起头来，机灵地揭开篓盖说：“伯伯，称几条河鲫鱼吧。一元一斤，条条有半斤重哪，新鲜！”

老魏的眉心聚成个“川”字，咕了一句：“小毛孩子，学得这样精……”

杨志青蹲了下来，把孩子搂在怀里，给

他搓着沾满泥巴的衣襟：“爸爸呢？”“上河工去了。”“妈妈呢？”“开早工割稻去了。”杨志青抬起头来，和老魏对看了一眼。

孩子被两个大人问怕了，差点儿哭出来：“我放假了，隔壁孙有财叫我又了鱼来卖的。他说卖了鱼可以去买丝网……我不卖啰！”

老魏双手叉腰，感慨地摇了摇头，说：“孙有财？是富裕中农吧？小生产自发势力相当顽固啊！”

杨志青护着孩子，问：“你叫什么名字？”“小顺。”“小顺，我们坐汽车去好吗？”孩子点点头，跟着两个大人一起向城外走去。

“他的父母也真糊涂！”老魏看了一眼孩子背上的鱼篓说，“这孩子以后就这样给他当家？”

杨志青突然站住了。老魏看见，对方的眼睛闪亮了一下：“这话问到我心里去了。社会主义也是个大家业啊！现在我们在当家，以后呢？”

老魏的心被这话语猛敲了一下。

吉普车在宽阔的公路上疾驶，金色的稻田，崭新的农民新村，擦身而过。小顺在老杨怀里睡熟了。老杨看看蹒跚在怀里，鼻子微微噙动的孩子，深情地说：“十年后，正是队里的好劳力。二十年后呢？三十出点头，已经要挑大梁了。我们这代人把全县都变成象大寨那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孩子们长大，会不会又变过去呢？要看到接班的一代人啊！”

老魏听着，深深地地点着头。

太阳越升越高。桥北大队靠公路的那大片稻田映着阳光，象一片黄金的海洋。割稻的，镰刀一耀一耀；挑担的，扁担一悠一悠。割过的地里，人们正在开沟，一道道笔直的深沟，把地块划成许多整整齐齐的格子。下了车，他们让孩子坐在田埂上，一人

拿一把雪亮的锹，和桥北的社员一道挖起沟来。

“伯伯，喝茶喽！”两个七八岁的胖孩子用扁担挑着茶桶，其中一个孩子踮起脚，端着碗茶水递给老魏。老魏不介意地接过来，碗边刚刚碰到嘴唇，却看到杨志青在一旁扶着开沟锹，两只深邃的眼睛在向他笑着。他心里一动，茶水甜甜地流过了他的心头。

身旁不见了两个孩子。老魏一转身，发现那两个孩子正把他的开沟铲插到地里，四只手，两个小胸脯压在铲把上，两张小脸憋得通红，边插，边在喊：“加油！加油！”好不容易，才挖出半尺长的一截泥，累得他们胸口一起一伏直喘气。老魏说：“歇歇吧！”那两个孩子尖着嗓子稚气地回答：“大干快上，不能怕苦怕累！”老魏抱起一个孩子，问：“小胖子。你长大后干什么呀？”“我要做老愚公。”孩子的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一群孩子“上工”来了。最小的孩子头上套着小篮子，象麻雀一样嚷着，在地里散开，你追我赶，捡稻穗去了。几个男孩子挑着饭盒子送饭来了。人们围成一圈，坐在打谷场上。有个扎红蝴蝶结的女孩子站到人们中间高声朗诵“桥北大队红小兵农业学大寨宣传队演现在开始！”一时，鼓乐齐奏……

老魏暗暗点头，心里有点明白了老杨为什么要带自己到这里来。这时，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同志坐到老魏身旁，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你在收集培养接班人的材料吧？老杨让我给你介绍点情况：我们是怎样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孩子们的。”原来，他是桥北小学的责任人，红小兵宣传队的领队。谈了一会，又有个须发花白的老人颤颤巍巍坐到老魏的另一边说：“老魏啊，老杨让我给你介绍介绍。”原来，他是这

个村子里的老雇农，五保户，孩子们的辅导员。大队长也扛着根扁担，笑哈哈地在他对面坐下了。

老杨走来，用自己那顶蓝帽子扇着风，对老魏说：“我到面上去跑跑。小顺托你送回家去，再跟他的父母谈谈。……”老魏往田埂上一看，早已没有那个孩子的踪影，田埂上散着一堆鱼，鱼篓斜放在一旁。他又往田里一看，小顺已经混在孩子们中间，在相帮老伯伯捆稻。……

深夜，雪白的灯光洒在办公桌上，老魏三访桥北村归来，正在修改那篇稿子。这时，他感到杨志青看问题确比自己深得多……

二

这一天，县委常委开碰头会，讨论机关革命化。杨志青半个小时前就到会议室，坐在角落里整理这几天下乡调查的笔记，翻着翻着，他脑海里浮现出两天前的一件事情来。他到周圪公社开调查会，一个剃平顶头的年轻人从办公室窗口伸进脑袋来，火辣辣地放了一炮：“你们县委老爷作风太严重！再不改，我就来轰！”会议一结束，杨志青到处找，终于在鬲泥船上找到这个小伙子。杨志青卷起裤脚管，脱下鞋子，看准了，一跳上了船。他从小伙子手里接过鬲泥夹子，一边鬲泥，一边谈心。小伙子告诉他，他们两个公社相邻的三个大队准备统一规划，搞治水改土，对社界要作个小调动。就写了个报告请县委审批，谁知交上去一个月，还没有回音。小伙子指指脚下这条弯弯曲曲的旧河道，说：“你看，河泥都快叫我们挖干净了，可是报告不批，我们就不能填，真急人！”杨志青记下了这件事情；同时又想到来机关几天，看到一些机关人员接待基层同志虽然笑容可掬，可是

却象打太极拳一样软绵绵地把人应付走了。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让群众的积极性来促促县委吧！……

七点正，九个常委们来齐了。

杨志青一开始就讲县委干部要参加劳动，深入基层。副书记张正山不以为然地叹了口气：县委的工作千头万绪，老杨啊，你现在是一县之主啰，许多事等着你坐镇处理，得改改那种“游击作风”啦！

突然，一阵自行车铃声清脆地响起来，张正山往窗外一瞥，八辆自行车鱼贯而入，为首的剃着平顶头，正是那个向杨志青开炮的小伙子。

会议室的门开了。八个社员走了进来。八张朴实的脸，有的年轻，有的老练，然而一概严肃而又激动。

“老杨，我们来了！”平顶头冒出一句。

杨志青心头一喜，诚挚地把大手往里一伸：“来吧，到里面随便坐。”

随手给他们每人倒了杯水说：“群众眼睛亮又明，看问题尖锐，大家提提意见吧！”

“我要向张副书记提条意见！”“平顶头”又开了一炮。话未说完，杨志青摆摆手，说：“不要这样讲。我们县委是集体领导，意见就提给县委吧！”

“我们调整地界的报告打上去等了一个月，为啥连回音都没有？”

“上次县里讲，今年三秋涝荡地下水位高，请大家想想办法，我们这里搞出了一点儿经验，送来过三次口信，为啥不来总结？”

种田人说话干脆，一人一句，七嘴八舌说完，便都闭了嘴。这阵排炮一轰，几个常委纷纷议论，点头称是。独有分工留守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张正山很不自在。

想不到“平顶头”又站了起来，拿出一卷纸，说：“老杨上次到周圩开调查会，我们几个小青年受了点启发，写了几句顺口溜。”

杨志青说：“好！念一遍。”小伙子写的是：

“农业学大寨，

县委要下来，

若想快刀斩乱麻，

改变作风下大队！”

张正山脸上感到热辣辣的。杨志青用热情的眼光看了老张一眼，离开座位，找秘书讨来纸笔，戴起花镜，把四句话抄到纸上，亲自用两只图钉把它揪到雪白的墙壁上，转身环视会场一周，说：“这一炮轰得好啊！不过应该先轰我没有带好班。这样吧，我们今天的常委碰头，现在就改成个‘扩大’会，请大家一起参加吧！”

八个赤脚人相互交换着眼色，有点愕然。

县委常委们议论纷纷，都说这个主意好：搞好机关革命化，也得依靠群众。这时，张正山从文件夹里翻出会议议程，说：“那么开始吧，会议第一条先讨论干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

人们刚坐定屁股，冷不防有个常委建议说：“老杨，这会讨论干部参加劳动，我看干脆放到下面去开，怎么样？”顿时，会议室里又闹腾开了。

杨志青走到小伙子身边，问道：“到你们那里去开怎么样？”

“平顶头”一拍胸脯：“好！”

“老张，我们搬会场怎么样？”杨志青笑着问张正山。“好吧。”张正山点了点头。杨志青立即叫来了秘书：“麻烦你到各组室兜一转，把空闲的自行车全部借出来。”

十多骑自行车前前后后排成一串，飞速向工地驶去。带头的是杨志青。他双眼注视着前方，车轮转得飞快，身后书包架上，坐着县委副书记张正山。

半个月后，经过几次开门整风，县委大楼门口布告栏里，新张贴了一张醒目的公

告。题目是：《关于县委干部深入群众参加劳动的几项规定》，里面颇有些特出的条文。例如，第三条规定“县委干部每年要当一个月社员，一个月生产队长，一个月大队长”；第五条规定“县委碰头会一般在晚上举行，有时可邀请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等等。连署名也别具一格：上行是“县委、县革委会常委”，下行是“贫下中农蹲点小组”。

四层大楼空荡荡的，楼下原来的休息室里摆着一张大乒乓桌子，坐在那里办公的只有三、四个人。

其中一位是半月前来县委提意见的“平顶头”。他一坐到这张乒乓桌前，耳边就会响起杨书记嘱咐他的话：“去吧，小伙子，你代表全县三十九万贫下中农去管一管我们县委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此刻，他面前正放着一迭县委班子下乡的思想小结。第一份上，钮扣大的字写着：杨志青。

另一位是张正山，因为他年老体弱，杨志青建议他留在县委看家。他回忆起老杨背起铺盖下乡前和他长达三小时的谈心，心里总是非常激动。老杨说得对呀，共产党人的眼睛不是一台精密无差的仪器。让我们和群众滚在一起吧。群众，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群众，会增长我们的见识，使我们的目光锐利起来。这时候，一只电话“的铃铃”地响起来，他握紧话筒：“怎么样？大队农具厂正在试制开深沟的新式锹？……对，需要技术顾问，我马上和县办厂联系一下。好！好！”他放下电话，推起了门口的自行车。

三

五月阳春，江南田野空气分外清新。公路上稳稳走着一辆自行车。此人是横山公社党委书记吴根兴，他当年和杨志青一起

替地主打长工，后来又一起闹土改，搞合作社，算是老兄弟了。老吴也算是一位有眼力的人物。一次巡回检查三麦，几个队干部指着一块穗大秆齐的麦子啧啧称赞，都说产量在五百斤以上。老吴左看右看，又插进田里拔了几枝麦子，说：“我看只有四百五十斤。”别人追问，他指着手里的麦子给大家看，原来，麦子染上赤霉病，外表不错，粒子却瘪，后来收成一过磅，果然如老吴所说。这样，老吴“眼睛比秤还准”的名气也就传开了。这一回，轮到杨志青下队当社员，恰好在横山公社横山大队。吴根兴非常高兴。横山大队是他心里的一块宝。全县先进单位除了桥北就是横山，亩产二千一，分配又最高，领导、群众上下都满意。老吴想推广横山经验，这次听说杨志青到横山当社员，正是好机会，他一大早就骑车往横山赶。多年的老兄弟要见面，两脚一用劲，不知不觉到了横山。

杨志青正和社员在田里耘稻，听见铃声一抬头，见是吴根兴，在田里撩把水洗洗手，便向路上走来。

“多壮的秧苗！老杨呀，这是特地从外地换来的好种子。”吴根兴弯腰抚摸着地里黑绿的稻秧，第一句就说了这样的话。

杨志青嚓嚓几下，拔出一把稗草：“草也不少哇，人家耘三遍了，这里还只有耘两遍。”

走过一片叶子肥厚、茎秆粗壮的棉花地，吴根兴啧啧地赞叹：“没话说了。一枝枝象小松树，这长绒棉亩产一担是没有问题了。”杨志青看得更远一点，看到了棉田尽头那截沟梢头，约有二亩地，长着水茭白、芦竹，中间浮着草萍。他又审度了一下地势，两边的格子田到沟梢头都缺了只角。于是，沉思了半天说：“那条沟，五年前我来参观时就在，可现在还没有填掉。”

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个以“眼光如秤”

出名的老兄弟，此刻都闷头走路不说话了。吴根兴推着自行车，默默地想，志青为什么一到横山东不看，西不看，偏偏看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是因为对先进队要求特别严格？杨志青脑子里盘旋的东西比吴根兴要多些。横山这个队，产量和收入是攒得响的，可是，先进队的标准单单就是产量和收入？稻田里草兴，来不及耘，村前那么大一截沟梢头宁愿荒废不去填，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排有点气派的“七路头”新房子座落在村头。青砖，红瓦，挂着队办厂的牌子，外面围着青砖砌成有格子花纹的围墙。窗洞里，一红一红地闪着亮光。走进院门，半院子堆着瓦片、红砖和水泥预制板。

这回是杨志青先说了：“看来规模不小哇！”

吴根兴一指院子里堆的那些东西：“厂子很有前途，他们还准备扩建。”

杨志青点点头。沉思了一阵，问：“大队党支部书记呢？”

有人把杨志青和吴根兴到来的消息通知了支部书记。这个年轻人从屋里出来了。他长得眉清目秀，看上去颇为精明。两手黑腻腻地沾满油，身上的衣服也象从油泥里刚刚泡过一样。他转动那双精明的眼睛向两位书记笑笑，算打招呼。

“又熬夜啦？我一眼看出来。干劲大是好的，也要注意身体！”老吴又怜爱又责怪地说。

杨志青到厂里兜了一圈，向年轻的支部书记问了个问题：“我们横山大队稻秧第二遍耘了多少啦？”

年轻人有点抱歉地说：“我找会计去，数字他都掌握。”

杨志青又问：“能向我谈谈抓两条路线斗争的体会吗？”

年轻人有点不自然了：“这，这……副

书记都知道。”

老杨那双眼睛停留在支部书记脸上，说：“不必啦！我以横山大队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向党支部建议，领导班子坐下来揭揭矛盾吧！”

小伙子一楞，低头沉思起来。吴根兴满脸不高兴，他一肚子闷气放出来了：“横山大队的成长一向很顺利，有什么矛盾可揭的？”

杨志青拍拍吴根兴的肩膀，胸有成竹地说：“先进单位也有矛盾，群众也有反映，我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社员提个建议嘛。”

吴根兴咬咬嘴唇，说：“好吧，揭就揭，我参加。”

杨志青转身亲切地问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能借给我一把橹吗？”不一会儿，杨志青扛着一把橹，同刚才一起并肩耘稻的老贫农登上了船。杨志青的赤脚稳稳站在船上，熟练地摇着橹。老农坐在船梢头，一前一后，一问一答地谈起了话。在“嘎——吱，嘎——吱”的橹声里，小船拐过一个弯，隐没在芦竹丛中，向沟梢头摇去了。

午休时分，生产队宽敞的库房里，揭矛盾会议开始了。吴根兴一五一十把杨志青与他的对话讲了一遍。不讲犹可，一讲就把大家的话头全引出来了。有个小队长站起来说了一句：“这种会，早就要开了！”人们“哄”地一下站起来，七嘴八舌地揭起矛盾来。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地开机关枪；小青年发言嗓门大，三里远都听得着；上了年纪的人声音不高，但一句是一句，份量重……

矛盾揭到最后，大概是这么几条：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大量被工副业生产占去了，所以农田管理只好粗一点；支部热衷于增加社员收入，搞小工业，对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兴趣不大。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听

到这么尖锐的意见，止不住脸红起来，心口别别跳。吴根兴一向以为横山大队这个典型牢靠，今天这些问题一一提出来，却逼他重新思考……

库房里争辩得十分激烈的时候，杨志青正撑着小船在沟梢头兜圈子。摇一段，竹竿插到水里，量量河泥的深浅，在簿子上划下几笔。兜了一圈，他们踏着河埠头的石级上岸，相对坐在河边。杨志青用自己的大手在地上抹出一片干干净净的方块来，往老农身边凑凑，问：“队里劳动力多少？”“船只呢？”老农回答一句，他便侧着头，用一块小石头在地下划出一个歪歪斜斜的数码，排出一道道算式来。算完，他讲解了一遍，又与那老贫农交换一下眼光：“怎么样，心里有数吗？”

“有数！”老社员伸展一下他那双盘着青筋的大手，“我早就想填哩！跟支书说，他听不进。只要党支部来找我，我就给他当顾问！”

杨志青充满信心地说：“他会来的！”

年轻的支部书记正好到这里找杨志青。他满脸愧色，犹豫了一阵子，对杨志青说：“老杨，我错了。我没有带领大家真正走大寨的道路……”

杨志青呵呵地笑着站起来，一双眼睛象看穿了年轻人的那颗心：“有没有决心？有决心就好！再变过来嘛！真正从心底里学大寨！”

“队委会一讨论，准备把沟梢头填平。”年轻人鼓起勇气，又补充了一句。

“好！给你请了个顾问！”

年轻人往那里一望，老社员正笑着向他点头。他一阵激动，不由往杨志青身边靠靠，说：“今晚社员大会，请老杨作报告！”

“不不不，我是来当社员的呀！又不是来撤你的职！”杨志青那双眼睛微笑着看着年轻人，那眼光里，有鼓励，更有信任。

十五的月光洒在拖拉机路上，把两个并肩的人影拖得长长的。吴根兴推着自行车，杨志青送他回公社。他们走过沟梢头，棉花田，水稻田。吴根兴触景生情，长叹了一口气：“横山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左看右看不知看了多少遍，今天才知道，我的眼睛只会‘称称’产量。”

杨志青一时没有回答，走出几步，才说：“我们心里这杆秤，首先要用来称称社会主义有多少，资本主义有多少。先要看准两条道路这个‘定盘星’啊！”吴根兴听到心里去了。他觉得眼睛一下子亮了许多。

四

转眼又是三秋。全县有八个公社摆开了填浜开河造田的战场。数张泾公社的规模最大，集中了一千名战将。杨志青和县农业局局长老陈亲自在这里蹲点，领导社员群众填没弯弯曲曲的张泾浜，新开一条笔直笔直的张泾河，重新规划张泾公社的土地。

正是中午收工时间，挖河的人们熙熙攘攘往回走。食堂的那个芦席棚对面，一块五米来高，用毛竹和芦席搭成的宣传牌上，贴了一幅大字标语：“改天又换地，建设新家园。”下端分别贴着“张泾浜现状图”和“张泾河远景图”，红红绿绿，分外醒目。老陈是这张宣传牌的设计者，他正指挥着两个年轻人在挂着横幅，一回头正好看到铁姑娘队队长小田在一旁看规划图。老陈一向爱开玩笑，这下他逗小田：“铁姑娘，梨树苗都运到了。”他指指远景规划图上一小块写着“梨园”的深绿色方块，“以后梨子熟了，我老陈嘴馋了，找你讨一个总给的吧！”

“去去去！”小田解下自己腰上的围身，拍打着裤管上的灰沙，深情地瞥了“梨园”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叹了口气说：“给

你？怕我自己也吃不到！”

“为啥？”老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们身后，扁担上挂着两只空畚箕。

老陈故作神秘地说：“人家小田找上对象啦，在外县！”

小田笑着啐了他一口：“这老陈，最坏！”抡起铁镢，装作要打老陈的样子，惹得周围人哈哈大笑。

老陈爱开玩笑，这回却认真地说：“种瓜得瓜，种豆收豆嘛，怎么能让你种了梨子尝不到味儿呢？你别担心，梨子熟了，我老陈准给送上几箩筐让你们小夫妻俩吃个饱！怎么样？”

小田一跺脚，扛起铁镢就走了。

人们渐渐散开了。杨志青陷入沉思中。他在宣传牌前站了一会，把两只畚箕一送，坐在上面，掏出工作手册，戴上花镜，搓一搓手上的泥巴，一笔一划写起来了。傍晚时分，他把张泾公社的干部、来参加劳动的县委委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会场就在工地的简易饭厅。木板搭起的长棚子里，横七竖八的长凳排成个圈子。一盏临时拉来的电灯发出白灼灼的光。杨志青披着一件薄薄的对襟夹袄，安详地与每一个新来的同志打着招呼。他的面前是一张普通的长条饭桌，饭桌上，放着他那本工作手册。老陈发现，整整一个下午，在工地挑土间隙，杨志青总要拿出这个本子来写，少说也写了七八张。此刻，当杨志青一翻动那个笔记本，许多人摸出自己的笔记本，把钢笔的笔帽拔开了。

杨志青扫了会场一眼，看看人已来齐，就把中午收工时候，发生在宣传牌前的那一段对话，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一遍。

会场里寂静无声，人们等待着县委书记报告的下文。可是，杨志青稳稳地坐在那里，肩上披着那件夹袄，不时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终于，有个年轻干部忍不住

了，他催着杨书记：“老杨，再往下说呀！”

“先请大家议议这件事。”

刹时，会场里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抽烟的，点燃了烟忘了往口里送；准备记录的，收好了笔记本。忽然，有人笑着用胳膊肘撞撞老陈：“你这家伙，怎么会想到讨生梨吃！”

“哈哈！”有几个人跟着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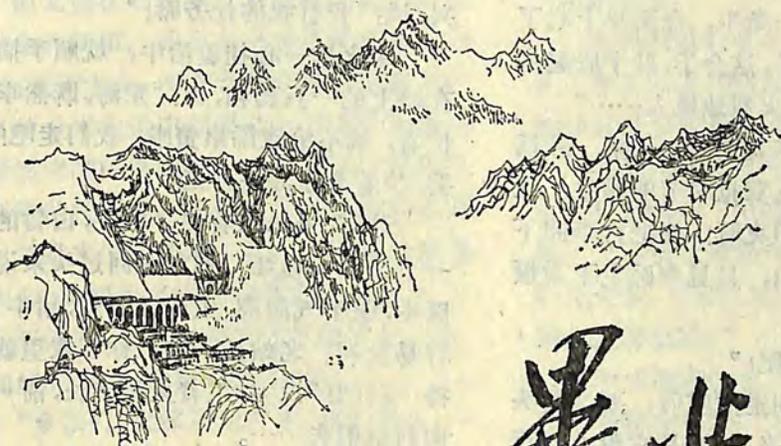
“不要笑，同志们！”杨志青站起来，他的目光扫遍全场的角角落落，“在这笑谈当中，我们应该严肃地看到问题的苗头啊！”

“他……他是开玩笑啊！”有个干部替老陈分辩。

“有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玩笑提醒我们干部应该用什么思想教育农民，用什么思想指导订规划。”

不知什么时候，芦席棚的窗口已经露出十多个脑袋；从那扇小门那里挤进来七八个人，小田站在最前边。

“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大干是为了什么，革命又为了什么。”杨志青用手指指北边，“为了争夺桥北村前面那个地堡，解放我们这块土地，曾经有五个解放军战士牺牲在我的家门口。他们从北方打到南方，最后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是为了什么？”杨志青很激动，说话都变了声音，“就说我们身边的事吧！张泾公社的瞎眼宋老太大家都知道吧？她七十八岁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了。谁也没有叫她上河工，可是她让孙媳妇带着找到我，说：‘志青哪，我眼睛瞎了，让我搓草绳吧，量河道拉线要用。’就这样，她没日没夜搓呀搓呀，手上磨出了血泡，鲜血染在一盘盘搓好的绳子上。搓出的绳子加起来，足足有几百里长。她是瞎子啊，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片地，一段渠，她看都看不见啊，她为了什么……”杨志青喉咙有点哑，他说不下去了。（下转 96 页）



毕业归来

张步真

县城通往响鼓寨公社的班车，逢双日才开。这天下午，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生刘东海，从县革委会转了介绍信出来，接待他的同志说：“明天在县城留一天吧，后天一早有班车！”刘东海伸出穿着跑山鞋的脚说：“我这十一号，赶得上两个车轱辘！”接待的同志说：“天气热，又有六十里山路呀！”刘东海头一扬，说：“嘿，热天走山路，来劲！”接待的同志笑了，刘东海也笑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挑起行李，出了县城，过了河谷，爬上了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脚底下，扬起一股股白烟似的尘埃。

刘东海是三年前由队里推荐去上大学的。读了三年大学，还跟山里小伙子一个样：黑黝黝的脸，平顶头，头发直冲冲的。骨架五大三粗，模样儿勇武而强悍。响鼓寨虽然是他插队落户的家，他却如同一切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对新的工作岗位感到神秘、新奇、向往。恨不得插上翅膀，一呼啦，就把六十里山路飞过去。

小伙子两脚生风，刚过晌午就到了公社。

他想先到公社兽医站去找老站长。老站长是公社党委委员，得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見。不料当他汗巴水流地走进兽医站时，老站长住的西厢屋，门上却挂着一把锁。有个身上渍满泥浆的高头大汉，也脸朝里边在打听老站长：

“老站长在家吗？”

东厢屋里，房门打开一条缝，门缝里露出一张戴眼镜的脸。刘东海一看是兽医站的李维敏，只见他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把着门板，仿佛生怕这个高头大汉闯进去。冷冷地说：

“不在！”

“张菊花呢？”

“不在！”

“他们两个到哪里去了？”

“告诉你了嘛，不在！”说完，眼镜往后一闪，眼看门就要关上了。高头大汉手快，伸手一挡，门没关住，还推开了。大汉闯了进去，大声说：

“他们两个都不在，李医生，那就请你

去一趟！我们队里一条牛，今天早上吃了田里刚打下的湿谷子，这会子，肚子胀起木桶大，浑身上下一团火似地烫人……”

站在一边的刘东海吃了一惊。俗话说，春牛如战马。这双抢时节的耕牛，硬比得打进攻战的大坦克呀！他把行李卸下来，正要去问明缘由，只见李医生不耐烦地说：

“你去把牛牵来吧！”

大汉子着急地叫道：“哎呀，要是那头牛只有两百斤，我驮来了，要是它没上五百斤，我找人抬来了，这是春头上从外省买回来的良种大黄牯哪！”

刘东海一听，更是心急火燎。这么大一头牛，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刘东海“哗”地一下闯进屋，说：

“李医生，给我个药箱，我去！”

刚才，高头大汉心急如火，没留神身后还有个人。这位李医生眼睛近视，更没看见。现在两个人都怔住了，李医生瞪起眼睛问：“你是谁？”

刘东海从袋兜里拿出一封信，说：“待会儿老站长回来了，请你交给他。我叫……”就在这一刹那间，高头大汉叫了起来：“你不是刘东海吗！”他顾不上满身汗水泥浆，猛地伸出一双铁钳似的手臂，拦腰把刘东海抱住了。刘东海也挥动一双大手，使劲地在他肩上拍着：“嗨，你是火星哥吗？”

朱火星是响鼓寨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他的性子跟他的名字一样，一碰就着火星。他硬是把刘东海举了三下，才把他放下来。说：

“你看这位李医生，我只差用轿子抬啦，你倒是不请自来呀！”

李医生接住信，才明白过来，刘东海是来兽医站报到的。他见朱火星在他的新同事面前，说这些话，脸上顿时有三分不高

兴，说：“我有我的任务嘛！”

朱火星一心挂着治牛，就顺手摘下挂在墙上的一只药箱，说：“东海，既然李医生忙着，就不给他添累赘啦，我们走吧！”说罢，拉着刘东海往外走。

这时，呆呆立着的李医生，白皙的脸孔一下子涨得通红。刘东海回过头来说：“李医生，眼下气温高，生产又紧张，猪牛马羊，容易发病。老站长不在，你在家就多耽待一些吧！”说完，跟着火星队长，箭一般地向村里射去……。

二

一个是脚杆子当得两个车轱辘，一个是急如星火，不一刻，就到了第四生产队。刘东海想先诊了牛病，再去看望乡亲们。一进村，却碰上一伙歇完晌出工的社员。刹时间，堂客们喊，小娃子叫，饲养组长石老贵也赶出来了。他嘴巴笑成一朵花：“东海，你回来怎么不透个信息呀！要是早搭个信，大叔又该敲锣打鼓接啦！”

刘东海听了，猛一凝神，往事历历在目：一九六八年冬天，刘东海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同一批青年从上海来这湘赣交界的连云山区插队落户。他们的汽车刚刚停稳，早有一群等候在公路上的社员，又敲锣鼓又放鞭炮，一直把他们接进村。三年前，贫下中农推荐他去上大学，临到挑起行李出村时，饲养组长石老贵领头，敲锣打鼓把他送到车站，搞得刘东海心里很是不安，说：“大叔，三年前我来村里，您敲锣打鼓接；现在我去上大学，您又敲锣打鼓送。您越敲我越心慌！”石老贵听罢哈哈大笑：“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几时见过城里读书人下乡种田？哪里又有作田的泥腿子上大学？！冲着这些新事儿，喜事儿，乡亲们要不敲锣打鼓，心里真要憋得慌哩！”停

停，他又俯在刘东海耳朵边叮咛道：“社会主义是件新事，共产主义更是件新事，小刘，你上了大学，学了本领，可要沿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走到底哇！”说着，又是一阵紧擂密敲的锣鼓声……这声音，在农学院安静的校园里，在开门办学的农村小院落，常常来叩击他的心弦。也正是这激荡的声音，又把他召回到响鼓寨来……

正这时，石老贵忽地往石墩子上一站，满面红光，声音也格外洪亮，说：

“乡亲们，大家还记得不，我们村里，一共出了两个大学生。头一个是恶霸地主余老财的小子余鸿儒。解放前他学了个什么‘法学系’。那小子毕业一回到家，就为他老子办了一件事：写了一张状子，告到伪县政府。说什么村东头的牛头山是他家的祖业，而牛头山上的水流进了丽江河，那丽江河也应该归他家管业。那狗县官也昏头昏脑地批下了这个状子。从此，谁在河里引水灌田，捕鱼捉虾，要收水费鱼税。地租，水费，高利贷……象一根根绳索，逼得穷人走投无路啊！这样的大学生，怎么恨也恨不够！现在呢，我们的大学生东海回来了，屋没进，汗没干，背起药箱就来给队上治牛病，这样的大学生，怎么喜也喜不赢呀——”

刘东海听了，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要不是急性子队长朱火星把他拉走，这个别具风致的欢迎会，还不知要开到什么时候呢。

奇就奇在这里，刘东海前脚进饲养室，那李维敏后脚就赶来了。

大黄牯看来病势的确不轻，左腹明显膨大，叩打声音如鼓响，伸颈瞪眼，呼吸急促。刘东海见李医生来了，刚才的不愉快一扫而光，高兴地说：“李医生，你的事忙完啦？”说着，他把听诊器递过去，说：“你诊断经验多，这好像是反刍机能失调引起的牛

瘤胃鼓胀病。”

李维敏这时也非常热情，伸手在牛肚子上敲了几下，连忙打起哈哈来：“哈，我们俩的看法倒是不谋而合呀！”

刘东海又俯在牛胸前细细地检查了一会，说：“不过，牛的脉搏跳动很快，口里流涎，又不完全象是吃了湿谷子引起的肠胃机能失调，可能还吃了有毒的东西，我看先做个立卧处理！”

李维敏在牛背上拍了一掌，说：“这哪里是食物中毒罗，这家伙贪嘴，吃了这么多，还垂涎三尺要吃。吃吧，不等晚上，肚子还要胀大一尺围！”

就在李维敏一掌拍去时，牛牯打了个趔趄。火星队长连忙扶着，着急地说：“有什么办法把这一肚子谷子弄出来呀！”

李维敏满有把握地说：“别慌怯，办法有的是！”

刘东海一直围着牛前牛后转，他沉思着问李维敏：“你打算用什么办法！”

“开刀！”

火星队长耽心地问：“牛也能开肠剖肚？”

“怎么不能呢？我手术刀都带来了。把这一肚子湿谷子扒出来，牛就好啦！”李维敏朝火星队长挥挥手说，“队长，搞几根绳子来，准备绑缚开刀！”

朱火星疑疑惑惑地望着刘东海。李维敏说：“快去吧，时间就是生命！”

朱火星见李维敏说得这么急，也就打算去找绳子。刘东海连忙拉住他，又对李维敏说：

“病情还没弄清楚，不能忙着开刀！”

李维敏一听，不快地大声说：“病情不是明摆着吗，牛牯贪吃了湿谷子，反刍机能失灵，弄不好，还会并发胃炎，除了开刀还有什么办法？”

刘东海抬起头来反驳道：“给牲畜动手

术，首先是为了保护牲畜，有利于发展生产！”

李维敏急忙解释道：“动手术当然是保护牲畜嘛！”

刘东海问：“动手术后还能下田吗？”

李维敏眼皮一沉，说：“牛腹开了刀，下田怕是不可能了，但拖拖车，推推碾，那还是可以的！”

朱火星在一旁听了，说：“这不是讲白话吗？队里碾米有打米机，拖车有手扶拖拉机，当下就要靠它下田，搞晚稻超早稻。谁还有工夫伺候一尊废物？！”

李维敏表示爱莫能助，说：“兽医总是希望牲畜没病！”

刘东海毫不含糊，说：“一个革命兽医，要千方百计保证牛下田，猪长膘。眼下生产紧张，队上急需牛力，要救牛，不能随便开刀！”

李维敏揶揄着说：“不让开刀，那就等着吃牛肉吧。”

刘东海情不自禁的喝了一声：“你这是什么话？”

李维敏自知说溜了嘴，讪讪地朝朱火星说：“队长，你们作主吧，客随主便！”

正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喊声：“火星队长呢，月光丘的早稻收完了，等你派牛下田咧！”

朱火星一脚跳到门口，冲着门外说：

“你叫拖拉机去！”

“拖拉机下了大丘，明天后晌才能上岸！”

火星队长脚一跺，说：“东海，你们说句实话，这牛几天能好？”

刘东海思忖了一下，果决地说：“你去铺排生产吧，我们全力抢救，尽快让牛早下地！”

这可乐坏了旁边的石老贵。刘东海插队以来，就是在他家打住。那些年头，石老

贵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啊！刚来村时，怕他冻着，怕他累着。后来，刘东海入党了，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委员，他还不断给他讲家史，摆村史。就是上了大学，也三番四次写信去鼓励他。现在，见小伙子这样的了解贫下中农的心情，这样的关心农业生产，敢于在困难面前拍胸脯，老头子不由得喜笑颜开，大声说：

“东海，就要有这么一股敢拍胸脯的闯劲！耐得烈火才是真金，快治吧！”

朱火星脸上也有了喜气。他摸摸后脑勺说：“好极了。哦，东海，你还没有吃午饭呢，我去叫你嫂子弄点吃的！”

“留着晚上一块吃吧！”刘东海笑咧咧地说着，随即给牛打了针，又问：“这牛是谁放的？”

石老贵回答说：“黑胖。”

刘东海回头对楞在一旁的李维敏说：“老李，我们一块去访访黑胖，作作调查，弄清牛牯到底是吃了什么有毒物！”

李维敏不屑地说：“根本不是中毒，拖延了时间，到头来，牛坏了事，谁负责？”刘东海没时间和他扯皮，只好独自急急地往外走。刚出门，李维敏又追赶上来了。刘东海说：

“李医生，社员们都急得很，我们把原因查清了，才好对症下药！”

李维敏一步蹭了上来，郑重其事地说：“刘医生，正因为社员们都着急，我不得不跟你打个招呼！”

“打招呼？”

“对！”李维敏显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说，“农民是最讲现实的。你把牛治好了，他把你捧上了天；你若把牛治死了，一辈子会有人指脊梁。这黄牯就算是农药中毒，开一刀，洗了胃，扒了谷，至少不会死。刘医生，你刚从学校毕业，这可是迈的第一步，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声誉呀！”

“真稀奇，个人还有声誉要保护！”

“是呀，我们虽初识，却是同行呀。兽医这一行，声誉太重要了。要不，你就别想吃这碗饭！”

刘东海听了，气得眼里直冒火。刚才，他在回村路上，听火星队长说了李维敏的一些情况，只知道他架子大，服务态度不好，不愿做艰苦的工作。却还不知他的肠肠肚肚有这么多弯曲。这时，李维敏的话越发体己了，他几乎是俯在刘东海的耳边说：

“小刘，我正在搞一个‘关于反刍胃畜类肠胃蠕动规律’的科研项目，就差一个数据没弄清楚，给牛开了刀，既让牛脱了险，科研项目也可以有个结果。”

刘东海心里全明白了，他再也克制不住，大声说：“集体折损一条抢季节的牛，你保了声誉，得了数据，你的小算盘扒拉得不错啊！”刘东海说到这儿，把手一挥，顿了顿，又补充说：“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个人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东西。眼下，就要保住这条耕牛，使它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说罢，他昂起头，大步地走了……

三

李维敏赶回饲养室，坐立不安。他是一九六四年兽医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那时他自己拟了个人规划：五年当研究员，十年之内，至少是成为一个省内知名的畜牧兽医专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李维敏成名成家的小算盘敲碎了。文化大革命后，为了加强农业第一线，他被调到连云山区这个小小的公社兽医站当兽医。才来那阵，他也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把自己的世界观来一番改造。过了没几天，就觉得这地方过于荒僻，抬头是山，出门三步就爬

坡，连个知音人也找不到。每天不是掀猪舌头，便是摸牛屁股，这样下去，能有什么前途！前不久，他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回省城去。有一天，他碰到了第四生产队的余鸿儒，听说也是个上过大学的人，就谈得投机。余鸿儒十分体己地说：“维敏，你打报告顶什么用？拿出成果来吧，到时候，你不想上去，人家还得请你上去哩。”李维敏听了，两掌一击：嗨，真是读书齐颈，要人提醒！于是，他自己拟定了个科研题目：“论反刍胃畜类肠胃蠕动规律。”他找资料，查文献，论文写得差不多了，就缺个数据……碰巧这头牛不拉屎，不撒尿，症状象反刍机能失灵。把牛解剖了，这不是送上门来的数据？！不料刘东海这么的不配合。他气恼中带着失望。看来，这条牛是难得有救了。牛死了，数据得不到，还落个马上打屁两不分明。还是快走为妙。

他刚一出门，却和兽医站配药员张菊花撞了个满怀。张菊花问：

“老李，刘东海从大学回来了？”

李维敏爱理不搭地说：“你的消息灵通！”

张菊花十八、九岁，是刚从大队调到兽医站来的。她嘴巴不饶人地说：“消息灵通有什么不好？你呀，阴阳怪气的！”张菊花见李维敏没好气地要走，一把拖住他：“嗐，你怎么就走？老站长叫我来传话，当下生产忙，队里牛力紧，他叫你和刘东海千方百计把这条牛治好。他把南山几个耕牛中暑病例处理完，就到这里来！”

两人正争着，刘东海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他听了菊花的话，忙说：

“李医生！病因查清了，我们一块来研究治疗方案吧！”

火星队长心急两头忙，隔不了一会就要跑一次饲养室。他粗声大气问：

“弄了半天，到底是什么病呀？”

“嘻，你莫急罗，情况复杂哪！”

刚才，刘东海找到看牛娃黑胖。黑胖说，今天一早，他把牛拴在一株梧桐树上，就上山刈牛草，牛最爱吃露水草，吃了又长膘。黑胖刈了满满一担，往田边送去时，大黄牯却换了个地方，不知给谁拴到了一株杨柳树上，正大嚼田里刚才打下的谷子。黑胖急忙跳下田，死拖硬拉，才把大黄牯拉上来。黑胖正在奇怪：这牛怎会换拴到这株树上的呢？只见余鸿儒走来，就问：“你看见谁牵过牛吧？”

余鸿儒翻动一对绿尿眼，说：“小孩子家懂什么，梧桐树旁是我的自留地，你没看见？”

黄牯上了田，挣着要喝水，余鸿儒干笑两声说：“沟里水浑，秧田水清，红小兵要懂得保护耕牛嘛！……”

刘东海还没把情况摆完，火星队长高膛大嗓门叫了起来：“黑胖让牛到秧田里喝水啦？”

“可不！”

“这么说，黄牯还夹有农药中毒呀！”火星队长脚一跺，“秧苗今天下午拔了栽大田，早起农药员打了二十斤药水，就是我叫余鸿儒和农药员抬去的。余鸿儒这个该死的东西！”

刘东海却平静地说：“所以我想，病因不搞清楚，牛病治不好。”

朱火星暴跳如雷：“我马上去把余鸿儒叫来！”

刘东海说：“支书说，今晚开会，批判他。”

刘东海的这番病因调查，却把一旁的李维敏搞得目瞪口呆。原来，大前天，兽医站分配李维敏上牛头山去采药，走了不多远，他脑壳忽地跳出论文上的一节文字，赶忙掏出笔记本，往路旁石板上一坐，埋头写起来。正这时，有人喊他：“维敏，有什么文

章不好到家里来写吗？”李维敏抬头一看，见是余鸿儒，心想兽医站整天乱糟糟的，这里倒是个安静所在。便一步跨进了余家，一直呆到日偏西，临走匆忙，还把采药篓子忘在他家。现在，听说余鸿儒搞破坏，要是人家问起他们是什么关系，不就复杂化了吗？

“李医生，我看先解决农药中毒问题吧。”刘东海征求李维敏的意见。

李维敏精神恍惚，说：“你看怎么治就怎么治吧！”

刘东海说：“去年，我们搞开门办学时，在莽山碰到个老饲养员，他试验了个土方，用胶子树叶煎水灌服、揩洗，治疗农药中毒效果特好！”

张菊花说：“是呀，小刘你当时就写信给老站长了吗，老站长在牛头山找着了这种树叶。”

刘东海问：“站里眼下有没有这种药？”

张菊花想起来了，问李维敏：“老李，大前天是你的采药日，老站长不是叫你去采这种树叶的吗？怎么没有见你交药？”

李维敏不觉一怔：“我想……那玩艺没啥科学根据！”

刘东海说：“不，我们试验了，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八！”

张菊花紧盯着李维敏。忽然，她叫了起来：“八成你是根本没有去采，又躲在哪儿去写论文啦！”

李维敏脸庞蓦地变成猪肝色。

菊花急得要打架，叫道：“个人主义害人呀，成天想着当专家，病不看，药不采……”

李维敏悻悻地说：“我写论文也是为革命！”

刘东海一针见血地对他说：“老李，为革命搞科研，我们并不反对。如果为个人名利搞科研，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你可要小

心呀！”

李维敏咕咕哝哝，起身要走。说：“我去把药采回来！”

刘东海说：“天快黑了，你眼力不太好，和石贵叔一起在家照看病牛吧。采药让我去！”

四

真是见山跑死马哟。往常，站在村口望牛头山，青翠的山峰就在眼前。但今天，刘东海从饲养室跑出来，太阳还有半竿高。当他一路小跑，爬上牛头山时，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在山峰后渐渐地消失了。墨蓝色的天幕上，闪烁着晶亮的星星。

上大学之前，刘东海是村里民兵连长，曾多次和民兵在山上演习练武。记忆中，有个山坡上有这种胶子树。到底是哪个坡，印象已经模糊了。

盛夏的天气是炎热的，树林里好象是个大蒸笼，牛虻在树林中嗡嗡，小虫在扑面飞舞。天越来越黑，刘东海踏着星光，一株一株地寻过去，发现形状相同的树，就摘一片叶子嚼一嚼。凡是味儿涩中带苦的，他就折几枝。直到他的舌子已经不识味了，折下的树枝也搬不动了，他才捆起来，准备下山。

正这时，坡下闪动一支雪亮的手电光。还传来苍劲的喊声：“东——海！”

上山来接他的石贵叔，见他驮着小山似的一捆枝叶，笑着说：

“上了三年大学，还能扛这么重？”

刘东海说：“我们在学校也不是关门读死书呀。学院党委经常组织我们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到贫下中农中去，练思想，学本领。再说，你不是常来信说上了大学，要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嘛！”

爷儿俩说说笑笑往山下走去。石老贵

说：“上了大学，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个李维敏也是个大学生，听老站长说，他打报告要回城市。最近，还常与余鸿儒勾勾搭搭，真叫人不放心呀！”

刘东海听了，猛然站停了问：“你来了，饲养室谁在照看？”

石老贵说：“我嘱咐了火星，叫他好好照看牛牯。不管有什么变化，一定要等你回！”

刘东海思忖了一会，说：“李维敏心里有个小九九，今天他就是想打这条牛的主意，很有可能趁火星心急无主张，打他的小算盘。个人主义迷了眼的人，往往会干出一些敌人都干不成的事来。大叔，我们快走！”

他们小跑下山，冲向村巷，冲进饲养室。立定一看，喉咙口要冒烟了。饲养室里安装了一支雪亮的电灯泡，灯光下，牛牯四脚朝天绑缚在地上。李维敏手里拿着一把白晃晃的刀子……

李维敏心里正划算着：这条牛反正会死。剖开来，救得活就救。救不活，搞几个数据，也是一大贡献呀！猛然间，他的右手，好象被一把铁钳子夹住了。跟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

“住手！”

李维敏回头一看，是刘东海一张满头大汗的脸。只见他怒气冲冲地问：

“李维敏，你这是打的什么主意？”

李维敏双手一摊，说：“你去问火星队长吧！”

原来李维敏为了达到开牛腹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利用刘东海走出的机会，借口抓紧时间治病，说服了朱火星，准备剖腹。石老贵瞪了朱火星一眼：“你看看人家东海，你这个人啊，还这样没主心骨！”

只要牛能治好，就是打朱火星三下，他也没意见。他搔搔后脑勺，一声憨笑：“东

海,我心急啊!”

刘东海顾不上多讲道理,将牛绳绑松了,并将药下锅,石老贵就生火熬煎。不多时,药熬好了,立刻摊凉灌下去。又将药水给牛擦洗了一次。这时,火星队长把饭菜端来了,刘东海这才午饭加晚饭,一古脑儿吞下去。

五

吃完饭,刘东海很疲劳了,但他的心情更沉重。他正想去找李维敏谈谈,张菊花气嘟嘟地跑来了。刘东海心下纳闷。菊花没好气地递过一张油印品,说:“你看看这件稀罕东西!”

刘东海打开一看,整个脸庞刹时震抖起来。那上面印着:

“对调启事——本人在连云山区工作,对畜牧兽医专业颇有研究,适宜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如有同一专业愿意对调者,请书面与响鼓寨公社兽医站李同志联系,恕不面洽……”

他们正看着,李维敏悠悠忽忽从外面进来了。张菊花一把从刘东海手里夺过那张“对调招贴”,丢给李维敏,说:

“赶快把这张狗皮膏药贴起来吧!”

李维敏一看,着急地说:

“你们怎么侵犯个人隐私?!”

“这也算秘密?”张菊花毫不退让,说,“油印纸你还要拿到大街上去张贴呀!”

李维敏悻悻地说:“这个你们管不着!”

刘东海再也克制不住了,他站起身来,说:“李维敏同志,我们不管,有人可要管你!”他从放饲料的角落里,拿起一个药篓子,说:

“这个药篓子你丢在哪里?”

李维敏一看,这正是那天忘在余鸿儒家里的,顿时脑壳垂到胸前,喃喃地说:“他

破坏耕牛,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呀!”

“不,关系大得很!”刘东海说,“余鸿儒妄想搞垮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坑害耕牛!你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也要在牛身上划一刀,毁掉耕牛。他没办成的事,差点叫你代他办成了。”

李维敏冷汗直泻,说:“小刘,我绝对没有那么想!”

刘东海头一扬,声音好象滚珠落地,一字一个坑,说:“我们都是吃了人民的饭上大学的,学来的知识,也都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有了点知识,就把它当商品,出招贴,待价而沽,到头来,连你本人也会装到资产阶级的腰包中去!”停停,他又十分激动地说:“李维敏同志,我劝你认真读一点马列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无产阶级一定会把资产阶级送进坟墓。包括他们的思想垃圾,统统都要埋葬掉!老李呵,做一个掘墓人吧,不要做陪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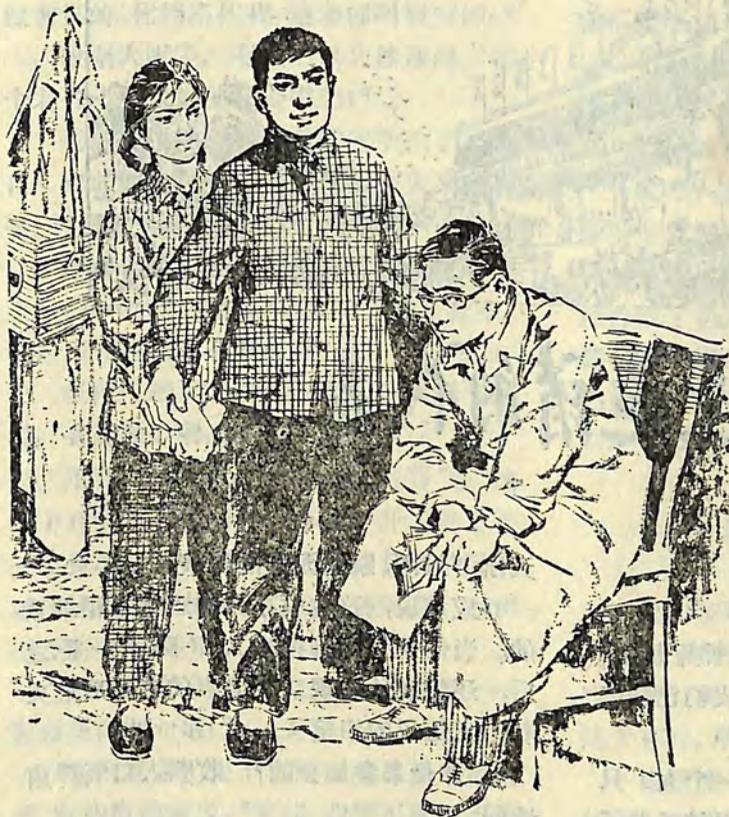
六

第二天,朝霞映满山川,清清的山村小溪,泛起红光一片。山里山外,骤添异彩。早起抢季节的社员,挑担拿锄,一路说说笑笑往田间走去。经过饲养室的门,全都惊喜地拥上来,围着治好了病的黄牯夸奖着刘东海。

石老贵慈祥地拍拍刘东海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是我们贫下中农信得过的知识分子!”

刘东海憨厚地笑笑,说:“我还差得远哪!”他突然转身问身后的李维敏:“李医生,我们这连云山区,母牛很少怀犊子;每年春天,流行猪丹毒;羔羊生下来,容易感染白痢。你说说,这都是什么原因?”

“这个,这个……”李维敏答不出来。



刘东海说：“我找出了一些原因，但都没有证实……”

李维敏惊奇地问：“你也想搞科研项目？”

“叫科研项目也行！”刘东海恳切地指指东边的猪场，西边的牛舍，南头的羊圈，

“研究所就在这儿！”他又指指饲养组长石老贵，“研究所所长就是石贵叔。”他朝石老贵拍拍胸脯，谦和地笑着说：“大叔，我当个饲养员兼研究员，够不够格？！”

石老贵粗大的手臂一挥，说：“大学生当饲养员，够格！”

说得大伙哈哈大笑了。

张菊花朝李维敏啾啾嘴，悄声说：

“老李，你听听人家说的！”

李维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晌，才说出了一句话：“东海做出了榜样，我学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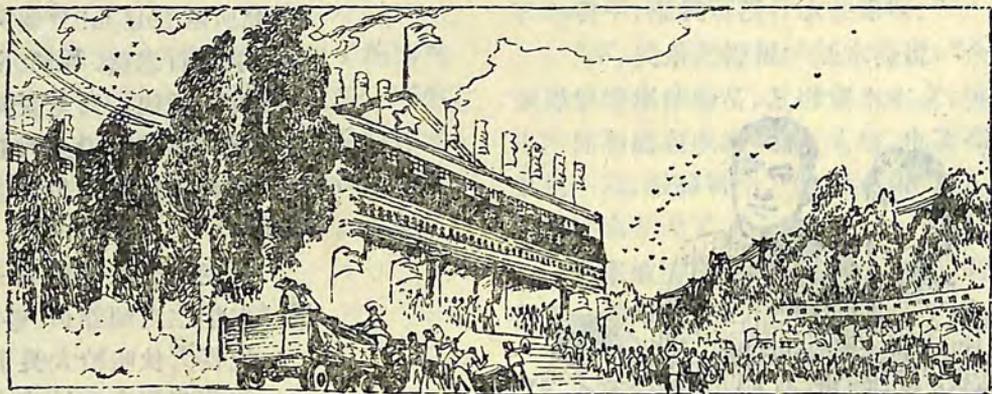
这时候，石老贵只顾张开口乐着，却不知牛绳已悄悄地从他手中溜掉了。黄牯缓缓地走了几步，接着，它伸长耳朵，甩动尾巴，趾高气扬地大步往前边青草地上走去了。小娃眼快，喊道：

“队长，牛跑啦！”

火星队长猛一抬头，喜饱了。叫道：“哈，东海，你这样的大学生，再来一百个，我们敲锣打鼓——欢迎！”说完，他一路大笑着向黄牯追去……。

(插图：韩敏)





未受邀请的“代表”

陈先法

一、“凭我这颗心！”

县革会召开的“农业机械化誓师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已陆续进场了。

这时，从街角匆匆奔过来一个人。只见他到了礼堂门口，抬起胳膊，用袖子揩了一下汗津津的前额，就要往里闯。

“喂，同志，入场券！”收票人礼貌地然而坚决地拦住了他。

“啊！”来人有些吃惊地抬起了头，随即抱歉似地拍了拍自己的衣裳前襟，“我没有。”

“那，代表证呢？”

“也没有。”

收票人这时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不速之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农，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年纪，古铜色的面孔上疏疏朗朗地布着几道皱纹，目光坦率，黑黑的胡茬围着嘴角，使他的神情显得有些倔强。半旧的灰色布衫前襟上，有两条黑道道，象是墨水痕迹，又象是什么油斑。一双布鞋和卷着的裤脚管上，溅满了泥浆水，那是因为昨

天刚下过雨，路上泥泞的缘故。

应该说，这位收票人的观察是很细致的。当他从头到脚把来人审视了一番之后，还敏锐地发现这个老农的右耳后边夹着一支短短的铅笔头。

“你是来参加会的？”收票人口气严肃地问。

“是啊，我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参加这个会！”听着礼堂里面的广播喇叭中传出“准备开会”的招呼声，老农有些急了，抬脚就想往里走。

可是收票人伸出手阻拦了：“我不能放你进去。你是凭啥来参加这个会啊？”

“凭，凭啥?!……”来人听到这句问话，突然有些发火了。“你也问我‘凭啥’！”

“嗬嗬嗬！杨阿度同志，人家当然要你‘凭啥’，你以为只是我一个人在卡你吗？”一个声音从旁插了进来。

收票人转头一看，是县委农业机械化办公室科研组长李善明，便招呼说：“啊，老李，你这次到下面蹲了几个月，拔秧机搞成了吧？快进去吧，都等着你作报告哪！”

那叫杨阿度的老农，看到李善明后，

“哼”了一声，有些气愤地冲着他说：“我早知道会在这里遇到你，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提意见的。你挡不住我，是老韩叫我来！”

收票人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地问：“哪个老韩？是我们的县委书记？”

杨阿度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拍了拍胸口，对收票人恳切地说：“可我今天来参加会，不是凭老韩，是凭我这颗心！”

李善明掠了一下有些稀疏的头发，把手中的一卷图纸收了收紧，笑着摇了摇头：“心？是啊，谁都有颗心！”

杨阿度瞪了李善明一眼，倔声倔气地说：“我这颗心啊，就一个心眼！”

正在这时，县委那辆北京吉普“唿”地一下开到了礼堂门前。车门一开，跳下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这是县委书记韩诚。他看到站在礼堂门前的杨阿度，高声招呼着奔过来：

“老杨，你起了大早，我赶了晚集——害得我白跑一趟！”

杨阿度急忙走下石阶握着县委书记的手，有些激动地说：“老韩，我脚不瘸腿不拐的，你倒用车子去接我做啥！”

站在一旁的李善明不禁有些暗暗吃惊：这个倔老头，怎么会和县委书记认识？

当县委书记一边与李善明打招呼，一边领着杨阿度进会场的时候，那位工作认真的收票人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依然是口气严肃地说：

“老韩同志，这位同志不是代表，又没有会议入场券！”

韩诚爽朗地高声笑起来：“是啊，杨阿度同志是一个没有受邀请的代表。可他的会议入场券，已经交给我了！”说着，他从背着的黄挎包里取出了一张奖状大小的硬纸，在收票人面前展示了一下。

收票人看到的是一张已经有些发黄的、土改时期发给农民的土地证，那背面

还用粗铅笔横七竖八地画着些圈圈、杠杠。这算是什么会议入场券呀？收票人有些迷惑不解了。

可是跟在后面的李善明一看到县委书记手中的这张纸，脸色一下子涨红了！此时，他真后悔不该丢掉了它。

收票人看到李善明突变的神色，心中更增添了疑团。他还没有弄清发生在他面前的这一幕剧的剧中人物关系。这时，会场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他不知道那是在欢迎县委书记，还是在欢迎那个“未受邀请的代表”。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决不是欢迎李善明作报告。

二、喜剧性的会面

提起杨阿度这个名字来，在杨家宅这个大村子里知道的人并不多，可要说到“木匠老耿”，那全村可是家喻户晓。杨阿度的这个称呼，早在解放前就有了。

杨阿度本来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他十五岁那年，劳累一生的老爹，留给他一把刨子、一把锯，死在地主家的木工房里。从此，他就用父亲留下的这两件简单的劳动工具，糊口谋生。财产没挣得半点，只落得个“巧手艺”的名声。解放前两年，邻村一个很有势力的老地主死了，他的儿子要雇杨阿度给老地主做雕花的牌坊，说死说活杨阿度就是不去。那地主少爷发了脾气，说：“谁再敢叫杨阿度做生活，砸了他的饭碗。”杨阿度听到后，跑到村子中间的一块井台石上，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父亲留给他的刨子和锯子乒乒乓乓都砸碎了，火冒三丈地怒喊：“我杨阿度宁可不吃这碗饭，就是不给你狗地主作牌坊！”

从此，人们一提起杨阿度的脾气，都说：“耿！”

解放后，杨阿度分了田，成了家。生活

象芝麻开花节节高。没两年，村里办起农业社，杨阿度第一个报了名。入社后，队干部考虑到他有手艺，还是让他做木匠。六〇年村里有两户富裕中农闹退社，杨阿度跳起来同他们辩论。一个富裕中农讥讽地说：“当然啰，我要是木匠，拿高工分，我也会唱高调！”杨阿度气得一把撸下了头上的帽子，说：“从今天起我就不做这个木匠，不拿这个工分！我要的是社会主义，只有财迷脑袋才只想着钱！”打这以后，杨阿度就不做木匠，只种田了。队里有什么急用的木匠生活找到他，他先讲明：“给工分的不做，不给工分就做！”

村里人都说：“这个杨阿度，真耿！”所以，尽管杨阿度不做木匠了，大家还是叫他“木匠老耿”。

文化大革命后，杨阿度入了党。村里人对杨阿度的评价也有了发展，不仅仅是脾气“耿”，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了。

那么，杨阿度是怎么认识李善明的呢？那就要说到关于试制拔秧机的故事——

今年五月间，早稻快要插秧的时候。县农机办科研组长李善明带了几个技术人员，开来了一台新试制出来的拔秧机。为什么选在这个队做试验，李善明有两条理由：第一、这里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科学种田也开展得比较好，接受新生事物快。第二、这个队不知哪个土专家搞了几样开沟、插秧之类的土机械，县委曾拿这个队的事例促过农机办的科研组，说他们关在屋子里搞不出名堂。今天要拿个“新名堂”给他们看一看。当然，这前一条理由，李善明是讲在嘴上了；而这后一条理由，他只不过装在肚子里。

拔秧机试机的这一天，村里的男女老少从早晨就盼，一直到下午才听到村外路上传来了“突突”的马达声。

李善明跟队干部打过招呼，就指挥技术人员把机器开进秧田里进行表演。而他自己则站在田埂上，背着手，面带微笑地看着围绕拔秧机欢腾笑闹的人群，不时地伸手掠一掠梳得很整齐的分发。

李善明有四十来岁了，面孔较胖，要不是前额上有两道横纹和头发有些脱落了，可能看起来还要年轻一些。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县委机关的一个科长。现在农机办抓技术工作。对此，他是颇为满意的。用他的话讲：“抓技术工作的人，只要一不搞崇洋媚外，二不搞专家治厂，就不会犯什么政治错误。”小小科研组，一没有洋机器，二没有专家，他这个组长，真是条进了港湾的船——遇不到什么风浪了。

谁曾想，天有不测风云。在学大寨的新高潮中，农机办的科研组竟成了众矢之的。大家说他们“落在了政治形势的后面”。组里的技术人员也纷纷提出倡议：“搞革新，抓农机，要为农业学大寨出大力。”在这种情况下，李善明感到形势逼人，他这条船不但没能开进避风港，反而被拖到了激流中来。

眼前拔秧机的试制成功，李善明是很高兴的。虽然这是全组技术人员努力的成果，可也证明自己这条船正顺流而下，没有被搁浅哪！

李善明正站在田埂上出神，忽然觉得耳边欢腾的声浪静了下来。他仔细一看，围着机器的大人孩子们都逐渐散去了。只有两个队干部边走边低声谈论着。微风把他们的话吹送过来：

“这拔秧机还没过关，只能拔，不能扎……”

“是啊，你看，拔散了，要浪费不少秧苗……”

李善明再看那还在秧田里开动的拔秧机后面，水面上是飘动着不少拔掉的秧苗。

这时候，他的目光被一个人吸引住了。这个人正弯腰跟在拔秧机后面，把那零散的秧苗一根根地拾起来。

那是谁？李善明走到近前，见那人穿了一身崭新的干部服，虽然袖子、裤管都卷了起来，还是溅上不少泥水。要说是公社干部吧，谁也不会穿这么一身衣服来下田；要说是县里领导吧，怎么连样子也没见过？哦，对了，前天从一份“情况简报”上，看到省农机研究所技术人员下农村的消息，一定是省里来的“老专家”吧？看，他对拔秧机多感兴趣！李善明赶紧脱掉鞋袜，卷起裤脚管，下到秧田里，站到那人身边，客气地叫了一声：“同志！”

拾秧人直起身来，一张古铜色的脸油亮亮的。这是杨阿度，可李善明那时并不认得他。他打量了一下李善明，问道：“你是管造这拔秧机的？”

李善明不顾对方手上的泥水，一边伸手握住，一边自我介绍说：“我是县农机办科研组长李善明。”

杨阿度高兴地攥紧李善明的手：“那太好了！你们搞的拔秧机还有毛病，我刚才跟着琢磨了一阵，还应该加点东西！”说着他伸手摸了摸耳后，“啊呀！铅笔忘带了，我回去取来先画个尺寸！”

李善明忙说：“我跟你一起去吧！请你多指点！”

已经走上田埂的杨阿度并没有理会他的客气话，只顾拎起放在田埂上的鞋子，急急忙忙地向村里走。

李善明跟在后面，有些吃力。不觉拉开了一段路。他这时注意观察那人的走路姿态，才发觉与那身干部服不是那么谐调。

刚刚离去的那两个干部同杨阿度打招呼了。一个问：“喂，木匠老耿，你看女儿怎么当天跑回来啦？”

“瞎，今天不是拔秧机来我们队试验

嘛！”杨阿度边答边走，丝毫不放慢步子。

另一个打趣说：“哈哈，你女儿真会打扮你，看，穿得象个新郎官啦！”

杨阿度也被说得笑起来：“有啥法子，女儿的一番心意嘛！她非得让我穿回来！我回去脱下来就把它送给大队文艺宣传队！”

“那也用不着这样忙呀！”

杨阿度指了指身后说：“不，我是要给人家这位同志的拔秧机提个意见，回去取铅笔画个尺寸！”

两个队干部笑起来：“你的那位同志在哪里啊？”

杨阿度转过身去，不禁楞住了。身后的人不见了。远远地，在靠近秧田那边，走着一个越来越远的无精打采的身影。

那正是哭笑不得的李善明。

三、“我就是想出个主意！”

杨阿度回到家里，脱下那身干部服，拉开抽屉，取出一段铅笔头夹在右耳朵背后，带上皮尺和一个小本子，转身就走。

老婆见他慌慌张张的样子，忙问：“火烧屁股似的，做啥？”

“急事！”杨阿度头也没回，奔出了屋子。可是当他赶到田头的时候，李善明和几个技术人员已经把那台拔秧机开走了。只留下了一块拔过了秧的秧田。

杨阿度见水面上还飘有几根稻秧，就脱鞋下去捞了起来，扎成一束，丢在田边的水里。然后，在水田里洗了洗手，放下裤管，自语地说：“找他去！”

杨阿度知道，拔秧机试制组蹲在公社搞试点。他急匆匆赶到公社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农机站里静悄悄的，那台拔秧机停在场当中，机身上还满是水迹。杨阿度俯下身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抹掉嵌在

凹槽里的一片片湿泥，然后掏出皮尺仔细地量着每个机件，在小本子上记下尺寸，画上简单的结构。一会儿功夫，已经密密麻麻记满了好几页。他刚要把本子合起来，却被一只手拿了过去。

转头一看，是李善明。杨阿度高兴地说：“我等你半天了！”

李善明把他记的几页翻了翻，有些好笑地问：“你这是画的啥呀？”

杨阿度抱歉似地笑了笑：“唉，一天书也没念过。做木匠生活多了，随手记下尺寸样子啥的，只有我自己能懂，别人就看不懂了！”

李善明问：“你是木匠？”

杨阿度说：“过去做过，现在种田。”

李善明恍然大悟似地说：“啊，我明白了！你是想能为我们帮帮忙，你好拣起木匠手艺来，再做木匠？”

杨阿度却没听懂李善明这番话的含义，诚恳地说：“木匠手艺我倒一直没丢，想搞好拔秧机也不能说光是帮你们忙，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啊！”

李善明从他弄清杨阿度既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什么农机研究所人员的那一刻起，就有些恼火。他回到公社后，立即把技术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强调指出拔秧机试机基本成功，可以给县里写报告，要求推广。有的技术人员提到散秧、漏秧的问题，李善明说：“这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可以定型以后再求改进。”他的意见，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闹得他最后只好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动员全组的技术力量，再突击一下，攻下散秧、漏秧这一关！”

现在，他看到杨阿度赶到公社来量量画画，好象对改进拔秧机满有把握的样子，觉得太不自量力了。

他把本子还给杨阿度说：“木匠同志，这拔秧机可不同于桌子凳子，刨刨凿凿就

行了。也不比你们搞的那些土机械，这是新式的农业机械呀！”

杨阿度说：“李同志，你是管科学技术的，这个机械，那个机械，你当然比我懂得多。可这农业机械是种田用的，种田我懂，种田人的意见，作兴有些用场。”

李善明看了看杨阿度诚恳又固执的神态，把他带到屋子里，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图纸，推到杨阿度面前：

“你看看吧，这是关于拔秧机的设计图纸，这是总体图，这是零件图，这是传动结构图，这是操作示意图……”

杨阿度把图纸往旁推了推，说：“快别唠叨了，这些图我是看不大懂。可我今天看了机器拔秧的试验，对这拔秧机的毛病，大体有个数！”

李善明把图纸放回抽屉，慢悠悠地说：“你这种热情是好的。可我们的技术人员是吃闲饭的吗？这些问题会解决的。”

杨阿度站起来了，嗓门也变粗了：“我锣鼓不会敲，听音倒也听得出。——你嫌我多事是吧？我就是个多事的人！你烦也没用，对这拔秧机，我就是出个主意！”

李善明想到，真要是同这个跑到公社给拔秧机提意见的老农吵起来，那影响可就不好了。他连忙用手按了按杨阿度的肩头，笑笑说：“哎，木匠同志，你别激动嘛！你能改进拔秧机出主意，当然好啊！不过你改个啥机件，加个啥机件，得画成图纸，技术人员才能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才好商量啊！”

“图纸？”

“是啊！你做木匠活不是也要画个样子嘛！”

杨阿度看着李善明摊开两手故作为难的神态，把大手往桌子上一拍，发狠似地说：“好，图纸就图纸！”

李善明心想：这个人，不怪叫他老耿，

真是耿得厉害呢！他安慰似地说：

“你不要以为我在给你出难题，搞机械就是要跟图纸打交道。其实你倒不必急，这又不是你份内事！有我们技术人员哪！我们整天整夜地搞机械就是为了你们的科学种田嘛！当然，你这种精神已经很使我感动了！”

杨阿度把凳子往后推了推，向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盯着李善明的脸。

李善明以为他要同自己握手告别，忙把手伸出来。

谁知杨阿度直楞楞地看了一会儿，从嘴里蹦出了两句话：

“你感动？你没动！”说完转身大踏步走出去了。

四、一张特别的图纸

杨阿度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村东生产队的仓库里，透出明亮的灯光。今天是政治夜校学习日。杨阿度走到窗前，向里面望去，只见满满腾腾的挤了一屋子人，支部书记阿胜正在讲课。他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两行大字：

“学大寨第五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杨阿度热心于拔秧机，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去年冬天，杨阿度作为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同阿胜一起到县里参加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交流会。当会议代表们参观农机新产品展览的时候，他蹲在一台插秧机跟前摸摸弄弄老半天，然后对讲解员提了个意见，说是插秧机的铁齿还应该短半寸，不然秧苗会插得太深。讲解员不大在意，却引起了身旁一个人的兴趣，大声说：“这是个好主意！”杨阿度转头一看，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那人热情地握住杨

阿度的手说：“老同志，看来你是个内行啊！”杨阿度摇摇手，笑笑说：“这一行我们种田的可弄不来，我这是随口提个小意见。”那人说：“喂，这与种田是同一行嘛！搞农业机械化可离不开种田人哪！这是我们种田人的一桩大事。有了思想革命化，再有了农业机械化，我们的农村离共产主义就不远喽！”那人了解到杨阿度做过木匠，又高兴地说：“那好嘛，七十三行，巧数木匠。把你的手艺都施展出来，为机械化出力量吧！”一席话，说得杨阿度心头滚烫。过后，杨阿度一问阿胜，才知道那人原来就是刚上任的县委书记。

开会回来以后，杨阿度又在政治夜校里听过阿胜讲农村的远景规划，于是，晚上他开始睡不好觉了。老婆见他翻来复去地折腾，以为他生了毛病，爬起来要去喊赤脚医生。杨阿度披衣下床，白了老婆一眼：“你清啥医生！”他一个人钻到里屋，点起灯，乒乒乓乓地凿打起来。天没亮，就跑到大队修配站拉了两个小青年，一起鼓捣什么东西。没出几天，杨阿度推着个“怪东西”下田了。社员们一看它的用场，给起了个名字，叫“土开沟机”。此后，杨阿度又耳朵背后离不了铅笔，手里头丢不开斧锯。队里的黑板报上还登载了一条新闻：“农业要搞机械化，老木匠成了革新家”。社员们每到杨阿度家串门，总见到他埋头在一堆铁棍棍、木棒棒当中，一面拿皮尺量着什么，一面嘴里咕哝着：“五寸五，做立柱……三寸三，做横梁……”人说木匠老耿已经“迷”上了！杨阿度是有些“迷”上了。他为了“鼓捣”一点“啥东西”，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而当老婆埋怨他的时候，他便把头伸在老婆面前，看着她的脸说：“喂，要不要我给你配一副老花眼镜，你看不大清爽嘛！我问你，再过两年农村要变成啥样子？你自上政治夜校了，没听阿胜讲呀！——我

这是为了解放劳动力，提高生产力！你当光为了做生活轻松？哼！”

正是怀着这种想法，杨阿度为了赶回村来看拔秧机，连女儿做的丰盛的午饭也没有吃。他胸中藏着一团火哪！本想为改进拔秧机出把力，却不料劈面挨了这个李善明的一盆冷水。嘿，他憋着一肚子气。

可是现在，他这个站在窗外旁听的“学生”，又被夜校“老师”的生动的讲解吸引了。……杨阿度听着听着粗粗地喘了口气，暗自咕哝着说：“泼点冷水也没啥，我加把火烧开它！哼，图纸就图纸！”他把手往身后一背，匆匆地赶回家去了。

杨阿度踏进屋门，老婆刚想发火，可一见老头的脸色，又憋回去了。——她知道，有了什么重要事！

“喂，给我找张大一点的纸来！”老头发命令了。

在这种时候，老婆倒是一向听指挥的。她赶紧翻开一只放针线的布袋袋，把一张准备剪鞋样子的纸递过来。

“嗐，太小！”老头子没有接。

老婆想了想，又连忙到碗橱顶上取过一个菜籽包，打开，把菜籽倒到一边，递过一张由于包菜籽已有些皱褶的大牛皮纸。

“真是糊涂，我要的是白纸！”老头子有些不满意了。

老婆拍了一下手掌，两手一摊：“你又没读过书，我也不识个字，家里没个文化人，我到哪里去给你找大白纸？”

老头子搔了搔头皮，在屋里转悠了两圈，忽然爬上了搁楼，抱下了只带着锁的小木箱。老婆知道，这个木箱是他的宝贝，里边放着他的“重要文件”。

老头子把木箱打开，取出一张纸——这是去年公社发的“学大寨”先进个人奖

状；又取出一张纸——这是前年大队发的模范社员奖状；再取出一张纸——这是大前年兴修水利时，一个画家给他画的一幅素描像，旁边还题着三个字：巧愚公。……他从箱子里一张又一张地往外拿，就是不见一张白纸。忽然，他围满黑胡茬的嘴咧开了：“哈，这里有一张！”一张虽然有些发黄，但很洁净、硬挺的纸躺在箱底。他取出来一翻，却又呆住了。——这是土地改革那年发给他的土地证呀！

杨阿度捧起这张土地证，一霎时，多少往事涌起心头！

——办初级社那年，杨阿度说服了老婆，捧着它第一个去报名，准备把它交出去。他只有一个心眼：毛主席指的路，我们就是要走！办社的工作队批准了他的要求，可是却没有收这张土地证，只在上面盖了个“已入社”的方戳，并对他说：“拿回去做个纪念吧！”是的，是想做个纪念呀！杨阿度家祖祖辈辈无房无地，唯一的财产就是那把刨子、一把锯，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分给了土地呀！现在这块地入社了，可自己不仅仅是这一小块地的主人，而是社里全部土地的主人了！他觉得，值得珍贵的不仅仅是这张曾经表示自己对土地所有权的证明书，而且包括“已入社”——那简单、清楚的一方红印。这两者都标志着他的新生活的起点啊！……

杨阿度捧着这张土地证呆呆地想了好久，又抬起头来幸福地望了望挂在对面墙上正中央的毛主席像，然后把土地证铺到桌上，象是对老婆，又象是对自己说：“在这上面画一张图纸，正好！”

杨阿度摊开自己的小本子，从耳朵上取下铅笔头开始画了。他那围满黑胡茬的嘴振动着，从旁看去，象是在笑。

老婆睡在床上，几次醒来看到的都是这个景象。

杨阿度画呀，画呀，直到雄鸡三唱，窗户泛红的时候，才画完了最后一笔。

五、“长了个见识”

第二天上午，杨阿度跑到公社把这张图纸交到李善明的手里，这不禁使李善明大吃一惊：这个老木匠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可是当他看了图纸以后，又不禁哑然失笑了：这算啥图纸，圆圈有些象鸡蛋，直线好似水波纹，这还能计算出啥精确的数据吗！不过李善明已经领教了老头子的脾气，不采取当面驳回的方式了。他煞有介事地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嗯，图纸先留在这里吧！我让他们搞设计的做个参考，如果需要找你帮忙时，我再通知你！”

杨阿度看着李善明的脸说：“李同志，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绕弯话。我知道我这双笨手画出的歪歪扭扭东西会让你笑话的。这没啥，我只是盼你们能照我这意见试试！”

李善明回避着杨阿度的目光，但嘴里却连连说：“好吧，好吧！”

杨阿度走了。李善明望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他把那张图纸往旁边一个抽屉缝里一塞，又埋头到试制组送来的一堆“技术情况交流”当中去了。

李善明对改进拔秧机的事不急吗？他也急着哪！他本想把试制组拉回县里搞突击，可组里人员议论纷纷，说这是“闭门造车”，这次拔秧机所以出问题，主要原因是关门试制的结果，应该深入到生产实践中去，才能找出改进的办法。而如果这样搞法，那要几时才能改好？再过两个月全县要开农业机械化誓师大会，拔秧机无论如何要在会前改好，不然的话，他这个农机办科研组长还有脸走上主席台吗？

迫于组里人员的要求，李善明只好同意他们到各生产队去参加拔秧、插秧劳动，在实践中研究出改进的方案来。他利用这段时间要回县里再翻翻外县和外省市的农技资料，看有什么新经验。离开公社回县城那天，李善明把带下来的书籍、资料收拾一空，却单单忘掉了杨阿度交给他的那张图纸。

说来也不巧。由于是大忙季节，公社机关人员大部分到下面去了，曾经作为县农机办科研组蹲点办公室的这间屋子，空了一个多月也没人占用，那张图纸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只抽屉里。杨阿度虽然每天忙得披星星，顶月亮，可是他的心里一直装着这张画有改进拔秧机图样的图纸。支部书记阿胜还给县里农机办打了两次电话，得到的都是支支吾吾的答复。

杨阿度终于忍耐不住了。队里的小拖拉机去县城拉化肥的时候，杨阿度搭乘着到了县里。他径直走进县委大楼，找到农机办科研组的门，也不敲一下，推开就进去了。李善明正忙着准备在全县农业机械化誓师大会上的发言，抬头看见走进来的是杨阿度，他才想起了那张图纸，一时有点尴尬。

他欠了欠身子，招呼说：“唔，杨阿度同志，你坐，坐！”

杨阿度立在他的面前，直率地询问：“李同志，拔秧机改好了没有？我那个法子行不行？”

李善明掠了掠头发：“我们已经有了两个方案。至于你画的那张图纸么，我看了一下，虽然不能用，也有些启发。”

杨阿度喘了口粗气，冲着李善明伸出手去：“不能用，把它还我吧！”

“啊……”李善明干巴巴地笑了两声，“你还要它有啥用场？一张废纸嘛！”

听了这句话，杨阿度气得一跺脚：“啥？”



一张废纸？你知道我多珍贵它！”

李善明见杨阿度火气又上来了，忙说：“我知道，你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可能还要误工吧？这样，我给你开个条子，让队里补给你工分，另外，建议队里还是让你做木匠，看得出，你的手艺还不错嘛！……”

“你，你……”杨阿度气得有些颤抖，把两只大手攥成拳头，激愤地问，“你带着人搞拔秧机就是为了工分吗？……竟能说出这种话来，还算是个领导！”

李善明不由得板起了面孔。既然这样，那算我自说。至于拔秧机的事，你不要再操这份心了！”

“不！”杨阿度觉得喉咙头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似的，气喘不匀，“这份心我就是操！”

李善明冷笑了一声：“你凭啥？”

杨阿度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脯说：“凭我是个往共产主义奔的农村社员，凭我是个共——产——党——员！”

李善明此刻心头充满了恼怒和烦乱，还夹杂着一丝胆怯。但他故作冷静地挥了挥手：“你有啥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但请你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

“我影响你！我看是你在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学大寨，影响我们搞机械化。哼，我是要提意见的！”杨阿度说完，气冲冲地跨出了办公室。

出乎杨阿度意料的是，当他赶回家里的時候，支部书记阿胜陪着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着他。这个人竟是那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韩诚。

因为有过一面之交了，杨阿度上前握着韩诚的手说：

“你，你不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吗？怎么会想起跑到我屋里来？”

韩诚亲切地说：“叫我老韩吧！我是特地来拜访你这位革新‘迷’的呀！”说着他从黄挎包里抽出了一张纸：“你看！”

——那正是一个多月前杨阿度画出的那张特别的图纸。

杨阿度围满黑胡茬的嘴咧开了：“在你手里？！”

阿胜说：“这是一个公社干部发现的，正好老韩同志在那里，他被你这张盖过‘入社’章、又画上‘机械’图的土地证吸引了！”

韩诚说：“杨阿度同志，我已经和几个搞农机的同志商量过，他们看懂了你的图，认为你这个想法很好，可以把拔秧机改进一大步！”

杨阿度看着县委书记语气深沉地说：

“老韩，为这张图，我惹了不少气，可也长了个见识：看来要搞机械化，先要有个正确的路线啊！”

韩诚赞同地点了点头：“说得对！”……

六、县委书记的总结

这时候，全县农业机械化誓师大会已经开了近两个小时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代表一个个走上讲台畅谈他们的雄心壮志，十分引人。但是，台下的人也注意到坐在台上县委书记身边的两个人，一直没有发言。一个是五十多岁老农模样的人，耳朵上夹着段铅笔头；一个是四十岁上下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握着一卷纸。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起，不过一个是昂着脸，一个是低着头。

热烈的掌声又响起来了——这是欢迎县委书记作总结发言。韩诚拿着那张特别的图纸走上了讲台，当然，他向大家生动细致地介绍了那位未受邀请的“代表”。他在

讲到那张图纸的遭遇的时候，并未点什么人的名，只是大家看到，坐在未受邀请的“代表”旁边的那位干部把头垂得更低了。

在县委书记的总结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土地改革，把我们广大农民从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成立又把我们从个体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又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将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早日实现，不但使我们的思想摆脱私有制和小生产的锁链，得到彻底的解放，而且会使我们的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

“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进行这一运动的时候，始终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啊！”

讲到这里，人们看到那位未受邀请的“代表”激动地站起来，使劲地鼓着掌……

（题图、插图：徐有武）

（上接第85页）

拖拉机什么地方坏了。”我回答说。

于是，她很快脱下自己的雨衣，用绳子把两只角结在拖拉机手柄上，另一头用手拉平，为我搭了一个很好的棚。并且从挎包里拿出手电为我照明。我先检查了电路，又检查了油路。毛病很快找到了，是油管堵死了。我刚要用嘴把油管里的杂物吸出来，她却一把拉开我，自己抢上来……

油路通了，拖拉机起动了，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咳，这么简单的毛病，过去还得等县农机厂的同志来修，真是‘缺医少药’啊。这下有了函授短训班，我们腰杆子硬了，不但敢跟那伙黑机手斗，而且一定能斗过他们。你说对不？”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拖拉机又顶着狂风暴雨前进了。身边这个驾驶着手扶拖拉机的姑娘，又打开了

话匣子：“老师，函授短训班能不能多收些学员？我们这里的贫下中农、知识青年想参加的人可多啦！”

“为啥？”

“还不是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出点力呗！”说着，她豪爽地笑了。

“你，叫什么？”这时我才想起问她的名字。

“张雷！”她响亮的回答压过了雷声。

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密。我却丝毫不觉得冷。一股热烘烘的东西涌上心头，流遍全身。想想吧：作为一个工人函授教师，遇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的新学员，心里该有多么激动呵！此刻，我和我们短训班的第五十一个新学员在一起迎着风雨不畏艰险地前进，不由得升起一种和风雨搏斗的快乐之感。



标灯闪闪

士 敏

……生活中的巧遇真是太多了！对唐文智来说，这样的巧遇，那将是他永生难忘的。

一九六九年初夏的一个早晨，航标工程师唐文智，响应毛主席关于“下放科室人员”的号召，离开了他那间舒适雅致的办公室，来到远离市区的航测队码头，踏上了那条泊在外档的航标船“海王星”号。他小心翼翼地跨过几条船档，登上“海王星”的甲板，一个年青的值班水手看了介绍信，热情地告诉他，船长老李和船员们都在上面会议室开会哩。他来到会议室，只见坐了一屋子人。

“我要找李船长……”他微红着脸，问门边一个大眼睛的青年水手。那水手指着桌子顶端一个嘴里含着板烟斗的老头说：“呶，这就是我们李老大。”

“李永泉！呵，不可能！不可能！”唐文智在心里叫着，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瞧，那含着烟斗的紧闭的嘴唇，那双藏在眉棱下的深不可测的眼睛，还有左面腮帮上那

一条长长的伤疤……霎时间，五年前的往事又在他眼前展现了：

事情得从黑鲨洋设立航标灯桩说起。这黑鲨洋航道正中有一块十多平方公里的浅滩。它潮涨没一片，落潮露出背，远远看去就象在海浪中翻腾的一条大黑背鲨。这块大浅滩全都是那种又细又硬的铁板沙，看上去挺硬实，可船只搁上去，湍急的流水很快就把船底下掏空，不出十二小时，包你船底朝天。因此船员们有句顺口溜：“黑鲨洋，黑鲨洋，十个老大九个慌。”为了航行安全，航道部门计划在滩顶上设立一座固定灯桩。但要想在这潮涨潮落，一片流沙的滩顶上建造一座钢铁的灯桩，谈何容易！关键问题是基础不好解决。当时这项设计任务落在唐文智身上。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参阅了中外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资料，最后根据西欧一个国家的经验，设计了一种水泥沉箱，埋进沙里，作为基础，再在上面设置灯桩。花了近万元，沉箱造好了，有两层楼房那么高，雄伟而又气派。具体的施工任务下达给航标船队。接着，他就等着检查、验收，和将这成功的经验，写进他当

时正在着手编写的那本名为《中国沿海航标学》的巨著里去了。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一天，有两个工人闯进他的办公室。一个是有着一头淡黄头发、长着两片锋利的薄嘴唇的小伙子；另一个就是这个含着板烟斗的李永泉。

“唐工程师，”黄头发的小伙子笑道：“你大概不认识我们吧？”

他打量两人一眼，唔，很面熟，是航标船队的，可姓甚名谁却叫不上来。本来嘛，下面有成百上千号工人，怎么能一个个都叫得上来哩。他含混地应道：“唔，认识，见过，唔……”

“叫不出名字，是吗？”小伙子的两片薄嘴唇象刀一般锋利；“那么，认识一下吧。我叫钱高，他叫李永泉，咱们都是下面航标船上的工人。”

“唔，呵……”他点点头，身子在皮转椅上动了一下，眼光从钱高的薄嘴唇转到李永泉身上。这老头皮肤黝黑，眉棱特别高，因而那双深陷的眼睛显得又深又黑，他嘴里含着一只大烟斗，打从进门就没讲过一句话。“呵，你们找我有何事……”他迟疑地说着，避开老头那专注的目光。

李永泉从嘴里拔出烟斗，唐文智以为他要讲话，可他喷了一口烟，大烟斗又塞到嘴里去了。钱高说道：“我们找你，想同你谈谈那个水泥沉箱。”

“呵，好，好呀！”他抬起身子，“目前领导和各方面反映都还不错，你们认为……”

“不行。”钱高的薄嘴唇动了一下。唐文智觉得这不是两个字，而是两颗子弹！他霍地从转椅上跳了起来：“什么？不行？”

他轻蔑地看着两人身上那油腻的工作服，“哼，好大口气。你们懂吗，这可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参照了国外的成功经验，人家荷兰在西弗里西亚群岛，英国在布里斯托尔湾都搞过。”

李永泉不慌不忙地从嘴里拔出烟斗，不紧不慢地说：“唐工程师，可你别忘了，这儿既不是西弗里西亚，也不是布里斯托尔，这儿是中国东海的黑鲨洋。”唐文智叫道：“黑鲨洋还不一个样。”李永泉平静地说：“不一样。你想想，这黑鲨洋的浅滩面积大，水位浅，你那水泥沉箱吨位又那么重，体积那么大，使什么船来拖运？”

“这……”他一时语塞，沉默片刻，有些恼怒地说：“你们别忘了，搞设计，定方案这是我们上面的事，沉箱怎么运载是你们的事情！”

李永泉和工人们的意见，无济于事，航标队的领导根据局里的指示，还是用船把那庞大的水泥沉箱拖出海。往常一般设标施工，唐文智是从不出去的，但这回他确实有些不放心，特别是一想起李永泉那双深藏在眉棱下的，似乎隐藏着无限奥秘的眼神，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他决定跟出去看看。也不知是他敏感还是怎么的，他发觉工人们似乎都憋着一口气，一个个都拿眼睛斜他，特别是钱高，薄嘴唇翘得可以挂油瓶，把榔头家什摔得乒乒乓乓。但李永泉却啥事儿也没发生似的，照例含着烟斗，掖着腰，把水泥沉箱，拖带设备，各个环节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还不放心，又多加了一根拖带的钢丝绳。钱高早就不耐烦了，他斜了唐文智一眼，嘲讽地说：“永泉师傅，你这不是皇帝不急太监吗？天塌下来，自有大个儿去顶，要你多操这份闲心干吗？”唐文智脸上一阵热，心想这老头准会趁热打铁，加上两句。谁知他却从嘴里拔出烟斗，轻声吼道：“胡扯！你以为这活儿是为哪个个人干的吗？”呵，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老头子啊！当时唐文智真想走上去安慰他一番，可却没有勇气，……

谢天谢地，拖轮前进得很平稳，驶过了

东水道，绕过蛤蟆礁，驾驶员告诉唐文智，只剩下黑鱼背——这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关口，那儿水浅浪大，如果平安通过的话，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他心里一个劲儿念叨，希望上天保佑，能够平安到达。可老天却不帮忙，到了黑鱼背，风浪愈来愈大，而且正好顶风顶水，那只笨重的水泥沉箱在风浪里，凶猛地浮沉翻滚，尽力想挣脱拖轮的控制。两根拖带的钢丝绳绷得紧紧的。船速越来越慢，最后索性在原地徘徊了。轮机马达沉重地喘息着，拖轮就象个醉汉，颤抖着，摇晃着。只听得钢丝绳摩擦着船舷，发出“咯滋，咯滋”的响声，那声音真让人头发倒竖，肉跳心惊。船员们不安地纷纷议论着，李永泉却照旧蹲在那儿，嘴里含着大烟斗，一动也不动。这时驾驶员又跑来向唐文智报告：“唐工程师，怎么办？快决定吧，沉箱拖底了，再弄下去，船有被



拖翻的危险……”唐文智有生以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有点手足无措了。正在这当儿，“咔嚓——”一声，两根钢丝中的一根被绷断了，拖轮向一边侧去，“啊！——”唐文智一声尖叫，面色煞白。只见李永泉腾地跳起来，大吼一声：“人散开！”然后将烟斗塞进嘴里，顺手抓起身边一把太平斧，奔到那根瑟瑟作响的钢缆前面，手起斧落，“嚓！”只见寒光一闪，拖轮和全船的人都得救了，他却摔倒在甲板上……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为此不安和痛苦，有时连做梦也会想起那双眼睛……五年过去了，岁月的流水渐渐冲刷和磨平了他心中的伤痕，想不到如今在这里相遇了！而且……

“唐工程师，”忽然身后一个冷冷的声音，“还认识我吗？”

他转过身，只见淡黄的头发，薄薄的嘴唇，不由尴尬地：“啊，钱高同志。”

钱高向他笑笑。李永泉身子挪了挪，说：“来，这儿坐吧。”唐文智坐了过去。李永泉要大家继续发言。唐文智一听，也真巧，他们讨论的正是黑鲨洋设置航标灯的问题。李永泉根据沙滩的地质情况，想出用废旧钢管联结起来，代替水泥沉箱作基础。

“刚刚讨论得那么热火，怎么……继续谈呀。”李永泉敲敲烟斗。唐文智很清楚，这完全是因为他在场的原因，不禁垂下头。

“好，我来说。”钱高忽然大声说道，看得出他很激动，“多少年来，广大海员和渔民多么希望能在黑鲨洋浅滩上面建立一座航标灯，可过去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压制我们工人群众的意见，生搬硬套外国的

洋框框，洋教条，浪费大量的国家财产，不但没造好灯标，反而险些造成人命事故。”

屋子里静得出奇，只听得李永泉叭嗒叭嗒的吸烟声。唐文智恨不得有个地洞能钻进去。他歉疚地说：“永泉师傅，我向你道歉。”

李永泉摇摇头，说：“不，这不是赔礼道歉的问题。”

唐文智一怔。

钱高瞟了唐文智一眼兴奋地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工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当家作主了。”他指着桌上一份设计图，“我觉得永泉师傅这个设计有三大优点：第一，施工方便，切实可行；第二，成本低廉，经济实惠；第三，节省时间，安全保险。总之，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李永泉喷了一口烟，摇摇头说：“小高，不要把话讲得太满。”他把那份设计图递到唐文智面前，“老唐，请你提提意见。”唐文智一看，图画得歪歪扭扭，但这土办法确实有道理，当然，有些地方还可以改进。可他觉得：处于他现在这样的地位，评头品足，那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敷衍地笑笑：“唔，不错，很好。”

钱高又不屑地瞥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还用你说，当然很好罗！”

李永泉深深地看了唐文智一眼，唐文智却把头低下去了。

二

散了会，分配任务，有的抬钢管，有的理角铁，有的修灯器，有的烧电焊。钱高被分配去抬钢管，——这是最脏最吃力的活儿。李永泉对唐文智说：“走，咱俩去修灯器。”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搞航标的人

谁不知道，再也没有比修灯器更轻松的活儿了——等他明白过来，李永泉已经含着板烟斗，走在头里了。他连忙跟了上去。

他们检修的是那种三百毫米电闪光灯，准备将来安装在黑鲨洋灯标上面的。李永泉攀上灯架，对他说：“这上面两个人转不开身，你就在下面给我递递工具吧。”他点点头。这活儿更轻松了。他把工具零件都摊在一块油布上，只等李永泉开口，要什么递什么。李永泉打开灯帽，含着烟斗，歪着头，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闲着没事，转眼四顾，只见工人们有的敲榔头，有的量尺寸，有的风割，有的电焊，叮叮咣咣热闹极了。钱高和那个大眼睛的水手小王，两人抬着钢管，一面使毛巾擦汗，一面冲着他这儿指指点点，不消说，正在起劲地议论他哩。他忙转过脸，同时心里感到一阵难受。他想，过去的错误是无法挽回的了，只好让人家点着背脊骂，重要的是现在得弄点名堂出来，让他们看看，工程师唐文智毕竟不是个窝囊废！……“喂，尖嘴钳，”忽然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他的沉思。他连忙挑了一把尖嘴钳送到李永泉那摊开的大手里。接下去，他又继续刚才的思路。他想起俗话说的，以己之长，量彼之短，要想在扛钢管，干力气活儿方面同钱高、李永泉他们比高下，那是准定要吃瘪的，还是……，他不由的想起李永泉给他看的，那张划得七歪八扭的钢管灯座设计图。唔，这是个好题目，问题是选择什么时机，用什么方法给他们指出来，让他们服贴……“喂，拿一个调速飞球架。”头顶上又响起那沉闷的声音。“什么？”他没听清。“调速飞球架。”调速飞球架？他念叨着，这名词好熟呀，对，在航标灯说明书上看到过，那是电闪仪调速器上的一种重要零件，遗憾的是过去却没摸过——也用不着他去摸。但是他现在必须把这小玩意儿找到，还得快。真见

鬼！他弯腰在那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件中翻寻起来。看看这个，不对；摸摸那个，不象。“怎么啦？”李永泉奇怪地问。当他看到唐文智额头上那一层密密的细汗珠，忽然明白了什么。他将烟斗含在嘴里，不声不响地爬下来，就从唐文智手边拿起那个模样象“亚”字的金属小玩意儿。同时用那双深藏在眉棱下的、又深又黑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唐文智的脸刷地红到耳根。李永泉想起什么，回到船上，不一会拿来一本沾油污的航标灯器说明书，说：“噢，对照着看看吧。”说罢，又含着烟斗，爬上去专心地干起他的活儿来了。唐文智象挨了一闷棍，呆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打开那本油腻的说明书，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羞愧和痛苦。

三

唐文智好容易挨到下班，脑袋昏昏沉沉，浑身精疲力尽，他匆匆吃完饭，然后独自沿着海滩向前走去。夕阳已经快要堕入海中，一团团云彩被晚霞点缀得花团锦簇。澄黄色的沙滩更是光辉耀眼。海浪，就象一群顽皮的孩子，它们喧嚷着，欢叫着，一个接一个涌上沙滩，又急速地退回去，给那金色的沙滩镶上一道素白的花边。风景是优美的，但唐文智却没心思欣赏这些，他一面散步，一面苦恼地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嘟！嘟！……”忽然，一阵嘹亮的汽笛声打破黄昏的宁静。他侧耳倾听，是“海王星”号发出的，二长一短——召唤船员们立即回船。他心里不情愿，可行动却不敢怠慢，犹疑了一下，向着码头方向奔去。

然而等他赶到，已经晚了。由于港外航道上一只灯浮标灯光熄灭，必须立即赶去修复。时间紧迫，“海王星”号已经让档移泊在海中，幸好，还有部分人没上船，因

此派了汽艇等候在码头边。汽艇距离码头有一米多远，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只见钱高、小王等一个个轻松地跳了上去。轮到他了，他想喊钱高帮下忙，将汽艇拉近些，但看到他嘴角那隐隐的、嘲讽的微笑，心就冷了。心想，纵然落进海里，这回也决不能让他看笑话了。他退后两步，心里喊着：“一、二、……”正欲跳的时候忽然背后一只手拉住了他。李永泉！“小钱！”李永泉声音不高，但很严厉，“把汽艇靠拢一点。”钱高向小王做了个鬼脸，然后抓住缆绳，将汽艇拉近码头。唐文智看着李永泉那面颊上的伤疤，想起他那低沉的声音：“不，这不是赔礼道歉的问题。”一下子被弄糊涂了。呵，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上吧。”李永泉轻声说了一句，跳上汽艇，他也跟着跳了上去。

修好熄灭的灯浮标，“海王星”号回到码头，时间已经很晚了。唐文智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白天的一切，特别是跳汽艇那一幕，一直在他眼前浮现。他想来想去，这条船上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决定打个报告，要求调离。想到这儿，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扭亮电灯，打开报告纸。报告写好，他决定连夜送给李永泉，请他转上去。他走出舱房，登上上甲板，愈是接近李永泉的房间，他的脚步愈慢，最后在门外停住了，他举起右手，可是却敲不下去。

“不，你这样做是错误的。”忽然从里面传出李永泉那低沉但严肃的声音，他一怔。怎么回事？他转到旁边，通过圆窗，透过灯光和烟雾，只见里面坐满人。李永泉坐在当中椅子上，含着烟斗，面色严峻，旁边坐着钱高和水手小王等人。只听李永泉大声说道：“你这是资产阶级狭隘的个人报复，不是我们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钱高不服气地指着他脸上的伤疤，说：“我就咽不下这口气！瞧他把你害的。”李永泉磕磕

烟斗，摇摇头，说：“胡扯！这怎么能说是他把我害的，这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害的。”钱高楞住了：“可在会上唐文智向你赔礼道歉，你不是也说这不是赔礼道歉能解决问题的吗？”

这话正说在唐文智心里，他屏住呼吸。只听李永泉说道：“我们过去和老唐的矛盾，不是什么个人恩怨！我们对他的要求，是希望他能弄清路线是非！赔礼道歉能解决问题吗？”

钱高和船员们都连连点头。而唐文智却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怀着惶惑和惭愧的心情，慢慢转过身……

四

唐文智回到房里，坐在桌边，失神地凝望着那份报告，忽然，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他打开门，进来的竟是李永泉。李永泉不声不响地坐到桌边，慢慢往大烟斗里填着烟丝，蓦然看到那份报告，惊异地：“呵，你要求调离？”唐文智惶惑地说：“刚才……曾经想……可现在……”拿起那份报告轻轻撕成两半。“嗯，”李永泉沉思着，将烟斗塞进嘴里，半晌，说道，“可我不明白，为啥刚才想，现在又……”唐文智红着脸，讲了在窗外听到的那番谈话。李永泉点点头，说：“撕掉一张纸头是很容易的，可要去掉思想上的旧东西怕就不这么简单了。呵，下一步你又怎么打算呢？”唐文智说：“劳动，干活儿，啥也不想。”

李永泉说：“我不相信。”

唐文智说：“这是真的。”确实，刚才他想过了，这是眼下他唯一的一条道儿。

李永泉喷了一口烟，笑笑，说：“真的？我不信。老实说，你这种所谓啥也不想，并不比这打报告当逃兵的思想高明到那儿去。”

唐文智低头不语。李永泉说：“这很明白嘛！谁不知道，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成天想这想那，思想可复杂了，就听了我们一次谈话，你会啥也不想？”

唐文智微微抬起头，沉思着。

李永泉说：“譬如说，组织上现在正式决定，你唐文智就做一辈子航标工，你真的会一点想法也没有？”

唐文智避开李永泉那灼人的眼睛，在这样的眼神面前，你哪怕是说半句假话也是会脸红的呵！

李永泉说：“不想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想些什么，怎样想。你该深刻地想想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想想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意义。”他从桌上拿起钢笔，“还要想想怎样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更好的使用你这支笔。”

“使用我的笔？”

李永泉点点头：“对。”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张设计图，“就譬如这张图，你难道真的没有意见吗？你可骗不了我老头子的眼睛，我看得出，你有想法。”

唐文智低下了头。

李永泉说：“你不仅应该想如何改好图纸，还得进一步想想怎样写好那本未写完的《中国沿海航标学》。”

“什么？”唐文智几乎叫起来，“还要写那玩意儿？”

李永泉坚定地说：“对，要写！为什么不该写呢？”

“永泉师傅，永泉师傅！”这时只听钱高在外面急促地喊叫着。李永泉他打开门，钱高说道：“永泉师傅，领导上要你立即去汇报黑鲨洋设标工作的准备情况。”

李永泉点点头，说：“老唐，干部下放劳动，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毛主席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殷切关怀，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

可是个大问题。你能迈出这第一步，下到船上来，咱们打心眼里欢迎，可你得做好思想准备，继续前进不是那么容易的。”

五

面对着那份设计图，唐文智思想上展开了斗争：动手还是不动手？动手的话，搞好了没关系，万一有点什么差错，工人们又会怎么说呢？不动手吧，李永泉面子上说不过去。斗争结果还是动手。他的想法是：这样做，一来不辜负李永泉的一片好心，对黑鲨洋的设标工作多少也作出一些贡献，此外，还是那个老思想，得让他们看看，他——唐文智毕竟不是不学无术的窝囊废呀。为此他拿出自己的全部本事，花了七个白天，又加了五个夜班，按照机械制图的要求，把原来李永泉他们搞的那张不合规范的设计图全部重新画过，这还不算，为了提高基础的强度，对原设计的结构又作了部分调整和修改。当他完成全部工作，他压抑着心里的喜悦，把图纸送到李永泉和工人们面前。大伙围着图纸看了又看，最后钱高翘起大拇指，赞扬说：“唔，有道理，这几个地方改得好。图也画得不错。”李永泉含着烟斗，蹲在桌边，两眼专注地瞅着图纸。忽然从嘴里拔出烟斗，点点图上那些阿拉伯数字，说：“老唐，这些个数字不会错吧？”

唐文智说：“放心吧，我都核对过了。”

李永泉说：“可不能大意，要不，到了现场，标架搭不起来，潮水可不等人。”

唐文智卷起图纸，无奈地说：“好吧，我再检查一遍。”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不高兴，觉得李永泉对他不相信。

唐文智把图拿回去，又看了一遍，没啥错，钱高连忙拿去加工了。又经过五天的准备，奔赴黑鲨洋建立灯标的这一天终于

到来了。这是一个少有的好天气，蓝色的大海风平浪静，“海王星”号驶出港湾，欢快地向黑鲨洋行驶着。经过五小时的航行，到达目的地。相距滩顶还有五千多米，由于深度不够，“海王星”号无法前进了，只能放下汽艇。这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人们必须涉着齐腰深的水，将钢管角铁以及灯器设备用肩膀扛到沙滩顶上，然后还得和潮水抢时间——在三小时内，将灯标架设起来。船员们争先恐后，抢着要去。唐文智自然也不甘落后。经过争取，李永泉同意他参加。他高兴极了。象工人们一样，将裤管卷得高高的，背上水壶，穿起深绿色的橡皮救生衣，登上汽艇。

经过一阵紧张而又艰苦的劳动，材料很快从汽艇运到滩顶上。为了和潮水抢时间，人们真是气也来不及喘，汗也来不及擦，在李永泉的指挥下，赶快埋钢管打基础，搭标架。工人们动作也真快，不多会儿，标架就搭得差不多了，可就是有一根角铁长出一截，罗丝孔对不上。钱高以为是他加工错了，拿钢皮尺一量，再对照图纸上的数字，分毫不差，怎么回事呢？忙问唐文智，他一看，我的天，图纸上的数字搞错了，大了一个厘米！

“真糟！”钱高和工人们不由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同时看着李永泉。唐文智心跳得厉害：“这是怎么回事？”

李永泉诚恳地说：“老唐，说心里话，你能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动手修改这份设计图，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工人们也都非常欢迎。可我看出，你没有正确对待，从原来的灰心丧气变得忘乎所以了。问题就出在这儿！”

唐文智痛苦地低下头，他真是后悔莫及。

李永泉真诚地说：“反复和曲折是免不了的，但我们希望你坚持两个字：前进。”

唐文智点点头。

这时，暮色苍茫，乱云飞驰，那呼呼上涨的海潮，乘着风势，发出可怕的呼啸。怎么办，时间不等人，潮水很快就要上来了。

“同志们，用锉刀锉。”李永泉果断地命令，“今天一定要把黑鲨洋的航标灯桩架设起来。”

大伙儿立即干起来，有的锉，有的钻，唐文智更加卖力。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在那原来一片光溜溜的滩顶上，一座六米多高的灯标铁架终于巍然耸立起来了。还得在顶端安装闪光灯，可是潮水已经淹上脚背，而且呼呼啦啦，越涨越高。

李永泉含着烟斗，看看表，说：“我和老唐留下装灯，其他人撤回大船。”

唐文智随同李永泉登上标架顶端，李永泉含着烟斗，认真地安装、检查闪光灯里的每一个零部件。唐文智专心地给他传递器材和工具。两人都沉浸在那紧张忘我的劳动中，几乎忘记这是站在一座四面是水的孤零零的灯架上，忘记那飞溅在他们身上的浪花……

时间在紧张的劳动中飞快地逝去。天空中那淡紫色的霞光消失了，夜色愈来愈浓，无边的大海变得阴森而又恐怖。由于站立时间过久，没法活动，唐文智感到四肢麻木，两腿酸痛。如果不是拴在身上的保险绳，险乎摔到海里去。这时，忽听得“突”一声，接着一道耀眼的红光从他眼前闪过，他忍不住象孩子似的欢叫起来：“啊，亮了，亮了！”

与此同时，响起一阵嘹亮的汽笛声，这是抛锚在海中的“海王星”号发出的，向他们欢呼致敬，同时也是提醒他们，该回船了。

李永泉他们准备回船了，忽然李永泉喊道：“糟糕！汽艇螺旋桨打坏了。”没办法，只能让“海王星”号来接。但是因为“海

王星”号吃水深，尽管值班驾驶员作了最大的努力，还是靠不上来，相隔约三百多米。李永泉果断地说：“我们游上去，怎么样？”唐文智说：“行！”于是两人向救生衣里吹气。李永泉那件很快就吹鼓起来，可唐文智那件怎么吹也鼓不起来，他觉着奇怪，一看，“啊！”禁不住叫出来。救生衣上有一个小小的豁口，吹进去的气都从那儿逃掉了。

李永泉不声不响脱下自己那件打足气的救生衣，唐文智问道：“那你呢？……”

李永泉笑笑：“这点距离，对我来说，算得什么。”

“不行！”唐文智看着那波涛滚滚的大海，忍不住痛悔地说：“永泉师傅，这一切的一切都怪我。是我耽误时间，是我……”

“瞎，别蘑菇了，快穿上吧，时间要紧。”李永泉边说边给他系救生衣带子。然后从工具袋里拿出一个塑料口袋，唐文智一看，是那张设计图。

“这给你，把它藏好。”

“给我？”唐文智莫名其妙。

“对，我建议你把咱们这造灯标的土办法写到那本《中国沿海航标学》的书里去。”

“这……”唐文智激动得嘴唇颤抖着，“这方法可是你想出来的呵。”

“胡扯！”李永泉忽然恼怒地叫道：“什么你的我的呀，都是革命的。”

唐文智凝望着标灯那忽闪忽闪的灿烂红光，凝望着他脸上的那道伤疤，轻声说：“永泉师傅，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走，下水！”李永泉纵身跳入海中。

“永泉师傅，我一定跟上你，永不后退。”他两人一前一后，挥动手臂，向着前方奋力划去……

（题图：张树荪 插图：张培础）



新的课题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陈光 李莘

一

一个寒冬时节的晴朗早晨，北风在高空中呼啸，阳光洒满了大地。稻谷早已登场，棉花全部采尽，田野显得分外开阔。一大片一大片破土而出的麦苗，透发出无限生机。一块块白底红字的标语牌，沿着大路边伸展开去，标语牌上“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伟大革命运动”的鲜红大字，就象一把把通明鲜亮的火把，把大伙的心灼得更热了。田塍上，挑担积肥的社员川流不息。

在通往光明二队的机耕道上，走过来两个人。

走在前面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成业。他五十多岁年纪，腰板硬朗，抬手举步之间，显得利索而稳重。这时他眯起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不知是凝望远处的景色，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走了一会，他回过头来看看身边那人一副双眉紧锁的脸色，笑嘻嘻地说：

“陈老师，对这次党支部的决定还有保

留，是吗？”

问题既已点明，陈老师也不回避了：“老赵，学校是大队领导的，支部的决定应该执行。我们下生产队参加年终分配工作，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当然很好。不过，听说群众对这队会计胡立贵有些反映，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介入进去，万一搞不好的话……”他叫陈更新，约摸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农中数学教师，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来的。这次带着一个小组到光明二队开门办学。

老赵知道陈老师的思想顾虑，开导地说：“陈老师，我们学校开门办学，首先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能光叫社会来为学校服务，就是解决个文化学习上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啊。”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们班里李军不是表示要搞好年终分配，更要积极投入队里的现实斗争吗？这态度很好，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她，学习小将们的革命精神。”

尽管赵成业的语调很平和，就象和人随便聊天一样，但是陈更新听来，却感到这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耳

根有些发热，道理还没有完全想通，因而没再吭声。

两人走过一座石桥，踏上一条渠道。陈老师闷头走着，猛地脸上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一抬头，原来是根刺槐的枝叉。这是前年绿化的时候，李军他们绿化突击队在渠道两旁种上的。虽然还长得不高，但在寒风中却显得干挺枝拔，棱角峥嵘。老赵见陈更新不吱声，又说：

“环境复杂一点有啥要紧？它更可以考验和锻炼我们年青一代。俗话说得好，‘花盆里长不出万年松’。你们平时做诗、写文章，不是也爱这么说吗？”

陈更新点点头，仍旧不吭声。

沉默了一会，老赵换了一个话题：“你们请胡会计上课的事，是什么时候安排的？”

一谈到教学，陈更新的情绪似乎活跃了些，他说：“前天刚到队里，胡会计十分热情，主动提出系统地给同学们讲讲会计业务知识，我就安排了。”

“听李军说，上次你们去联系时，他不是很冷淡吗？”

“是啊，开始我也有些奇怪。后来一想，大概是他认识提高了吧！”

“对于胡会计的行动，李军她们看法怎样？”

“嗯……”陈更新没有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支支吾吾说道：“胡会计究竟是什么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对于他的积极性，也不能泼冷水……”

老支书的话虽然含有批评的意味，但是陈更新这次却并不觉得怎样刺耳。因为说到李军，尽管她是一个爱提意见的学生，经常把老师“顶”得下不来台；不过说老实话，他还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有朝气、有闯劲的红卫兵干部的。只有在这次对待胡会计上课的问题上，陈更新始终觉得她看法过

于偏激。今天请支书来，就是想叫他说服李军。

说话之间，两人已经来到二队。上课地点就在胡立贵家里。那是一幢两上两下、青瓦白墙的新楼房，上有阳台，下有走廊，和周围的一般农舍相比，可谓别具一格。他俩还未走到门口，远远就听见胡立贵那嘶哑的嗓音，到了门口，陈更新正想推门而入，被赵成业一把抓住，他们就在窗外停了下来。

在胡立贵的客堂里，李军、阿兵和二虎等六七个同学围着两张方桌坐着，另一张小方桌紧靠西墙，桌上倚墙竖着一块小黑板。胡会计三十五、六的年纪，说话时一双小眼珠转得飞快，黄黄的脸上经常嘻开一张大嘴，但又很少笑出声音。此刻只见他拿着一根芦柴棒，指着满满一黑板粉笔字说：

“年终结算，工作步骤有核实产量、核实收支、清理工分……，光核实收支一项，就包括很多科目。你们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应该牢记背熟。嘿嘿，年终结算确是头绪多，担子重。会计每到这个时候，差不多总要瘦掉几斤肉。”

“胡会计，我们觉得，会计工作最重要的是‘民主理财’，这一条该怎么做，你能不能先讲讲？”正当胡立贵唾沫四溅地说得起劲时，一个十六、七岁，圆脸大眼的姑娘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这正是李军。

“胡会计，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问题上，容易产生哪些问题？”阿兵也接着追问了一句。

“……”

提问一个接一个，胡会计猝不及防，张口结舌，只是尴尬地笑着，老半天答不出一句话。

“胡会计，”李军又一次站了起来：“你

这样满堂满堂地讲，叫我们一条一条地记，还不是和以前的上课差不多。”她脸微微有些发红，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身边的阿兵、二虎等人，挺了挺胸，又说：“昨天我们访问了队里好几家贫下中农，他们对以前从来不公布月结表很有意见。我建议，我们把上课改成编制今年一月至十二月份的月结表，请你和陈老师结合我们工作碰到的具体问题讲课。你看怎么样？”

李军的话刚一落音，客堂里响起了一片赞同声。胡立贵一时竟楞住了。

客堂外的陈更新这时却着急起来：课也不上了，这怎么行，……

没等他想下去，只听得胡立贵发话了：“嘿嘿，大家的热情很高，可是别吃了灯草光说轻巧话呀，再说，……这事我也作不了主……”

“我看李军的建议很好！”赵成业边说边拉着陈更新走进了客堂。

“成业叔，你支持我们的建议！”李军一步跨到赵成业的面前，兴奋得满脸通红。

赵成业慈爱地抚摸了一下李军的短发，对呆立在墙边的胡立贵说：“胡会计，队里群众反映你过去民主理财工作做得很差，这次阿军他们开门办学帮助补作月结表，对你可是促进呀！”

“对，对，对！”胡立贵勉强地笑了笑：“月结表早就该搞了，只怪我平时工作不抓紧。同学们要搞，真是再好没有，只是眼前马上要搞年终分配，实在腾不出手。反正陈老师在这，他完全可以指导。”

“瞧，胡立贵‘撮纱帽’了！”陈更新心里一阵烦恼。他下意识地看了胡立贵一眼，只见他也正斜着眼看自己，冷冷的眼光里浮动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不由得使他对这人的放刁比对李军的“草率”更加不满。正在这时，听到李军问他：

“陈老师，你说呢？”

“我说，好是好，不过……”

陈更新吞吞吐吐地还没说完，赵成业就伸出大手按了按他的肩膀：“陈老师，不要‘不过’了，支持小将们干吧。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课题！”

大伙边说边笑，随着赵成业走出胡家门。胡立贵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看不见李军他们的身影时，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那根芦柴棒，三把两把地折成几截，嘴角边现出了恶狠狠的冷笑。

二

下了一夜的雨夹雪，直到第二天早晨天才放晴。

这两天，为了赶制月结表，李军他们真是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次好觉。昨天晚上，他们更是精神百倍地投入战斗，决心把月结表连夜赶出来。不料李军在制作表格时碰到一个问题，书上找不到答案，陈更新也讲不清楚，胡立贵马上幸灾乐祸地借故走开了，工作一时没法开展下去。陈更新见夜已深了，外面又雨雪交加，就劝同学们早些回家休息，明天再干。谁知同学们反而说他这几天身体不好，催他早点回校去。李军还把他送到村口，答应他们也马上休息。陈更新虽然人到学校，心里一直惦记着同学和那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一清早，他就一脚水一脚泥地往二队赶来了。

走到会计室门口，听听，里面没有声音。他轻轻推开门进了屋，眼前的景象使他怔住了：阿兵、二虎他们几个睡在桌上，身上盖着棉袄。李军伏在靠窗的桌子上也睡着了。一道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正照着她，在她的头发和身上，抹上了一层金黄色。桌旁撑开着一把伞，地下还有一滩水印子。陈更新的眼光转到几张拼在一起的

方桌上，只见十二张月结表整齐地排放在那里，不由得心头一阵发热。他走到李军身边，正想叫醒她时，手一碰到李军身上披的棉衣，就象触电似地缩了回来：

“啊，湿的！”

这一碰一叫，把李军弄醒了。她睁开有点发红的大眼睛，看见陈更新，高兴地跳起来，叫醒了其他同学，指着桌上的表格对他说：“陈老师，问题解决了，月结表完成了！”

看到陈更新那询问的眼光，阿兵抢着回答：“李军昨晚特地去找了大队王会计，……”

望着沐浴在阳光中的李军，陈更新激动地想：到大队，来回有七、八里路，天那么黑，又下着雨雪。只有真正急贫下中农之所急，才能这样做啊！他把手一挥：“李军回家换衣服，其他同学跟我走，把月结表贴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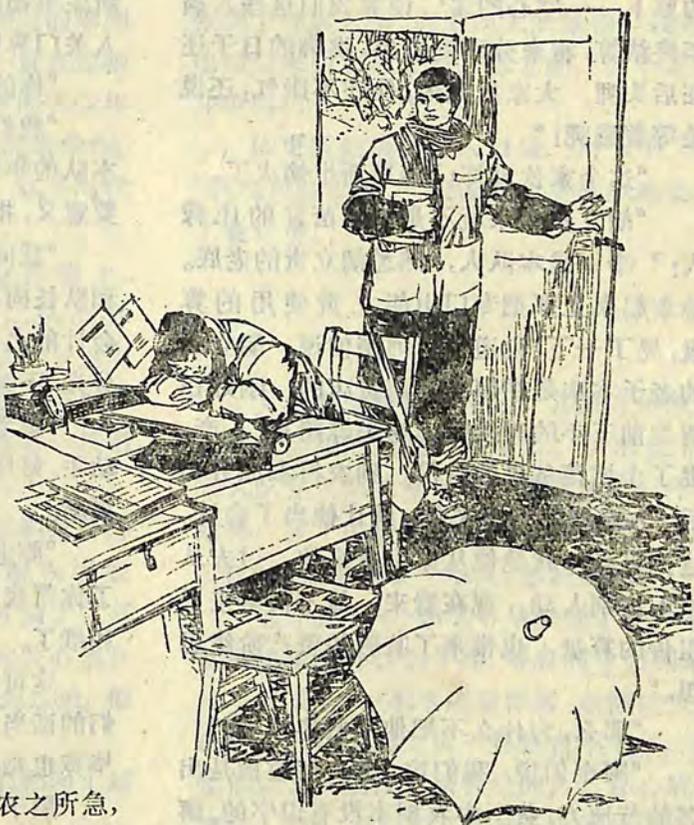
“走！”同学们卷起月结表，带上浆糊桶，一齐向门口涌去。

门一开，只见胡立贵袖着两只手，探头探脑地正想往里钻。他看到同学们手中的表格，楞了一楞，脸上那副悠然自得的神情马上变成了惊讶和失望，不由得脱口问道：“怎么，真的搞出来啦？”

“是啊。”李军上前一步：“胡会计，想不到吧！”

“你想来看我们的好戏吗？”阿兵也嘲笑他：“没有你，地球照样转！”同学们都放声大笑起来。

胡立贵下不了台，他朝陈更新瞟了一眼，一甩袖子转身走了。嘴里还叽咕着：“哼，打打算盘，划划表格有什么了不起，这些过去都是小学生学的东西……。”



“陈老师，你听见他在说什么吗？”李军望着陈更新，眼睛里似乎有两朵火花在闪动。

“让他说好了！”陈更新朝胡立贵的背影瞪了一眼，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趁热打铁，全力以赴地搞好年终结算，用铁的事实来教训那些讥笑我们农中学生质量低的人。走！月结表贴出以后你们都休息一会，我去四队，给第二小组同学辅导，下午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下午，当陈更新回来时，同学们早已在会计室里坐好了。陈更新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刚才路上听到的反映：“群众都称赞我们这项工作搞得很及时！”

“胡会计可气坏了。”二虎插了进来：“我听陈阿奶说，他在群众中讲了我们许多坏话，说啥开门办学是‘正月十五舞龙灯——热闹一阵子’，现在的学生都是‘开春

的萝卜——空心的多’，说靠我们这些人搞年终结算，将来分不到钞票，跳脚的日子还在后头哩。大家批判他，他还不服气，还是等着瞧呢！”

“这个家伙真坏！”陈更新也恼火了。

“胡立贵本来就不是根正苗直的庄稼人！”李军是本队人，熟悉胡立贵的老底。她拿起桌上那把专门由胡立贵使用的算盘，晃了一下，说道：“听阿奎伯说，胡立贵的老子本来是在镇上开南货店的，刚好在解放前三年的时候因为吃喝嫖赌破了产，混了个城镇贫民的身份。到农村参加劳动后，大家看他有些文化，就让他当了会计。这把算盘，就是他从家里拿来的，过去从来不许别人动。现在看来，他不仅带来了祖传的算盘，也带来了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

“那么，为什么不把他早些换掉呢？”

“阿奎伯说，我们这个队，解放前是出名的苦地方，贫下中农根本没有识字的。解放后，虽然也出过几个中学生和大学生，但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下，读了书专门想往外跑。胡立贵能说会道，手段狡猾，大家没有抓住他的确凿把柄，所以……”

听到这些情况，陈更新是有些激动的。他满意地看了李军一眼，心想：她工作做得很细。经过这番调查研究，下面搞起年终结算来该更有劲了。他充满信心地挥了挥手，准备作结论了：

“是啊，我们的担子很重。但是一定要把年终结算搞好。现在就来讨论具体安排……。”

“陈老师，”李军打断了陈更新的话，腼腆地笑了笑，“听了阿奎伯的话，我还有个启发。”

“什么启发？”

“我们现在搞的，不仅是具体的年终结算，也是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捍卫社会主义

新生事物的斗争。所以，光靠我们这几个人关门算账是不行的……。”

“你的意思？”

“我们马上把宣传工作搞起来。结合本队的年终结算工作，宣传民主理财的重要意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我同意！”阿兵补充说：“上次成业叔和队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就专门提到胡会计的名字，说他经常在社员中散布‘吃光分光，不喊冤枉’的话……。”

“陈老师，你再帮我们想些点子，马上动手，好吗？”李军眉毛一扬，热切地望着陈更新。

“陈老师，我马上写一篇小评论，写完了你帮我改！”二虎已经到书包里去找钢笔和纸了。

这可是陈更新没有想到的事。李军他们的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这年终结算毕竟也是上课呀……。

屋子里静了下来。同学们的眼睛都盯着陈更新，等着他表态。他不能闷声不响地一直坐下去，但又不知怎么说好。一见他这副神情，二虎和阿兵都有点泄气了。

“我想，政治思想教育可以让队里去抓。”陈更新终于讲话了，“我们是农用数学课的开门办学，不是语文、政治课，只要把年终结算搞好，就能堵住那些怀疑开门办学的人的嘴。”

“陈老师，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不管是数学课、语文课都应该和这门主课有机地结合起来呀……”李军又一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

阿兵在旁又说：“陈老师，过去学校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你不是也写过批判‘纯业务观点’的文章吗？我看，你现在这种说法就是……。”

说老实话，陈更新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好打退堂鼓：“这事我也不能决定，我去

大队找老赵汇报一下。”说完转身就走了。

一路上，李军他们和他争辩时的那副既含期望，又有些不满的表情，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他从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身上，确是感觉到了一种政治上的敏锐性，一种敢于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这是时代的面貌在下一代身上的反映呀！

天快黑了。陈更新找赵成业没碰上，又急匆匆地朝二队赶去。走近二队会计室，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窗子里望进去，陈更新不禁怔住了：赵成业正坐在桌子旁，戴着老花眼镜，手里捏着一枝铅笔，指着一篇稿子在对阿兵说话。

看着此情此景，陈更新不禁周身都感到发热了。赵成业解放前一直给人当长工，一天书也没有读过；解放后才摘了文盲帽子。他工作那么忙，尚且如此关心教育革命，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想到这里，他猛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陈老师，你回来啦！”同学们都迎了过来。

“好啊，陈老师，你们搞得不错！”赵成业满面笑容地站起来，好象根本不知道刚才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分歧。“我们就是要举旗抓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这是搞好年终分配的根本保证。你们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陈更新的脸红了。

“陈老师，”李军用热烈而期待的眼光望着陈更新，把刚才赵成业看过的一篇篇稿子放到他手中：“你再给我们提提意见。”

正在此时，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二虎气鼓鼓地跑了进来，一面喘气一面说：“胡立贵坏透了，向他领几张纸，他说是非生产性开支一律不给报销。还说我们数学不学，搞大批判，是鸭子犁田，狗捉老鼠，……”

“你们踩痛了他的尾巴，他当然要跳

喽！”赵成业朗声地笑了起来，“不要紧，纸张到下伸店去买，回来向大队报销。”接着，他回头来望着陈更新：“陈老师，这不就是斗争吗？”

陈更新把稿子放入口袋，对大伙说：“我现在就去买。”随即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会计室。

三

大批判专栏贴出来了！其他宣传教育工作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李军他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紧张地进行年终结算，贫下中农不时跑来提供情况。整个二队，就象燃红了一堆火，越烧越旺。

这一天上午，李军早早来到了会计室，她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等着同学们到来。她坐在桌旁，一本本翻着账簿，渐渐陷入了沉思：这几天胡立贵一直扬言不干了，这是他以为队里没有顶替他的人，存心威胁集体。“哼，别打错了算盘”李军暗暗在心里拿定了主意。这时，陈老师和同学们以及阿奎伯等几个贫下中农，相继走了进来，大家坐在一起研究胡立贵问题。这次他们发现胡立贵把今年盖仓库的一笔款子转到明年的公积金中去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想让大伙今年多分一点，表示愿意检查。大家都认为这只是胡立贵耍的一种“障眼法”，决定写一张大字报，发动群众从这个问题上来打缺口……大字报写好后，阿奎伯他们先回去了，陈更新与阿兵去贴大字报，屋子里只留下李军一人，她准备把结算再复算一遍。只听得“吱呀”一声，门轻轻地开了半边，李军抬头一看，一个人走了进来，随手把门掩好，回过身来，对她嘻开大嘴一笑，不是别人，原来是胡立贵。

“胡会计，有事吗？”李军眉毛一动，眼角里闪过一道警惕的光。

“嘿嘿嘿，没什么，随便聊聊。刚才到你家里，没找着……，陈老师和其他同学呢？”

“有事去了，有什么事告诉他们吗？”

“不，不，主要想和你谈谈。唉，这次你们来开门办学我支持得很不够，我应该检讨。”胡立贵假惺惺地说。

“胡会计，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当然，当然。年终核算搞好了，就要准备分配，这是关系到每户社员一年生活的大事，我们一定要使大家都满意，是吧？”说到这里胡立贵停了下来。

李军听他说得越来越不是味，便严肃地说：“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嗯，我主要考虑你们家的情况，阿军，今年你父亲住院，花去了不少钱。你家劳力少，又是军属，理应由队里负担，这符合财会制度的。你把所有的收据去拿来，我给你做账，好吗？”

没等他说完，李军倏地站起来，两道闪电似的目光逼视着胡立贵，怒不可遏地说：

“你想用金钱收买我吗？胡立贵，告诉你，你算盘打错了！”说着拿起算盘往桌上猛地一放，秀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凛然不可侵犯的英气。

“别误会，别误会。”胡立贵一看苗头不对，正想拔脚往外溜，这时门被推开了，二虎、阿兵等人跑进来，差点和胡立贵撞个满怀。

“胡会计，什么事？”陈更新最后进来，还不知出了什么事。

“他想和我们做交易，用钱堵住我的嘴。”李军鄙夷地一笑，把胡立贵压矮了三寸。

“胡立贵，别做梦了。”二虎大声吼道：“你还是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吧！”

附近的一些社员也闻声赶来了，一时会计室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愤愤地望着胡

立贵。

他站在墙角落里从沮丧、绝望，忽而变得疯狂起来，他用眼扫了一下屋里的社员，“蹦”地一下跳到陈更新面前，大嚷起来：“好呀，你们开门办学，就是来冤枉人、整人的。你们搞吧，我不干了，让你们这些硬绷绷、响当当的中学生来当家！……”

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往桌上一摔。

“你要无赖！”陈更新气得说不出话来，同时又因为胡立贵掀纱帽，不觉心头一紧。这时，李军反而用手从容地掠了掠耳后的短发，冷冷地望着胡立贵。

门外社员因一时不太了解前后经过，所以没有人说话。胡立贵看见没有人作声，以为大家都被他吓住了，气焰更加嚣张，朝着社员们又嚷开了：“我不干了，你们今年分红的钞票向他们这班学生去要吧！”他回过头，一眼看见了桌上的那把祖传的算盘，又是一个箭步直窜过去伸手就拿：“这算盘是我家的，不给你们用！”

二虎、阿兵等人撩起袖子，李军也把拳头猛地握紧，胡立贵还以为她要来夺这把算盘，死命往后一拽，谁知李军根本不准伸伸手，他却因为惯性太大而摔了个四脚朝天，那把算盘也正好碰在房柱上，顿时散了架子，珠子滚了一地。

人们哈哈大笑。

“胡立贵，夹起你的尾巴来吧，你想用那把破烂肮脏的算盘，阻挡我们革命道路吗？办不到！”李军的话，就象一块坚硬的飞石，砸得胡立贵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说得好！”赵成业和阿奎伯等人赶来了。

李军愤然地把胡立贵刚才的阴谋对大伙说了，群众顿时就义愤填膺！

“你自己是‘贼猫不改偷鱼性’，还想拖人下水呀！”阿奎伯气呼呼地说。

“胡立贵，我们到公社建筑队去过，他们估算仓库造价最多只要二千三四百元，这笔钱你是怎么入账的？”

一个女社员接着揭发：“我问你，队里饲料票你是怎么发的？不记账，安的什么心？”

一个青年男社员严厉地责问道：“胡立贵，队里的许多东西，账上有，实物不见，你这是玩的什么花招？”

……

胡立贵象一棵被霜打的菱草，张了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赵成业起来讲话了。他拿起那串被胡立贵摔在桌上的钥匙，望了望大家，响亮地说：

“这次农中师生到二队开门办学，和贫下中农一起，抓了路线教育和阶级斗争，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是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接着，他用手严肃地一指：“胡立贵问题很严重，态度极不老实，而且他还用躺倒不干的手段来威胁大家。我相信，二队贫下中农是决不会被难倒的。”

“他不干，我来干！这副担子我来挑！”李军从支部书记的身边向前跨了一步，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意愿。

“什么？”陈更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点迷惑了，他对李军说：“你还有两个月才能算毕业哩。”

阿奎伯走上前去，激动地握住李军的手说：“阿军，你是我们贫下中农信得过的接班人！”社员群众团团把李军围住，热烈地鼓起掌来。同学们也争相上去紧握她的双手。

李军爽朗地笑了，她说：“按照学校的章程，我还有两个月才能毕业，但是在为农村三大革命服务的道路上，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现在只不过是转到另一所新的学校里学习罢了。陈老师，你说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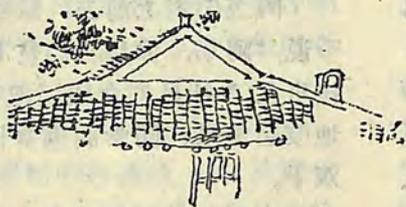
陈更新感慨万分，说不出话来。李军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她提出的新的课题。他出神地望着那个十分熟悉、但又似乎有些陌生的女孩子。从她那乌黑明亮的眼睛里，稚气未脱的笑声中，从她那微微握紧的拳头和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上，都好象有一种力量在放射出来。

小小会计室，就象油锅里撒了把盐似地炸响了。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阿军，你干吧，我们支持你！”

陈更新一个劲地点头。也许是激动的缘故，额上竟冒出汗来。他看看李军，只见她握着成业叔刚才交给她的那串钥匙，站在屋子中间，向大家腼腆地笑着。窗外射来的一道阳光正照在她的圆脸盘上，就象一朵绽开的葵花。

（题图、插图：黄全昌）





小菁和小健

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生 王晓元



小菁今天可高兴啦！大清早，他就起来了。帮奶奶抱了一捆柴禾，就背上筐，拿着小镰刀去割羊草了。出门时，天上的星星还来不及藏呢！

奶奶说：“天还早呢，吃了饭再去割吧。”

小菁一扭脖说：“不啦，吃了饭，还要去接小健呢，姑姑不是来信说，小健今天乘小火车来吗？”

“咳！小火车要十一点才到哪！”

奶奶还没说完，小菁早就三蹦两跳跳没影了。

小菁当然高兴啦，表弟要来乡下过暑

假啦！姑姑的信里还说：要让小健到农村见见世面，参加劳动，受锻炼，过个有意义的暑假。嗨！暑假，农村里可忙啦，早稻熟了，大人都忙着割禾，犁地，插晚稻秧……忙极啦！小菁的哥哥也和大人下田了。家里那两只羊，就让小菁包干了。今天，小健要来了，小菁上午要去接他，不能去放羊。小菁昨天晚上就想好了，早上，早早起来，割好草，喂饱羊，吃完饭就去接小健。

太阳出来了，小菁也割了满满一筐青草，回到家来。

小菁喂了羊，吃好饭，戴上麦秸秆小草帽，就出门上火车站去了。

没多久，就听到小火车“呜呜”地叫，小火车进站了。小菁在人流中找到小健，急急地说：“队里双抢紧张哩，爸爸、妈妈、哥哥都没时间，奶奶让我来接你。”一面抢过小健的行李包，提在手上；一面摘下自己的小草帽，扣在小健头上，小哥俩就上路了。

一路上，小健可爱说话了。一会说：“小菁哥哥，你上几年级？”

“四年级。你呢？”

“我等开学才上三年级。”

一会又说：“小菁哥哥，我们家旁边盖了一栋大楼房，五层楼！”

小菁说：“我们队冬天盖了个大仓库，能装好多粮食。”

小健又说：“我们那条街，有好多树，夏天象大伞似的，把路都遮住了。”

小菁说：“有我们队里的树多吗？你看，那边山上的树，多不多？全是我们队里的。”

小健扬头一看：哟！山上全是树，整整齐齐地排着队，都一般大。小健看呆了。

小菁说：“那是我们队里栽的。这座山

上的是桐树。还有松树、杉树、梨树、桃树、毛竹……好多好多！”

小健听呆了，眨眨小眼睛问：“里面有你栽的吗？”

“没有。”小菁真有点委屈，那时他刚上二年级，老师说他小哪！小菁停了一会儿说：“有我哥哥栽的。我给小树浇过水。”

小健又问：“现在还要浇水吗？”

“不要浇了，现在已经封山育林了。”

小哥俩不知不觉已经走到村口了。夏天的太阳真烤人，小菁和小健的头上都是汗。小菁把小健带到一棵大垂柳下，说：“歇歇吧。”放下行李包，摘下小健头上的小草帽，给小健搨起风来，一只手指点着，“一直往前走，过了那个晒场，就向左拐，再走一点就到家了。”

“我来搨。”

小健接过草帽，使劲搨起来。小菁就抬手攀了两根柳条，一眨眼，编成一个伪装帽。

小健在旁边看得真喜欢，说：“给我吧！”

“给你。”小菁把伪装帽扣在小健头上。小健马上觉得头上凉习习的，晃晃头，呀！叶子沙沙响。小健得意得一挺胸：“你看我，象不象解放军？”

小菁笑了：“象，象一点点！”

小菁戴上小草帽，提起行李包：“走吧，小健，进村了。”

进了村，小菁的话多了。一路走，一路给小健介绍：

“这是荷花家。荷花唱得可好啦！学校演戏唱小铁梅。”

“这是张奶奶家，她儿子抗美援朝牺牲了。暑假里，我们红小兵每天帮她挑水，还帮她打柴。”

前面有一家，门上挂着“光荣人家”的牌牌。小菁说：“这是阳生家，他哥哥是解

放军。春天时，他哥哥寄回一张照片，是在海边上照的。他哥哥挎着冲锋枪，站在岩石上，可神气了！晚上我带你来看。”

快到晒场了，小菁忽然向右拐进一条小巷。

咦？不是穿过晒场向左拐吗？小健奇怪了：“小菁哥哥，还没到晒场呢，怎么向右拐呀？”

“我带你去看地主家。”

小健吃了一惊，生气了：“我不去！”转身往回走。

小菁回头一看，忙喊：“哎——小健，小健，听我说，”他赶紧追上小健，“我告诉你哪是地主家，你就不会走错门了。我不告诉你，你认识哪是地主家吗？说不定你串错了门，进去了还不知道呢。”

“噢！”小健明白了，转身拉着小菁的手说：“走吧，带我去看看。”

哥俩来到地主家门口。大门虚掩着，里面冷冷清清的没有人。小健往里瞅瞅，哟！院里乱糟糟的，畚箕锄头胡乱丢，地上尽是稻草、烂菜皮，屋檐下还挂着大蜘蛛网。真脏！

小菁说：“赖秃子家好吃懒做惯了，解放前，尽是丫头侍候他，解放后，谁还受他那个剥削？院子脏得象猪窝，墙上都长草。”

小健问：“这家狗地主姓什么？”

小菁说：“姓赖。老地主叫赖福乾，外号赖老秃。干巴巴的小脑袋，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痲病鬼。听奶奶说，他解放前最霸道，剥削穷人就象他那个秃头脑袋，一星一点也不给你留。土改时，斗争了他，把他家地也分了，房也分了，气得他大吐血，那年死时，眼睛都不闭。他儿子叫赖祥龙，五十多岁了，也是秃脑袋，溜光贼亮。赖老秃就这一个儿子，解放前，他怕他家绝了香火，仗着他家有钱，拚命给他吃补药，结果把头发都冲光了，还大病了一场。……赖秃子跟

老地主一样坏，象个癞皮狗。呸！”

小菁说完，小健也吐唾沫，“呸！呸！”心里死死记着：“赖秃子，癞皮狗！”

小菁把小健带到家，已经是正午了。

吃了午饭，小菁又领着小健里里外外的看了一遍，然后把他带到屋里，把自己的课本、作业本，和好些心爱的东西，统统摆在桌上，给小健看。小健翻着这个本子，看着那只弹弓，眼睛都忙不过来了。

一会儿，小菁又小心翼翼地从小窗台上端下一个玻璃缸，放在桌上。

小健一看，啊呀！真漂亮！两条小花鱼在里面游，身子红一道、黑一道。哈！好看！好看！小红尾巴乱甩，脑袋撞到玻璃缸上了！哈哈！小健高兴得直嚷嚷，又拍手，又跳脚。好一会儿，又问小菁：“这是什么鱼？”

“刨花鱼。”

“是买的吗？”

“不是，是大哥哥抓来的。它是野鱼，池塘里有的是。”

小健真喜欢，围着玻璃缸，看了又看，说：“小菁哥哥，让大哥哥给我也抓两条吧？”

小菁说：“大哥哥在队里劳动哩！等过了农忙，一定给你抓。走吧，到咱队里去看看。”

小菁又领着小健看了队部、大仓库，又看养猪场。转了半天，小菁还说没看完，说，以后放羊的时候，再带他看。

从第二天起，小健开始跟着小菁一块去放羊。一路上，小菁又领着他，看叔叔婶婶们割稻子、犁田、插秧。又领他看了队里的鱼塘、山林，还告诉他，这是什么草，那是什么树，……呵，农村真大啊！

一晃好几天过去了，小健长了不少知识。这天是青岗小学的返校日，小菁要到

学校去，不能放羊了。

小健跟奶奶说：“姥姥，我去放吧，我跟小菁哥哥放了好几天了，认识路啦。”

小菁也说：“奶奶，小健不会到处乱跑。”

奶奶答应了，牵着两只羊，送小健到门口，还一个劲地叮嘱：“小健，不要走远啊，别让羊吃了庄稼，早点回来啊！”

“知——道——啦——”小健牵着两只羊，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小健牵着两只羊，就象牵着两匹大马似的，一路可神气啦。几天以前，小健还没见过真正的羊，现在，小健不光见着了，还能一个人放羊哩！真不简单！正在田里插秧的大叔二婶，也夸小健爱劳动。

吃过午饭，美美地睡了个午觉，小健又牵着两只羊出门了：我要找一块好草地，把羊喂得饱饱的，要它快快地长……长得比马还大！……

小健穿过晒场，路过村口的大柳树，小健想攀柳条，编个伪装帽。唉，小健既够不着，也不会编，算了吧！

小健往前走，绕过稻田，不觉来到池塘旁。这儿有好几个大池塘，一个连一个。鱼塘旁边，长着几棵高大的枣树，树荫浓浓；树荫下的青草，也长得肥肥的。小健看看树荫，看看青草，挺满意，就把羊拴在树下，让羊吃草，自己就背靠着枣树，坐在草地上拔草棵玩。

“……这些池塘里养了多少鱼啊？”小健望着鱼塘想着。池塘里的水，绿莹莹的，鱼儿在里面游，风儿在面上吹，水面上现出许多波纹，太阳一晒，银闪闪的直跳，好象……好象鱼鳞！好象一条大鲤鱼在水面上翻身，鱼鳞抖着银光，真好看！

小健看呀看呀，又想起了刨花鱼。刨花鱼藏在哪儿呢？小健不拔草了，站起来，走到塘边上。塘边浅水里，小鱼象小铁钉在水里钻着，小健的影子一过来，小鱼马上

都逃没影了。

小健沿着塘边走着。在两个鱼塘相连的地方，传来流水声。小健走近一看，呀！下面有个洞，原来水是从洞里流过去的。洞上是块大青石板，面上刻了许多字，小健认不全。小健又趴到这边洞口看看，咦？谁把个畚箕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干啥？小健觉得很奇怪，把畚箕提起来，放在路上。小健站起身，忽然发现草丛里有个大瓦钵，里面有鱼！活的，半截铅笔那么长，还在里面游哪！这是谁的鱼呢？小健抬头看看周围，风轻轻吹着，树叶子“沙沙”地响，小草“飒飒”地点着头，可静呢，大人都下田啦，这儿没人来啊。

小健又蹲下去看，突然一个声音吼起来：“小鬼！想干什么！”

小健回头一看，一个大人站在他背后，戴个大草帽，气汹汹的，半截裤子都是湿的。小健很生气，不理他，“谁知你是好人是坏人！”

戴草帽的人看看小健，忽然变了副笑脸，说：“小鬼，你是城里来的吧？”

小健也打量那个人：这人的草帽怎么压得这样低呀？会不会是秃子？一想到秃子，小健的神经绷紧了，“赖秃子，癞皮狗！狗地主！”

那人好象知道小健在想啥似的，嘴里说着：“一定是城里的，我看你的衣服就知道。”随手摘下草帽，搵着风。

小健一看，哦，这人不是秃子，一头头发象毛刷子，花花白白的。小健暗暗吁了口气：“不是赖秃子。”

那人又问：“你是哪家的？”

小健这才说：“二小队刘家的。”

那人一听，楞了一下。过一会儿，好象明白了似的，说：“就是晒场过去刘顺湘家？认得，认得，老贫农家。我也是贫农。”

小健这才放心了，说：“我是来姥姥家

过暑假的。今天小菁哥哥返校了，我替他放羊。”说完又指指枣树下拴着的两只羊。

那人看了看羊，又看看大路那边的山，说：“你的羊长得真肥呀……你喜欢小鱼吗？”

小健高兴了：“喜欢，我喜欢刨花鱼。”

“好，我给你捉几条刨花鱼。你会捉鱼吗？”

“不会。”

“我教你。”

那人拎起那只畚箕，下到塘边，又把畚箕堵在洞口，就象小健刚才见到的那样。“鱼进了畚箕，你就提起来。”

小健好奇地看看畚箕，看看瓦钵里面的鱼，指着这些东西问：“这些都是你的吗？”

“是，是……怎么啦？”

“小菁哥哥说，这些塘里都放了鱼苗，禁止捕捞。”

“哦，”那人竟笑起来说：“唔？我还不知道保护集体财产？……放的鱼苗都长半斤多重了，不会游到畚箕里去的。我钵子里的都是野鱼。……怕什么，你不认识鱼苗，我还不认识？”

小健想想，可能是吧，人家五十多岁了，还会不认识吗？……

那人好象不耐烦了，说：“小鬼！替我看着我，捉到刨花鱼就归你。我有事，一会就来。”

小健还犹豫哩：“嗯，嗯……我还要放羊呀！”

那人马上想好了：“放到路那边山上去，山上草多。”

小健说：“小菁哥哥说，那边山上都封山育林了，不能放羊。”

“嗨呀！你真死板！”那人边说，边走到枣树下去解羊绳，“封山育林的山会插牌子的，这座山插牌子了吗？没有。没有插牌

子的，就能放羊！……”

那人不由分说，牵着两只羊，走上山坡，把羊拴在小树上，还不住地夸说：“……山上的草多肥，你把羊养得肥肥的，你姥姥看了就更喜欢你……”

小健被他说糊涂了，站在枣树下，不知怎么办才好。

那人一会儿就下来了，还折了两根长树枝，拿在手里边摇晃，说：“小鬼，帮我看着呀，我给你这个玩。”

“哎呀！你怎么折树枝！？”小健心痛得叫起来，“哎呀，小树会折坏的！”

“嘿嘿，不碍事，我给小树打杈哩。”

“真的吗？”

“我哄你干啥！”

小健这才放心了，看着那人走下山来。

多好的树枝，要能编个伪装帽多好啊！小健望着那人手里的树枝，等他走近了，问：“大伯，你会编伪装帽吗？嗯，象解放军叔叔戴的那样的。”

“伪装帽？”那人想了想，“……哦，这好做。走吧，我给你做个好的。”

那人把小健带到鱼塘边，编好一个伪装帽，递给小健说：“小鬼给我看好呀！我一会儿就来。”说完压了压草帽，走了。

池塘边又剩小健一个人了。

小健趴在青石板上，朝畚箕里看呀，看呀：小鱼顺着流水，游啊，游到畚箕里。流水挤过畚箕的箴缝出去了，小鱼出不去，在畚箕里转啊，转啊，一条、二条、三条，……越来越多。小健高兴极了，“哗”的一把提起畚箕，哈，小鱼在畚箕里蹦，逃不了啦！

忽然远处传来小菁的叫声：“小健——小健——”

“哎——”小健拎着畚箕站起来，喊道：“小菁哥哥，快来看呀，好多的鱼——”

“啊？！”小菁吃了一惊，他当小健是卧

在塘边玩哪，原来是在堵鱼！小菁望着那个畚箕，不由得怒气冲天，奔过去，双手夺过畚箕，沉到水里。

小健也呆了，望着沉在水里的畚箕，不知怎么回事，等看到鱼都逃光了，才叫起来：“小鱼……”

“还鱼、鱼的！告诉你这里放了鱼苗，你还来堵鱼！”

“啊？我、我？……不是我……是野鱼……”

“谁说是野鱼？”

“……嗯，……那个老伯伯说的……”小健傻呆呆地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憋不出话，“……畚箕也是他的。”

小菁瞅着草丛细细看了看，里面好象有个瓦钵，就走过去，扒开草棵一看，看见了瓦钵里的小鱼，忍住的火气，象小皮球一样弹了起来：“这不是鱼苗是啥？就是鱼苗！”

小菁气坏了，端起钵子就往鱼塘里倒，鼻子里哼哼着：“堵鱼！不好好看着羊，跑这儿来堵鱼！那老头是谁？”

“……我不认识……嗯，他说给我堵刨花鱼。”

“刨花鱼？哼，就知道刨花鱼！我看那老头不是好人，他收买你哩！”

“啊！”小健慌了，“他说他是贫农，他还说他认识姥姥。”

“贫农？哼！老贫农还会把鱼苗说成野鱼？还会侵犯集体经济？哼！没见过这样的老贫农。他怎么没去插秧？”

“啊？！”小健嘴巴张张，说不出话了。

小菁说着提起畚箕，又对小健说：“走吧，把这送到队部去，没收了。”

“走哇，楞站着干啥？你去把羊牵来。”

“羊？”小健好象没听懂。小菁奇怪了，抬眼四下望了望：“咦！羊呢？你把羊拴哪儿了？”

“羊?”小健这才明白过来,“羊在山上。”

“啊?跟你说过,那是封山育林的山!”小菁气急败坏,脸蛋涨得象西红柿,拔腿就往山上跑。

小健知道坏事了,脑袋“嗡”地炸开了锅,他看小菁往山上跑,也磕磕碰碰地赶紧跟着跑。小健恨哪,那老头为啥要骗他?明明是鱼苗,硬说是野鱼,用畚箕堵队里的鱼苗,还要小健看着;明明是封山育林的山,还硬说不是,还把小健的羊拴在山上!小健想哭,小健想喊,可是,小健的喉咙里象哽了块生鱼,又恶心,又难过,堵得喘不过气来。

远远的,哥俩都看见了那两只羊,有一只 在树杆上蹭着,蹭得小树摇摇晃晃,好象在向他俩招手:“你们快来救我呀——”

小菁飞似地跑上去,扔下畚箕解羊绳。羊绳真不知怎么系的,拴得又高,留得又短,七弯八绕的一堆死疙瘩。那两只羊因为绳子短,吃不着草,饿得“咩咩”叫。

小菁费好大劲才解开一只,抬头一看,小健已在解另一只,可怎么也解不开。小菁再一看那棵小树,啊!树皮被羊啃了一块。这简直是啃了小菁一块肉!小菁心痛极了,上前一把推开小健,“你,你可真会拴!”说着抓起一把泥敷上树去。

小健从没见过小菁发火,这下被小菁推得一个踉跄,满肚子的难过、委屈、伤心,全喷出来,刚说了声:“是那个死老头拴的……”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啊?又是他?!”小菁听小健这一说,又见他哭得这样伤心,心想小健还小呵,第一次来农村,知道啥呀?我当哥哥的怎么没调查就怪他,还……还发态度!

小菁忍着性,解着羊绳,好好地跟小健说:“别哭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是栗树。老贫农还会不认识?假贫农!”

忽然,小菁注意到:小健头上的伪装

帽也是栗树枝的!小菁又来火了。可又一想,小健不会编伪装帽,就问他:“你那伪装帽是谁编的?”

这一问,小健才想起,头上还戴着伪装帽,那个死老头折栗树枝编的伪装帽!小健一把扯下伪装帽,狠命摔在地上,呜呜咽咽地说:“呜……我错了,都是那死老头害的我……”

又是这个死老头!会不会是赖秃子?小菁想了想说:“你别哭了,啊!我问你,那人啥样子?”

“嗯,嗯,瘦瘦的,戴个大草帽,裤子半截都湿了。不是秃子!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一头的杂毛头发。”

小菁说:“你看清楚了?”

“他要是秃子,我还能叫他骗呀!”

原来他只记了个特征!小菁明白了,两眼瞪着小健,真不知该怎样说。

“……你呀,你就吃了这个亏!坏蛋干嘛一定是秃子?林彪秃了,刘少奇可没秃!孔老二还长了一头白毛哩。可他们都是一样的反动脑瓜,干坏事,一肚子坏水!”小菁的喉咙象在冒火,声音都变了,“看人可不能尽看外表,也不能光听他自卖自夸,你得看他干些啥。”

小菁使劲地咽着唾沫,把话再拉过来:“还有,他说他是贫农,你就信。现在这些坏蛋可没这么傻,他头上又没写字,他当然不会敲着破锣直嚷嚷:‘我是地主,我是富农!’赖秃子溜到镇上倒卖油菜籽,给市场管理人员抓着了,他还扯谎,说他是贫农。可巧那天,爸爸和保管员去买农药,在南街上遇上了,把他押了回来。”

啊?!小健还是第一次听说!嘴巴张大得大大的,脸上挂着泪珠。

“走,咱们抓那个老头去!他裤子都湿了,说不定躲在那儿偷大鱼哩!”小菁叫小健去牵那两只羊。

小菁也提起了畚箕和瓦钵，准备下山。刚要迈步，忽然他一回头，弯腰拾起那个伪装帽：“这是证据，到时不怕他赖帐！”

他又对小健说：“他要是赖帐，你就跟他对证，别怕他！这号人，不是地富，起码也长了颗地富脑瓜，不是好东西。”

接着，小菁又教小健，下山后怎样办，怎样跟那人说话。小健望着小菁不住地点着头，呵！小菁哥哥，好象比他高多了，早晨小健还不觉得。可现在，小菁象个大人似地拿主意，怪老练的。“我要象小菁哥哥一样！”小健想着，努力挺起胸脯，跨着大步走着。

下了山，穿过大路，小健把羊拴在枣树下，小菁把畚箕藏在鱼塘边的草丛里，小菁俩就坐在塘边等着。

太阳快下山了，那个戴草帽的人终于从树丛里走了出来。他看见了小健，老远就打着招呼：“小家伙，你还在这儿呀。”

小健按着小菁教的，平静地说：“等你呀。”

那人阴笑了一下，不过大草帽遮了他半个脸，小菁和小健谁也看不见他的眼睛，只见他的嘴巴动了一下，没声音。

小健轻声问小菁：“他是谁？”

“不认识，他不是我们村的。”

那人走近了，想问小健堵了多少鱼。可是小菁在旁边，他不好开口，（他早就猜出这个男孩是小菁。）于是就说：“你们是在堵鱼吗？”

小菁笑着说：“我们在堵大

鱼。”

那人放心地笑起来，露出秃苞米似的大黄牙说：“给我看看，堵了多少？”正笑得得意，小菁突然跳起来，厉声说：“堵你这条大鱼！总算把你等来了！”

那人的脸刹地黄了，下巴抖动了一下：“你怎么这样说话！”忽然又换了一副脸色嚷起来，“好哇！你们在这里堵鱼！塘里放了鱼苗，你们是在破坏集体经济！……”他说着就向青石板上蹿去，活象只四脚蛇。

小菁冷笑起来：“你也知道塘里放了鱼苗？说得好，说得好！小健，听见没有？他也知道塘里放了鱼苗，禁止堵鱼。”

小健忿忿地说：“听见了！可是他刚才说，‘鱼苗都长半斤重了，不会游到畚箕里来’。”

那人蹿到青石板上，向洞口伸手一捞，



可是他捞了个空，差点掉到塘里。

小菁问：“你要提畚箕吗？”说着从草丛里提起畚箕，“在这儿哩！”

那人正想伸手夺畚箕，小菁早把畚箕交给小健：“好好看着。”自己撒开腿冲向不远处的一片树丛，那人刚才就是从那儿钻出来的。

那人惊呆了，也想转身到树丛里去，只见小菁拎了只铅桶跑了出来，边跑边气愤地叫道：“好家伙，还偷了队里这么多大鱼，这可是把柄哪！”

那人立刻沁出一头黄豆大的汗珠，也顾不上铅桶和畚箕了，掉转身子想走到公路上去。

啊，他想溜！不能让他走！小菁“腾”地跳到他的面前，拦住他：“你的东西也不要了吗？”说着，把铅桶举到他的眼前。

那人不得不站住，两眼紧盯着铅桶，说：“铅桶不是我的。”

“就是你的！”小健跳了起来，“你干的坏事多得很！捕捞鱼苗，偷捉大鱼，把我们的羊拴到封山育林的山上，还折小树的树枝，还骗人，说自己是贫农，……”

“小杂种，诬赖好人！我不是贫农，还是地主？你造谣生事！”

那人恶狠狠地盯着小健，气汹汹地骂，他以为小健人小胆也小，会被他吓住。

小健才不怕他！抢上一步大声说：“干了坏事不承认，证据在我们手里，你赖不了！”

小菁忽然指着路那边的山，问那人：“那是什么山？”

“我知它什么山！”

“山上长的什么树？”

“我知它长的什么树！”

小菁拿过那个栗树枝的伪装帽说：“哎，你不是‘老贫农’吗？不认识山，还会不认识树吗？鬼话！”

那人看着这只伪装帽，下巴又动了一

下：“哼，你们贪玩折了栗树，也赖我！”

“你倒打一耙！”小健说。

“你到底还认得它是栗树！行了。”这时小菁挥了挥伪装帽，朝小健使了个眼色，小健明白，立刻朝大枣树下跑去。

小菁又说：“喂，你不是说，你是贫农吗？你为什么没去劳动？！现在双抢紧张得很，农活忙不过来，可你穿着鞋子，腿上没有泥巴，裤管上却湿漉漉的，你是什么贫农，假贫农！”

“谁、谁说我不劳动，…… 谁说我不劳动，……”那人慌了，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

“你劳动了？你干的什么活？”

“我……我肚子痛！”

“肚子痛？那你怎么不在家休息，还到这儿东奔西颠的，我看你是脑子坏得痛，肚子就不痛！”

“你、你血口喷人！我根本就不认得你，你凭什么诬蔑我？我就是贫农！你诬蔑贫下中农！”

小菁针锋相对：“我也不认得你！你是哪个村的？”

“万竹村的。”

“叫什么名字？”

“李老倌。你去调查好了，看是不是贫农。”那人说完倒吁了口气，抱着膀子冷笑。

“你说你是贫农，谁能证明？走，到队部去！”

李老倌竟不肯走：“我没闲工夫，我得回去收晒场，万一天下雨，淋坏稻谷你负责！”

“你不是肚子痛吗？出来一天了，也没想着晒的稻谷，现在倒积极起来了！”

这时小健牵着两只羊，走到李老倌的面前说：“你不是认得我姥姥吗？走，见我姥姥去，走！”

李老倌一听这话，两腿弹起琵琶来，脸

色象刚打过摆子的病人，又黄又青，黄豆汗又冒了一头。

小菁把瓦钵、伪装帽都装在畚箕里，提在手上，威严地吼道：“你走不走?!”

李老信又擦了一把汗，偷眼望望这两个小孩，知道逃不掉了，就强作镇静地说：“你，你们这是干什么?……走就走呗，怕你咋的?……”

小菁和小健押着这个李老信回村去。

远远地看到村口的大柳树了。树下站着一个人，手搭着遮阳，向大路上望。小健眼尖，老远就喊起来：“姥姥，姥姥——”

小健这一喊，把李老信惊得一哆嗦，停在路当中。

“走呀!”小菁盯着李老信冷笑，“你不是认识我奶奶吗? 慌啥! 奶奶不是老虎，吃不了你。”

“……我有啥怕的……”李老信拉了拉草帽，只得硬着头皮，一步三摇地走着。

那边奶奶听见喊声，高兴地说：“啊哟，是小健哪，望了半天总算把你望回来了。怎么这样迟呀?”

奶奶上了年纪，眼花看不真，便问道：“那是谁呀? 是小菁吧? 还有一个呢?”

小菁大声答应着：“奶奶，是我。那个是万竹村的李老信。”

“啊哟，”奶奶听说李老信，忙迎过去，边走边说：“李老信呀，这么大忙，你怎么有空来走哇?”

“嗯?”听奶奶那话音，小菁和小健都疑惑了：这种人还会是贫农? 哥俩齐盯着那李老信，看他怎样回答。可那李老信竟一声也不敢应，草帽拉到了鼻梁上，都快戴不住了。

小菁说：“奶奶，他堵队里的鱼苗，还捉队里的大鱼，被咱们逮住了。”

“啊?”奶奶也犯疑了，怎会有这种事? 李老信爱社出了名，哪会干这种事?

等奶奶走近了，小菁突然跳起来掀下“李老信”的草帽，大声说：“给奶奶看看!”

这一掀，不打紧，奶奶盯着“李老信”厉声喝道：“徐大财! 原来是你，溜到这儿来充什么人?!”

徐大财露馅了。满头的黄豆汗一个劲地滚，脑袋顿时搭拉下来。

小健说：“姥姥，他冒充贫农!”

奶奶气愤地说：“他是富农! 赖秃子的大舅子。跑这儿破坏来了，押到队部去!”

“快走!”

从队部出来，小菁、小健和奶奶，都非常气愤，在徐大财的背后，还有个赖秃子呢! 别看癞皮狗今天装了一天老实，可徐大财今天的活动，都和他有关。可不是么，那只铅桶和畚箕拿到队部就露了馅，上面都有赖秃子的名字。当时小菁、小健没细看，可大队治保员一眼就看到了。徐大财想赖也赖不掉。

治保员去把赖秃子也带来了。这两个狗东西都傻了眼。

哼，去带赖秃子的时候，赖秃子还正躲在小巷里放毒哩! 说什么，干部家的人破坏封山育林，队里的规章都是卡老实人的，还说刘顺湘的孩子就能捞鱼苗解馋。冷枪冷箭，阴险极了!

经过审讯，这两个一贯勾结的坏蛋，成了两条抖散了骨头架的毒蛇，瘫在地上。

在回家的路上，小健和小菁都争着和奶奶说话。

“姥姥，大舅子是什么意思啊?”

“奶奶，徐大财怎么那样怕你呀?”

奶奶牵着他俩的手，听着他俩嚷嚷，耐心地说：“哎呀呀，叫我回答谁的好? 等吃过晚饭，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小菁和小健都不让。小健站在路当中，拉着奶奶的衣裳说：“不行不行，你不说，我就不走。”

奶奶拗他不过，笑起来：“哎哟哟，别把衣服扯坏了。大舅子就是一门亲戚。”

小菁赶紧说：“哦，原来徐大财跟赖秃子是亲戚。”

“徐大财是赖秃子老婆的哥哥。”奶奶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你们不是问，徐大财为啥怕我吗？我从头给你们说说吧。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这还是土改时候的事。解放前，徐大财的妹妹嫁给赖秃子时，赖家正是有钱有势的时候。徐大财仗着赖家的势力，在咱们村里买田产，租给别人种。咱们家就是徐大财家的佃户。“土改开始了。一天晚上，徐大财突然跑到咱们家来，装出副苦脸说，这些田不是他的，是赖秃子的。工作组来调查，就请给证明一下，他日后一定报恩。”

“我一听，不对头，徐大财想隐瞒田产，划低成份！哼，办不到！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找工作组。我把这事告诉了土改工作组。工作组把情况转告了万竹村。后来万竹村的工作组还说要不是这边情况来得快，徐大财这个富农还兴许会漏划呢！”

奶奶的故事还没说完，小健已经懂了，说：“难怪他怕见姥姥，姥姥知他的底细！”

“徐大财想当时炸弹！将来好帮赖秃子干坏事，不戴帽子更方便！”小菁大声抢着说。

奶奶看看小菁，点点头：“说得对。你看，他今天出来破坏，还冒充贫农呢！要是当时漏划了，那他不就更有‘挡箭牌’了？”

“哼！就算他当初漏划了，咱也会把他挖出来！刘少奇、林彪不都被挖出来了么？”小菁说。

奶奶瞧着小哥俩，高兴地笑了。

暑假过得真快，一眨眼，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小健就要坐小火车回城里去了。

小菁想送点礼物给小健，“送什么呢？”

小菁问小健。

小健望望窗台上玻璃缸里的刨花鱼，呵！多漂亮！小健想说：我喜欢刨花鱼。可一想到那天受徐大财的骗，小健心里就气愤，脑袋立刻扭到一边，大声说：“我不要刨花鱼！”

小菁的眼睛忽闪了一下，突然也激动地叫起来：“我就送你刨花鱼！”

咦？这是怎么搞的？哪有专拣人家不要的硬送？！

奶奶在院子里听见了，走进来说：“小健呀，就拿着吧。今后常看看刨花鱼，别忘了那回受骗的事。咱们和坏蛋们的斗争还没结束呐！”

小健这才收了。可心里还犹豫呢，小菁哥哥也喜欢刨花鱼，他……

奶奶帮小健收拾好东西，小菁要送小健到车站去。

奶奶问：“明年暑假还来吗？”

“来，我回去就跟妈妈说，明年一定来。”

奶奶很高兴：“咱们小健也爱农村哩！”

小哥俩出发了。

金色的阳光照着他俩，路边的小草、远处的青山都望着他们笑，瞧，池塘里的鱼还特意跃出水来看他俩呢！小哥俩一路走，一路看，心里真喜欢呐！

“等我念完中学，我一定到乡下来，当个新农民！”小健说。

“真的吗？啾——啾——”小菁高兴得一个劲地笑，逗得树上的小鸟也一个劲地叫。

“那时，我和阳生、荷花一起来接你！”

红红的太阳升高了，照着青色的山，照着绿色的水，照着他们脚下长长的路……

（题图、插图：韩伍）

第五十一个学员



任志高

夜幕，在暴风雨中降落了。

真得感谢老天爷，为我们函授教育短训班安排了这样好的“第一课”。连日来，淮河两岸大雨接连不停地下着。县委已经发出了防洪排涝的指示。我们这个农用柴油机短训班，当然也不能坐在教室里关门上课了。而况今天下午，李寨大队三台柴油机同时都坏了，零件一时又配不上。救灾如救火。我决定连夜赶回县城去搞配件。

暴雨乘着狂风的威力劈头盖脑地向我打来，雷声夹着闪电不停地在我头上炸开。风、雨、雷、电交织成一片，象是千军万马在进行一场厮杀。公路两边的柳树完全失去了那种婀娜多姿的神态，在狂风中挣扎似地乱舞；田野里一望无际的玉米在暴雨的密网里左右摇摆着，仿佛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抵抗暴风雨的侵袭；公路上，暴雨不停地在汇成的水流里激起无数的水花，狂风又把水花吹成水雾，向四面八方刮去。

天越来越黑，雨衣早已不起它应有的作用了，我还是下意识地把它裹紧身子，象羊顶架似的低着头，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

冲去。

突然，我本能地哆嗦了一下，抬起头警觉地向四周扫了一眼，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喊叫。可是，眼前漆黑一片，满耳雷声隆隆，我又怀疑起自己的听觉来。但，几秒钟以后，我又听到确有一个喊叫的声音夹在雷声中：“一——二！一——二！”这声音是这样地节奏有力，包蕴着无限力量和勇气。

这时一道闪电在天空颤抖了几秒钟。在闪电的亮光里，我看见一个身影正吃力地用绳子拖着一辆手扶拖拉机。看样子是拖拉机陷在水坑里了。

“谁？”我不禁大叫了一声。

“我！”回答是一个女同志的声音。“快来，帮个忙吧。”

于是我们俩一前一后，按她的口令：“一——二！一——二！”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手扶拖拉机从泥坑里拉了出来。这时，她把身子往拖拉机上一靠，舒了口气。

“你怎么一个人，从哪里来？”我问。

“李德公社！”她回答。

“什么！”我惊异起来。在这样的狂风暴雨里，她已经赶了好几十里路。

又是一道长长的闪电，把她的形象完全显现在我眼前。看样子，她只有二十几岁，穿着一件塑料雨衣，肩膀上给绳子勒得留下了两条明显的泥印，大概里面还背着一个挎包，弄得雨衣鼓鼓囊囊的。雨水早已把她里外浇透了。水还在从雨衣的帽沿上往下滴。散到额前的头发，也被水沾成一个个尖角，不断沿着眉棱、鼻尖、脸颊，淌着水珠儿。往下看，她高高地卷着裤腿，光着两只泥脚。她身后留着深深的车辙和一串脚印。

看到这脚印，我更惊异了，难道她是走着来的。

她大概猜透了我的心思，说：“这条‘铁牛’，我本想骑着它乘风驾雨上县城，想不到只开了十几里地就坏了。没办法，只好牵着走。”听她的口气还挺得意。“同志，你从哪儿来？”她反问我。

“大河公社李寨大队，上县城。”

“干什么？”

“配柴油机零件。”

“你是县农机厂的？”

“不，我是上海来搞函授教育的。”

“什么，你们就是来办农用柴油机短训班的？”

“是啊。”

突然，她双手抓我的两只胳膊拼命摇着，说：“啊呀！我正要去找你们哪！我要求参加函授短训班，你们收下我吧！”她的声音简直有些发抖了。

这下我真有点茫然了，她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是答应还是谢绝呢？我只好不置可否地问：“你们公社没有函授教育的名额吗？”

“有，但不是柴油机这个科目。”

“那你等下一期吧，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事。”

“什么，还要等？！学习大寨，要大干快上，我们可等不及啦！”她有点急了。

我想告诉她班里已经招满了五十个学员，还想说几句要办理手续之类的话。但在闪电的光亮下，我看到她苍白的脸上堆满了严肃焦急的神情，话又咽了回去。

“同志，你可知道，我们这是给人逼出来的。”……

原来，事情是这样：她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但是，由于维修力量跟不上，有时还不得不“请”一些所谓有技术的人来修。而这些人却趁机要高价，还

要烟酒招待，不然就在旁边看笑话。一次抗旱，贫下中农在火里，他们却在水里。招待的香烟不好，就故意留个机器冒黑烟的毛病叫做“烟不好”；饭菜不够好，就故意留个供油不良的小毛病，叫做“不上油”。一气之下，她们硬把这两个黑机手“扣”了下来，发动群众狠狠批了一通。并把他们送到公社，进行批评教育。从此，黑机手不敢找上门来了，这次“工大”在县里办农用柴油机短训班的消息传到了她们的耳朵里，她们高兴得商量了几天，在贫下中农支持下，决定把拖拉机拖出来参加函授短训班。

“同志，收下我吧！收下我吧！”她用恳切的要求，结束了自己的叙述。

听完她的谈话，对她这个要求，我还能说什么呢？

风还在拼命地刮着，雨还是象鞭子似地抽打我们。但，我好像都没有感觉到。透过这风风雨雨，我仿佛看到，她拉着拖拉机迎着暴风急雨勇敢地前进；我仿佛看到，她带着喜悦的脸色，和同学们一起拆装柴油机；我仿佛看到，她自豪地回到了生产队，为贫下中农修机子……

望着留在她身后的那串脚印，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函授学员们那熟悉的面庞：为了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几年前就自动组织起农机修理小组的章明；为了实现大队的五年规划，提前三天就来报到的张云；不顾别人阻拦，工矿不去的铁杆“扎根派”李玲玲……他们都仿佛从这条路上走来，在身后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一个响雷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老师，我们走吧！”大概她也看出我想完了什么问题，就催促说。

我看了一下表，快八点了。离县城还有二三十里路，照这样连拖带推，少说也得四五个小时才能到。“不，还是让我看一下

（下转第57页）

一道考题



邱伟坚

“镰刀为什么会生锈？”

这是一位老贫农给我出的大学考题。题目看来普通、简单，但要真正答好，还不是那么容易呢！

那是上大学前的一天早上，我在家忙着整理行李。说实在话，一下子要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山村，感情上真有点舍不得。我把东西一件件放进箱子，忽然，我的手触到了床沿边一样东西，顺手拿起一看，镰刀！它不是什么精工细作之物，也不是出于能工巧匠之手，但是，我特别爱惜它。这是刚到山村时，大队贫协组长高大伯代表全村贫下中农向我们知识青年赠送的礼物。我想：上大学是去学知识的，看来，只能和它暂时“告别”了，就又把它的放到了床沿下。“在屋里干什么呵？”随着洪钟般的声音，门外走进来一位老人，他六十出头，两边霜白的鬓发衬映着淳朴的笑容，目光亲切，慈祥，他就是我尊敬的高大伯。

老伯头上汗水涔涔，一定是刚割完早稻回来，我递上条毛巾，说：“我想早点把东西准备好，空余时间还好和大伙再聊聊。”

大伯一边擦汗，一边四处看看，蓦然，他的目光停留在床沿下不动了，他走过去，俯下身子，拿起了镰刀，两道眉毛拧成了一个大结，满是青筋的大手轻抚着凝在刀口上的几点锈斑，就象在秧田里看到几株稗草那样的刺眼。“怎么，把镰刀丢下了？”“是啊，我想大学里反正用不着。”“用不着……”他轻声复了一句，沉思了好一会儿，又问道：“晓明，上大学的考题，都答对啦？”“全部答对！”“好，你忙吧，吃过中饭，到大伯家来一次，我还有一道题要考你呢！”说完，他带上我的镰刀走了。

我吃完了饭，来到了大伯家。这是一座普通农家的房子，几棵丝瓜藤爬上了屋檐，遮住了半个院子，我推开虚掩的门，桌上搁着我那把镰刀和一张纸条，我急忙走过去，拿起纸条，几行粗壮有力的字跳入了我的眼帘：

晓明：我下地去了，过会就回来。向你提一个问题：镰刀为什么会生锈？你好好想想，想想这把镰刀是怎样和你走过三年路的。

你的大伯

我捧着纸条，慢慢地坐了下来，细细地看着，默默地念着，胸中似潮水奔腾，这是一道普通的考题吗？我久久端详着桌上那把已给大伯磨去锈迹的镰刀，来村后的件件事又浮现眼前……

三年前的一个秋收季节，我们刚从上海到这里，就和队里社员一起，抢割黄豆，连着几天，累得我腰痠背疼，骨头架子象拆散了一样。手上还叫镰刀柄打起了一个个水泡，钻心似地痛。这天早上，我去上工望

着一片又一片成熟待割的豆子地，我暗自想道：“天哪，这要割到什么时候！”我感到劳动的日子竟是这样难熬，脸上不禁布满郁闷的神色。“嘻，不好受吧？”一个干巴巴的声音飘在我耳边，扭头一看，一个老头正朝我站着，脸皮就象烟叶似的焦黄，强装出不自在的笑意，我来村里后还没见到过这个人。“你们是大城市人，哪个干得惯这种又笨又累的活呵……”他见我吱声，又凑上来一步：“我看你年轻骨嫩的，可不能一下子把身体搞垮啊。”我的心一动，这人讲话倒蛮体贴人的。这时，我觉得手痛得更厉害了。我慢吞吞地下了地，皱紧眉毛，无精打采地割起来。不知咋的，“焦黄脸皮”的话老在耳朵里响着。一抬头，看见旁边的社员早割到前头去了，我一着急，慌慌张张地乱抓乱割起来，脚边一根豆秸，割了几下都没割断。我火了，一只手抓上去，另一只手用力猛地一砍，“哎呀！”我只觉左手指一阵痛，血从伤口流了出来，“焦黄脸皮”听见我惊叫，马上跑了过来：“不得了，口子还不小，快点回去吧，小心破伤风。”我又恼又恨，什么也不管了，气忿忿地扭头就走，到了家里，把镰刀甩在门角落里，手也懒得包，就上了床。

第二天下午，我躺在床上，仰头听着窗外赶牛车的吆喝声，挑担子的走动声，越睡越不是滋味，心里空荡荡的。正当我踌躇不安时，忽听门外有人喊：“晓明、晓明！”啊，是高大伯的声音，我来这里没几天，就听好多人说过，他对青年人管得特别严格，他常爱说：“对这些小后生，就要经常敲打敲打，不然的话，再好的铁也要锈啊。”不好，肯定是见我不上工，来“敲打”我了。我赶紧装出有病的样子，轻轻回了声：“哎。”门打开了，高大伯走到了我的床边：“这几天紧张地干，累坏了吧？”话里充满了爱抚的语气。奇怪，不象教训人，我这才睁开眼

睛，一瞧，大伯左手拿着扁担绳子，右手握把镰刀，点点灰屑缀满了衣襟，看样子，刚从地里回来。我忙说：“大伯，你坐。”“你睡着，不要起来，我是顺便看看，怎么，生病啦？”“没有，嗯……”我支吾着说，“有点不舒服。”大伯笑了，脸上一点也没责备我的样子，我倒感到难堪了。他笑着说：“这几天活儿是够累的，不要说你们，连我这个摆弄了几十年庄稼的人，都觉得腰痠腿麻。其实，这点苦有什么了不起，四三年秋收那阵子，鬼子钻到咱山区抢粮，为了不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手里，大伙一到晚上，就跑到地里，割的割，运的运，白天就在山洞里打粮食，连着几天几夜，每个人的眼睛都象害了眼病似的，又红又肿，干着干着，眼皮就不知不觉合上了。可哪个也没想到苦，一个心眼想的是让我们的人吃饱，把侵略者赶出去！如今，看着地里这么多、这么好的庄稼，我真睡梦里还在笑呢，把这些收上来，我们不是为社会主义又多了份贡献吗！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躺在床上是等不到的。我一想到这些，什么苦啊，累啊，又全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大伯说的很轻松，可我觉得比铁锤还有力，我再躺不住了，一翻身爬了起来，走到门边拿起镰刀，上面已染上层薄薄的黄锈。“两天不用，就锈成这样！”我喃喃自语道。不由又从大伯手中接过他那把镰刀，呵，银光闪闪，雪亮耀眼，大伯的镰刀不正象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思想上与贫下中农的差距吗？！大伯看着我，说出的话也象深邃的目光一样，能一下把人的“病根”看透：“晓明，思想锈了，刀才锈！只有永远把自己放在广阔农村里敲打、磨炼，手中的刀才不会锈呵！”我使劲点点头，握着镰刀，和大伯一道走出家门。

以后，在高大伯的带领下，上山割茅草，盖起了大队的战备粮仓，下河割蒲草，为我们的副业组提供“原料”。高举镰刀，

召开批判富农“焦黄脸皮”大会；挥舞镰刀，奋力斩断妄想缚住我们手脚的“变相劳改”毒藤。劳动中，我对镰刀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晚上睡觉，要把镰刀放在枕下，仿佛这样才睡得更香；看见天幕上的月牙，我也会想：“瞧，多象我手中的镰刀呵！”

又一年过去了。随着学大寨运动的深入，我们大队又添购了一台拖拉机。大队党支部决定让我当拖拉机手，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拔腿就往村里跑，镰刀也忘在地上了。我没跑几步，后面传来一句干巴巴的话：“嘻，永远甩掉了镰刀把子了。”这是什么话？！我一时来不及辨这话味道，反正觉得不对，我“腾”地转过身，瞪了“焦黄脸皮”一眼，一把拿起镰刀，向村里奔去……

繁星万点，月色如水。从拖拉机房出来，我来不及擦一下手中的油污，就急步向高大伯家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在想着稻田里的那件事：“真怪，‘焦黄脸皮’讲这句话什么用意……”高大伯听完我的叙述，脸上涌出一片怒容，随即又消失了，他若有所思地点头，问道：“你是怎样看的呢？”“我听了就觉得味道不对，他瞧不起我们握镰刀。”“光瞧不起？”大伯给我斟了碗水，亲切地说开了：“……‘焦黄脸皮’对你们知识青年握镰刀不仅看不惯，而且恨得很呢，他是想破坏你们走坚持乡村的道路，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只是一个：斗争！明天田头批判会不是有了一个活靶子吗？”大伯语重心长地说：“握上驾驶盘，可别丢了镰刀把呵！不管工作怎样变，经常握握它，脑子就不会修，革命本色就不会丢！”大伯语气变得庄重起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镰刀总有一天会不用的，但它在咱们眼里，永远是一把砸碎旧世界的‘开天斧’！别忘了，在咱们的党旗下，还绣着一把金光闪闪的镰刀呢！”大伯的话燃烧着炽烈的火焰，灼热着我的心房，我向大伯说：“您放

心吧，他们梦想我甩掉镰刀把子，我就是要把镰刀永远带在身边。”

打这以后，我带上了镰刀，更带上了大伯的教诲，坐上了驾驶台，铁牛闲着的时候，我就投入到社员们的劳动行列。有位社员开玩笑说：“你来参加义务劳动了。”我马上更正道：“不是义务，这也是我的业务啊。”大伙哈哈笑了起来。笑声里，包含着贫下中农对我的热情赞扬和鼓励；笑声里，我看到“焦黄脸皮”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我高昂着头，心中在说，我们的斗争还要继续呢，一直到把你们那个阶级扫除干净为止……

一下子，我象明白了许多：我重新拿起了镰刀，紧紧地握着它，生怕丢掉似的。我这时发觉，对镰刀的感情变得又象过去那样真挚、深厚了。“怎么，想好了？”一个亲切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大伯站在我的身旁，他见我紧握着镰刀，想得出神，眼神里流露出几分喜悦。

“对，想好了！”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负疚地说：“大伯，我错了。”“哎，我要的是答案，怎么成了检讨？”大伯故作诧异道。“对，是答案，也是检讨。”我挺身说道：“镰刀不用不磨就要锈，人，不认真学习，不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磨炼，就要变‘修’！我一定要把这把镰刀带着去上大学，永葆劳动的本色，永做缩小三大差别的先锋战士！”说完，我转身大步向门外走去。

“上那去？”

“下地去割稻，再磨一次刀！”我扬起手中镰刀，又指了下头脑，诙谐地说。

“对！答对啦！”大伯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乐滋滋地舒开眉头，捋着胡须笑了，笑得那么高兴、欢畅。

（本栏题图：邓泰和）

社员



鲁 风

就是八月底那场大暴雨前夕，我从县里赶到南崖大队摸情况。副支书曲海安排我到养猪场住宿。

“轰隆隆——”闷雷响起。曲海望一下门外说：“这样吧，你先去睡。队里情况，以后说。给——手电。小工厂有批螺丝，还在天井里，我去看看。”

雷鸣电闪，大雨如注。赶到猪场，我看着空屋、空床，心里不禁埋怨：这里喂猪的，负责的，准是些不负责任的人。不然……一道闪电划过，我忽然望见猪棚上蹲着一个人，我忙赶过去，那人已发现了我。风雨里他使劲喊：“递给我石头，拣大些的。快！”只见他赤膊、光头，被那无数银练似的雨条子抽打着。我正怔怔地望着，他呼哧跳下来，推我一把：“成心淋坏小猪咋的？还在这儿死呆着！”说完，瞪我一眼，又一头扎进黑漆漆的风雨里了。

回到屋里，我久久不能入睡。那风雨中的人影怎么也抹不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中听到呱唧呱唧响，一看，是风雨中光头赤膊的小伙抱来了一头小猪，轻手

轻脚地放在筛子里。小猪浑身精湿，瑟瑟发抖，那人揭下自己的褥子给围了一圈，又出门扑进风雨之中……

一觉醒来，窗户透亮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见地上亮着一盏马灯。盛猪的筛子旁边，那人就象一个细心的护士姑娘，守候在一位病人的身旁。我这才看清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光脊背，一身的紫红肉疙瘩，四方脸上透着一股憨劲。他发觉我醒来，不无歉意地笑笑。而后，“噗”的一口吹熄灯。站起来，绵乎乎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叫木臣。你有啥事，尽管

找我。”嘿，人憨，名憨。此刻，他可全然不象似夜间的勇士了。我说：“昨晚，你……”没容我把好话讲完，他说：“看这头猪，被砸伤了。”说完，低着头，很难过。

我想，他准是这个养猪场的干部。

清早，我一连访问了几个夜间冒雨抢险的生产队，总觉得还有桩事在心里搁着。我不能忘了猪场雨夜的看猪人啊！我找到曲海，想和他谈谈木臣这个同志。

还没待老曲说话，屋门“嘭”地撞开了。木臣抱着那头受伤的小猪，咚地一步站到屋当央。他两眼瞪着副支书，问：“是你要四婶子去抱的小猪吗？”这里话音刚落，天井里响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嗨哟哟！俺初级社当社员，高级社当社员，人民公社还当社员。是老社员了！就比不上你孩子伢了？甭说亲族近份，外人也不好意思哩。打这官司，老娘不怕！”这一吵，把我闹懵了。

副支书说：“是我叫她抱家去的。队里怕喂不好伤猪！”

四婶子耸耸肩。木臣没有言语，听副

支书往下说。曲海说：支书领人抢险去南河了，这点子小事我有权决定嘛！”

木臣显然有些激动：“集体养猪才能兴旺起来，还要狠护哩。谷支书几次说过，集体的母猪不能卖给私人，你……”

曲海打断木臣的话，说：“可那是一头公猪仔。”

木臣纠正说：“不，那是一头母猪。”

曲海略显尴尬，责问地看一眼四婶子，四婶子抿住嘴。曲海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自我解脱道：“误会。”

木臣又纠正：“不是误会。是加工、推销螺丝拴住了你的心！”

“不管怎么说，猪砸伤，是猪场的事。既然伤了，集体养不好伤猪，自然可以贱价处理给社员。”曲海固执己见。

“对嘛对嘛。”四婶子两眼盯着猪，伸着双手要去接。

木臣死抱住，动也没有动。忽啦啦，涌进来一屋子社员。一个老汉质问曲海：“你不是不知道，猪栏门早该修了，可你把木匠都调去打螺丝箱子。这不出了事！”有人敲打四婶子：“想和当年开店铺，卖酒掺水那样赚大伙便宜哇！”“走，抱回猪场去！”

人走了，声息了。曲海嘀咕：“看看，谁当家嘛！”

傍晚，我对曲海作了一番思想工作，他对错误开始认识了。不过，事情来得突然，他嗓子里还象卡着根鱼刺。我看了他一眼，就赶到猪场去了。

养猪场的屋里灯火通亮，人头晃动，话声嚷嚷。插不进脚，我们在窗外靠墙站住。那头伤猪还放在筛子里。木臣蹲着身子，用一根麦秸杆儿，往碗里吸一口，再往小猪嘴里吹。碗里黄糊糊，不知啥东西。小猪进了食，抬起头来，一双小眼巴瞪巴瞪，发了精神头。有个名叫春山的小伙子挥着拳头对身边的人说：“今上午，木臣到他丈母

娘村上看媳妇了。咱心话，雨天泥路，看啥媳妇哟。这伙计呀，准有事。嘿哟，你猪咋着？他二话没说，灌了他孩子治病的葡萄糖浆，拨头就回。人家还以为，是咱南崖出了急症病人哩！”

“啊！”不约而同，大家瞅着碗里的葡萄糖浆，愣怔半晌。这才有人说：“副支书多啥能对集体养猪热心起来哟！”

木臣停一停吹麦秸杆儿，说：“副支书脚步不跟趟，是因为这几年忘了跟资本主义斗。他根基不坏，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六一年那件事吧！”

人们议论起来。原来，一九六一年，国家暂时困难，南崖遭旱。队里有头病牛，日渐消瘦。坏人煽动，口粮紧巴巴，还有闲粮食伺候它么？有些人就没信心再饲养它。有人说：“递刀子吧。”有人说：“吃肉饺子吧。”这时候，人群里站出一大一小，说：“不能宰牛！”是木臣和曲海。他们对群众宣传，搞好人民公社，打击帝修反！同时，他们每天省下一半口粮，偷偷塞进牛草里。一早一晚，进山为牛挖草药。不出两月，一头癞牛变得滚瓜流油！

小猪欢了，人们笑了。木臣吁一口气，站起来，两腮汗，满脸笑。春山捅他一拳头：“伙计你咋想的嘛？”

木臣望一眼大伙，语重心长地说：“我想啊，一头小猪砸伤了，咱们社员该管。四婶想抱小猪回家，沾集体便宜，曲海叔‘重钱轻线’思想冒尖，这些，咱们社员更要管。农业学大寨，南崖要过‘江’。集体养猪，非成功不可。靠啥？靠党，靠我们！我们这些过‘江’的卒子，伸手摸一个，都得顶个大车用！”

我禁不住喊出声来：“他是个社员？”

“是啊，他是个社员！”曲海不知啥时跟了来，湿着眼圈说了这么一句。

迎着朝阳 阔步前进

——喜读短篇小说集《迎着朝阳》

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龚 挺

浪涛汹涌的革命洪流，最能激动革命者的心。读着短篇小说集《迎着朝阳》（北京六厂工人作者创作），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八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图画：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横扫“残云”；战斗号角和胜利歌声，如春雷在耳边轰鸣；革命解放了生产力，那雪花纷飞似的捷报令人振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沐浴着阳光，蓬勃生长赛过雨后春笋……这一切，使人感到多么亲切，受到多大鼓舞呵！

这部集子的作者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根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去分析、理解这场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不仅正面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而且着力揭示了这场伟大革命的本质和深远意义，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又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赞歌。

辑在集子里的二十六篇作品，描写了十分广阔丰富的斗争生活：有表现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初期，革命造反派奋起造走资派的反的《暴风雨》、《波涛滚滚》；有反映革命大联合、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大会之前》、《金代表》；有描写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喜雪纷飞》、《汽笛声声》、《纳新》；有歌颂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农兵上大学的《雨后初晴》、《毕业实

践》；还有反映批林批孔、开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为了战斗》、《迎春曲》……作者们努力遵照毛主席深刻阐明的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生活，而是正确地分清主流与支流，不被某些现象所迷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艺术概括和提炼，做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较好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主流。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集子中的许多作品，正是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各种重大斗争事件的描写，在正面展开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去揭示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暴风雨》等作品，就是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正面展开了工人阶级同走资派——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之间的矛盾斗争。那个最先同读者见面的青年工人王海鹰，带头奋起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与走资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文化大革命风暴一来临，他主动捅了厂内的“马蜂窝”。于是，走资派何承秋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跳出来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什么“野心家”的恶毒诽谤，“右派分子”的帽子，都摆到了王海鹰的面前。何承秋妄图以“撤销预备党员”，威胁王海鹰“收回”大字报，还盗用党委和上级

组织的名义，给王海鹰所在党支部施加压力。在这白色恐怖袭来时，王海鹰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阶级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命运。他清醒地意识到，这股反动逆流不是向着他个人扑来的，而是向着文化大革命冲击。他挺身而出，正气凛然地回答走资派：“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他团结和带领群众，进一步揭露了何承秋的行径，锐不可挡地责问他：“你在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另一个走资派赵宗（《波涛滚滚》），也利用自己尚未彻底垮台、手里还掌握着一部分权力之机，或亲自出马，对敢于造修正主义路线反的工人宋涛横加罪名；或指使某些人公开覆盖宋涛的革命大字报，并组织大字报围攻宋涛，丧心病狂地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试想，我们的政权，要是被何承秋、赵宗这号人掌握，那还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较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必然发展。小说集中的不少作品，正是注意了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表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这场不可调和的斗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

歌颂文化大革命，揭示其必要性、及时性，总是和塑造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闯将紧密相联的。《迎着朝阳》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赞扬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主要是通过塑造焕然一新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来完成的。

作者们努力学习和运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努力塑造了一大批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具有鲜明时代特

征的英雄形象。这里有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有焕发革命青春的老同志。这里且不说带头奋起造走资派的反的王海鹰等革命闯将，让我们结识一下英姿飒爽的女工宣队员郑敏，“象火球一样”的工人大学生凌志宏。“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激励着郑敏的豪情壮志：“大学中的少数坏人千方百计地在破坏斗、批、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不管，谁管呢？”她和战友们肩负着阶级的使命进驻大学时，学校里的资产阶级老爷们顽固地进行抵制，他们打出的一张盾牌是：“我们自己能管理好学校”！郑敏一眼看穿，他们这个“自己”，无非是所谓“热心科学”的“内行”，是不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她针锋相对地严厉正告裴三之流：“不管你们怎么反对，这大学我们驻定了，管定了！”这铿锵作响的话，多有气魄！迫使裴三之流纠集的队伍顷刻瓦解，显示了工宣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战斗威力。郑敏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因而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斗争中所向披靡。正是由于千万个象郑敏这样“敢管”的工宣队员，领导革命师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使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园里吹遍了强劲的东风。工农兵上大学，又给校园增添了无限春色。你看，那个工人大学生凌志宏和他的战友们，不仅受阶级的委托上好大学，而且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管理、改造大学，他们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努力争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工人群众称赞说：“如今的工农兵学员，同咱们工人一个心眼”。这是对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的赞扬，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歌颂。可是，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总是反对新生事物，有意或无意地压抑新生力量。《毕业实践》中的

那个曹云琪老师，是愿意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但由于他的立足点没有“真正紧固在工人阶级的一边”，老是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标准”、“旧尺子”衡量事物，不仅“量不出咱工农学员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而且一上来抓教学工作就成了教育革命的阻力。这两篇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教育界的斗争没有止息。当前，那些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部小说集塑造的工宣队员郑敏、工人大学生凌志宏等闪光的英雄形象，恰恰是对那些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击。

《迎着朝阳》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它紧紧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形象地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依然存在着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坚持前进，继续革命，还是搞倒退复辟；是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斗争，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是很有启发帮助的。这里有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疯狂破坏斗批改那样尖锐的敌我斗争（《把关》）；也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击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斗争（《迎春曲》）；还有领导班子和革命队伍内部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交车线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纳新》中的工人新干部葛新贴出《向韩远同志再烧一把火！》的大字报，有人却在阴暗的角落里吹冷风，胡说什么“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还能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无非是妄图“扭”回去，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之“彼一时”

去。这个典型的情节说明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样要经历激烈的斗争。葛新在大字报中这样写着：“……这种修正主义货色，前几年已经批判过，韩远同志又重犯，值得深思”，葛新这种事关路线，出以公心，对修正主义路线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充分表现了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同时也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了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而斗争的自觉性。小说集里的工人群众说得好：“别说走回头路，就是往斜道上一偏，我们工人阶级也不允许！”葛新和工人师傅们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态度。

《迎着朝阳》的作者，都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人。他们都是第一次写小说。就是这些文学创作队伍里的新兵，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创作出这本短篇小说集。它是在工厂党委领导下，业余作者、工人群众和编辑三结合的产物。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为之拍手叫好！那个把写小说看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的小李子（《写小说的时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与歌手的形象，也可以说是这部集子的作者们的生动写照。当我放下这本小说集时，小李子的话还响在耳边：“写，一定要写！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一部分。”这话，说得很深刻。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是什么“歌德派”。那些可爱的反面教员有一点是说对了：我们是“歌德派”，——可惜还要我们给他们加以补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歌德派”，而且，我们理所当然地就是要做这样的“歌德派”！我们应当学习小李子的榜样，努力当好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与歌手。

努力反映风雷激荡的战斗年代

——略谈《朝霞》一九七五年的小小说

上袜三厂“七·二一”工大文科班

上海师大中文系二年级三班

今年以来，发表在《朝霞》月刊上的二十几篇小小说，充满着战斗激情，展示着时代风貌。看了以后，给人以一种新颖、振奋的感觉。这些小小说，大都是新人新作，它反映了文艺战线上，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一派生气勃勃的战斗景象。我们为它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格外高兴。

这些小小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配合形势，热情歌颂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特别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小小说更似匕首投枪，成为向资产阶级主动出击的有力武器，它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选取生活中一朵斗争的浪花，一个闪光的思想，一个动人的场景，努力揭示出广大工农兵群众认真学理论，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勇敢地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可贵精神。从鲁大刚（《权力》）、老门卫（《老门卫》）等身上，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是何等有力地武装了广大群众，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共产主义的精神大为发扬。这些小小说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小小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它短小精悍，用工农兵的话说，就是小而不小，以小见大。它篇幅短，但还是可以写得很有思想深度，这取决于作者能否站在时代的高度，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观察和表现生活。《广场附近的供应点》写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供应点，但作品却通过这个特定的供应点，通过日夜繁忙的购货描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通过络绎不绝的男女顾客，反映了这场群众运动的规模之大；通过供应点中仅有的两个营业员的矛盾冲突——按时关门到日夜服务这一典型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在尖锐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小说并没有花大量笔墨写人群熙攘，彻夜不眠的广场，也没有去写声势浩大、气势雄壮的辩论场面，而是紧紧抓住了供应点内所发生的特殊矛盾，深入展开矛盾，作品的主题思想却越来越鲜明，店内在批判修正主义经营路线，店外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供应点的变化是在社会大变化的推动下进行的，供应点的繁忙和社会大革命息息相关。让读者从店堂内看到了整个社会面貌，从而就把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壮观一下子展现了出来。这种

新颖独特的构思在小小说中尤为可取，因为它小，所以就不允许冗长拖沓，而要高度集中，要严格地选择角度，对准镜头，撷取典型的素材，以收到窥一斑见全豹的效果。

这些小小说中不少英雄人物形象高大感人，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读后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这与作品坚持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人物分不开的。《权力》这篇小小说就是这样。小说描写了汽车驾驶员鲁大刚，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抵制厂生产办公室主任胡云泉用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作品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风风火火的驾驶员鲁大刚以主人翁的高度革命责任感问厂办公室主任胡云泉：“球扁钢，上星期我不是拉过两车了吗？”简单的一句话为以后的矛盾展开埋下了重要的一笔。后来鲁大刚驾驶卡车到了滨海船厂，谈起培训技术人员问题，当对方在苦笑中流露出来“球扁钢是培训技术骨干的学费”一话时，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胡云泉趁为新厂培训技术骨干的机会，向滨海船厂要“球扁钢”。鲁大刚毅然退掉了那笔“学费”，将学徒接回自己厂，这样就把鲁大刚与胡云泉的矛盾给推了出来。鲁大刚回厂后，跟胡云泉一见面就说：“我把这笔学费退啦！”这话正触到胡云泉的心病，一股无名怒火不禁向鲁大刚冲来：“你凭什么退掉！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矛盾一下子激化了。鲁大刚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跳动着火苗，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在这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他丝毫没有退却，与周围的群众一起向胡云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开火，这就使矛盾冲突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鲁大刚怒不可遏，面对着在场的工人一口气揭露了胡云泉把技术当商品的错误行为，最终将矛盾推上了高峰。最后的结尾，虽然没有正面写出矛盾

的结局，但耐人寻味：鲁大刚用人民给他的权力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作品努力做到了浪头层层激，英雄步步高。以集中紧凑的矛盾冲突使英雄的性格不断迸发出灿烂的思想火花。鲁大刚这种火辣辣的进攻型性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工人阶级所特有的典型性格，他确实象一座推不倒的泰山屹立在我们面前。有的同志总认为两、三千字的小小说无法展开矛盾冲突，其实这是不对的。从《权力》的创作来看，小小说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写好矛盾冲突。但也有一些小小说，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接班的钟声》，作品写宋芳技术革新后仍衣着朴素，抓紧工作，但并没有什么斗争，末了却一下子提高到不断革命，给人一种拔高的感觉。

小小说，人物少，特别要求处理好人物之间相互映衬和烘托的关系。《汽车往哪里开》除了着力刻画主要人物房修女工华红外，也十分注意了其他人物的描写。华红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十分严重的后勤组长钱守业，所采取的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作品不是写她一个人忙忙碌碌，周围群众无所事事；不是写她一个人敢于斗争，旁边群众无动于衷，而是以水涨船高的手法突出华红这个主要人物。最后党委书记出场，他不仅支持华红的斗争，还跟华红一起出发，去为老工人修理房子，党委书记的实际行动，有力地突出了华红的斗争。

小小说写得好，还在于能够用一些精炼传神的语言，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由于它篇幅小，对语言的要求就更高。《老门卫》这篇作品，没有用精雕细刻的写法，在老门卫的肖像上花笔墨，而是用了一些个性鲜明的形象、生动的语言。作品的开头对老门卫的描述是“脸上的神色和左臂袖章上‘警卫’两字的含义一样严肃”，问话

的“声音象是从大瓷缸里发出来的，十分洪亮。”简短的两笔，就把一个对警卫工作认真负责、毫不含糊的老门卫，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党委书记打电话给老门卫为方小军（党委书记的儿子）说情，让小方在全厂干部学理论时间见他父亲，可是老门卫不同意，小说描写“老传达生气了，脸涨得通红，简短、果断地说了声‘不行’就啪哒挂上了电话！”后来秘书又出来为方小军说情：“老传达，让他进去吧。”“党委书记说的？”老传达反问了一句。“不行！”答话仍然十分干脆。秘书说：“你也太顶真了。”“什么？”老传达猛然带上老光眼镜……大声说：“……就是老方自己来，我也这么做，党委订的学习制度，党委书记就得带头执行，没

（上接 38 页）

一石激起千层浪。屋里一阵骚动。小田几步跨进来，站到会场中间，坦率地望着大家：“我错了……让我检查吧！”

杨志青抽过一条长凳，说：“小田，坐下吧，不是在批评你。”

“老杨，我应该检查。”老陈缓缓站起身来。

杨志青上前搭住他的肩，把他按坐在凳子上。

“该向大家检讨的，是我。”杨志青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平平稳稳地说，“我这些天来跟大家一起规划改土治水，画出了不少远景规划图，可就是没有想到，要让我们每个干部，每个群众的心里都装上共产主义这张图啊！……”

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县委副书记张正山实在忍不住了，说：“县委是集体领导。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对！”“对！”会场内外的人纷纷应和。

杨志青眼睛一亮，摘下那顶蓝布帽，把它轻轻放到桌子上。又在桌角上熄灭了手

有理由搞特权！”言语不多，却铿锵有力。老门卫不仅把住了工厂的大门，而且把住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门，使我们看了肃然起敬。

读完这二十几篇小小说后，我们感到只要根据小小说短小精悍的特点，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挖掘富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运用高度的艺术概括、精巧的艺术构思、形象生动的语言等艺术手段，来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歌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产生的“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就一定能使小小说这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及时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录下战斗年代的风貌，鼓舞亿万群众同心同德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指间夹着的香烟，端端正正地戴上了花镜。双手一撑桌子，他站起来了。他硬壳壳的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笔记本，象捧着他那颗赤诚的心。他的语调深沉又富于感情。这是县委书记上任后第一次作报告，第一次就是在无情地解剖自己……。

会议结束已是深夜，雨下大了。人们离开会场时，对面宣传牌上，正倾泻着一束雪亮的灯光。老陈冒雨扶着梯子，小田戴着草帽，卷起袖子，用油漆刷子在规划图上添了“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十个鲜红的大字。

风刮不掉，雨淋不掉——它是写在人们心里的。

——这几个故事都是讲县委书记杨志青同志的目光。你看，多么深沉，又多么锐利。那是因为他高瞻远瞩，两眼牢牢盯着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啊！

（题图：昭亚）



俺村又添新机床

任尚永作



朝霞

1976/1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